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2008 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
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Representation of Youth Poverty since 2008:
What is Revealed and What is Veiled?

指導教授：陳信行

研究生：陳崇真

2019 年 7 月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論文合格同意書

研究生 陳崇真
姓 名

論文題目 2008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Representation of Youth Poverty since 2008: What is Revealed and What is Veiled?

本論文承蒙下列口試委員審議通過。

口

試

委

員

指導教授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 日

誌謝

論文只是一個過程，重點是怎麼走完這過程。

我在 2009 年大學畢業，我們這屆出社會剛好遇到全球金融海嘯，加上退伍後面對家裡債務壓力，總覺得長子要幫忙分擔，但出社會只領 22K，我根本分擔不了什麼。我無法幫忙債務問題，在我心中形成自卑的心魔，在心底深處打擊著我。2013 年我考上社發所，這一讀就是六年，之間曾失業兼差快一年、換了三份工作、經歷人生低潮、深陷理想與現實的糾結。2016 年家裡債務終於緩解，回頭一望，看到自己在過程中的脆弱與不足。研究青年貧窮，也是檢視自己經歷的這一切。

2018 年 3 月，我開始面對論文，開啟一年三個多月除了工作就是論文的生活，在寫論文的苦悶生活中我不斷在逃避與面對之間來回拉扯，想方設法不讓心中自卑、自我懷疑等種種心魔阻礙寫論文的進度。馬克思曾說做科學像在爬山，寫完論文後發現此言真是不假。在埋頭寫論文的日子裡，面對孤獨寂寥，我時常告訴自己「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安慰自己並不孤寂。實際上我能完成論文，真的依靠身邊許許多多的人，沒有大家的幫助，我很難想像怎麼完成論文。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信行，我為了確保論文進度，總頻繁約討論，信行總是有求必應，不論是討論問題意識，或當我卡關時，提供各種疑難雜症的解方，信行給我許多建議與思考，更讓我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也要感謝兩位論文口委——陳政亮和郭力昕，不論是計畫書口試或學位口試，總給我非常多的建議與提醒，阿亮總一針見血點出我論文研究上的邏輯問題或可以發揮更好的建議，力昕在研究方法上與文獻回顧上給予重要的提醒，並指出我可以精進的方向，無不讓我更加完善這篇論文。

此外，我要感謝釣魚台教育協會、兩岸犇報與夏潮辦公室。由於我自身能力有限，沒有釣協、犇報與夏潮辦公室的體諒與支持，我不可能邊工作邊完成論文。感謝釣協在事務繁忙之時讓我留職停薪，感謝小卓、俞如、小倩在我留停時，分擔我的工作；也感謝美霞、慈立對我的關心，讓我勇敢跨出新的一步。感謝犇報、夏潮辦公室的同仁讓我先以完成論文為重，在分工上配合我寫論文的狀態，福裕大哥的全力支持更讓我放寬心請假寫論文。

感謝社發所的老師與各屆同學們，尤其在寫論文的過程中，還遇到世新校方片面停招社發所，在畢業前夕從反停招的行動中，再次感受社發所的理念價值與行動力。社發所的培養與討論氛圍，讓我能以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社會上的眾多議題，這樣視野的養成非常寶貴。感謝所上老師與各屆同學們在我寫論文過程中的關心與討論，尤其感謝我的同屆同學們 Yuligu、俞如、正欣、阿德、福全，以及康偉和江雪。寫論文真的需要能一起努力、一起討論，且互相督促與鼓勵的夥

伴，尤其是進度與我最接近的康偉，感謝你一路上的相互扶持。

我還要特別感謝社發所小嗆學姐周憶如，以及 2030 台灣無貧困推進協會對本論文的補助與支持。小嗆學姐一聽到我打算做有關青年貧窮的題目，就提醒我記得跟協會申請補助，這補助讓我增添許多完成論文的動力。追求台灣社會不再有貧困，是非常宏大的理想，尤其我自己在完成本論文後，更深刻體會貧困問題的各個面向。2030 台灣無貧困推進協會致力於此，只希望自己的論文能對台灣追求無貧困有一絲絲貢獻。

我也要感謝我的母親、父親和妹妹，我因為邊工作邊寫論文而久久沒回高雄，你們也總怕吵到我，而給我極大的空間與自由，並不時給我加油打氣，感謝你們的體諒與支持。也要感謝寫論文的過程中，各方長輩、朋友們給予的支持與鼓勵，感謝你們總接受我的拒絕，讓我得以撐出空間與時間來寫論文。最後，我要感謝柏萱，妳陪我走過這辛苦且漫長的過程，總不厭其煩的砥礪我、鼓勵我、督促我，是妳告訴我寫論文只是過程，重點在怎麼走完這過程。我很認真走完這過程，並從中獲益良多。我寫論文的日子里，妳也辛苦了。妳的付出，我無以言謝，未來我會繼續努力。

寫論文的日子里，我坦承面對自己的脆弱與缺點，我認為寫論文是學習面對沒有答案、要自己找答案的過程，這過程讓我直視自己的自卑、逃避、偷懶與自我懷疑，為了不讓這些思緒阻礙寫論文的進度，我努力找方法鼓勵自己、正視自己缺陷並尋找繼續前行的方法，培養自己的紀律。最後，我要感謝自己，還好自己認真面對，並走完這過程。

完成論文，我也告別了過去。以後，我要繼續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的。

陳崇真 2019.6.15 台北住處

摘要

2008 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以「世代」、「青年貧窮」探討社會發展困境的論述越來越多，伴隨發展的還有厭世、小確幸、小資省錢等面對困境的生活方式與思維。2016 年蔡英文總統在就職演說上，將年輕人的困境提升到國家問題的程度，體現連官方都意識到青年貧窮的問題。

然而貧困問題是社會上一直存在的問題，惡化的經濟環境也不會僅影響到某一年齡層，當青年貧窮的討論越來越多，卻沒有促進社會大眾更關心圍繞青年貧窮所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因此，青年貧窮的論述揭露什麼問題？又遮掩什麼問題？就值得進一步探討。

本論文以《遠見》雜誌、《崩世代》、《厭世代》作為研究文本，探討 2008 年以後面向社會大眾的論述中，青年貧窮如何再現，並以論述分析作為研究方法。本論文提出青年貧窮論述揭露了不同世代間的對照，緬懷台灣過往的榮景成為台灣經濟、產業發展如何變更好的想像。同時也把過去的社會價值觀與成功經驗，加諸在當前的年輕世代身上，因而造成經濟上沒有世代差異，但在價值觀上具有世代衝突。

當青年貧窮問題從個人處境朝政策發展，使得個人困境與社會問題之間難以建立連結，正能量、厭世負能量成為個人面對社會困境的參考。尤其青年貧窮論述凸顯世代之間的參照與緬懷，卻掩蓋了階級之間的複製與流動局限等問題。日益嚴重的階級差異，以及同世代「年輕人」因身家背景經濟條件不一，而所面對的不同命運，都在青年貧窮的論調中被淡化並消失在讀者的視角，社會更弱勢群體的處境，也很難在青年貧窮與世代衝突的論述下被看到。

青年貧窮再現所產生的政治意義遂成為選舉的選票、候選人的政見，青年貧窮變成期待政黨政治來解決問題。然而當失去個人參與社會改造的想像時，也就形成一種去政治的青年貧窮談法。

關鍵字：青年貧窮、世代、再現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5
一、青年貧窮是怎樣的貧窮問題？	5
二、再現貧窮的研究回顧	10
第三節、恩格斯與狄更斯：來自 19 世紀的參考	14
一、為什麼找恩格斯與狄更斯？	14
二、恩格斯與狄更斯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	15
三、狄更斯與恩格斯的書寫	18
第四節、研究方法	22
一、文本範圍	22
二、研究方法	23
 第二章、《遠見》雜誌中的青年貧窮再現	 26
第一節、2008 年後《遠見》雜誌中的青年貧窮再現	28
一、從新貧、工作貧窮到青年貧窮	29
二、2012 年後《遠見》怎麼談青年貧窮	33
第二節、《遠見》給年輕人的希望與鼓勵	40
一、年輕人要努力、要吃苦、要堅持、要創新，要有熱情	40
二、2014 年後逐漸減少的青年貧窮論述	46
第三節、不同世代的經驗參照與衝突	49
一、找回上一世代的打拚精神	49
二、對過往榮景的緬懷擋不住現實的無情	55
第四節、小結	60
一、2008 年的青年貧窮再現	60
二、以緬懷過去作為改變現況的想像	62
三、政策與個人之間的距離	63
四、小結：消失的貧富差距與階級問題	65
 第三章、《崩世代》、《厭世代》中的青年貧窮再現	 67
第一節、《崩世代》中的青年貧窮再現	67

一、《崩世代》中的世代貧困再現	69
二、新自由主義發展困境下的世代貧困	71
三、工作貧窮的問題	73
四、少子女化的問題	76
五、《崩世代》的政策建言與後續影響	79
六、《崩世代》的侷限	81
第二節、《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中的青年貧窮再現	83
一、厭世的社會氛圍	84
二、厭世的根源：工作貧窮	86
三、厭世的根源：世代衝突	89
四、產業困境中的負負得正	91
第三節、從《崩世代》到《厭世代》	94
一、《崩世代》到《厭世代》的書寫	94
二、世代界定的轉變	97
三、不同世代之間是否衝突	101
第四節、世代貧困中的社會問題與個人問題	105
一、青年貧窮其實是世代之間價值觀的對照與差異	105
二、仰賴政策解決的青年貧窮問題	107
三、世代衝突遮掩掉的社會問題	109
第四章、討論與結論	110
第一節、2008 年以後的青年貧窮再現論述發展	110
第二節、青年貧窮呈現緬懷台灣過往的榮景作為世代對照	111
第三節、青年貧窮談的不只是青年、也不僅是貧窮	114
第四節、大環境問題與年輕人問題的脫鉤	115
第五節、結論：青年貧窮—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117
第六節、研究限制	119
附件	122
參考文獻	125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2008 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經濟惡化的影響遍及全球，貧富差距在全球各地成為社會問題，這背後反映的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危機，而與民眾直接相關的則是失業、低薪等問題，以及在生活中遭遇各種經濟緊縮而對未來的擔憂。因此，各種探討當代貧困現象的論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貧富差距、M 型社會、階級社會、青年貧窮……等等，無不反映當前社會上各種貧困問題，或整體社會遭遇的困境。

在這些論述中，無不從各種角度談論經濟發展的困境，以及在這處境下造成的貧困問題。其中，矛頭大多指向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1980 年代，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率先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內以縮減政府支出、擴大私有化、民營化為主，相應的是雇傭勞動的彈性化，以及減少政府干預並鼓吹競爭的自由市場，對外則以自由貿易作為全球經濟擴張的發展方式，並以此為震央開始席捲全球。經歷 1990 年代蘇聯解體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更讓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造成巨大影響。歷經政策的推廣與運行，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以降出生的世代，遂成長在冷戰結束且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經濟發展下的社會。

作為冷戰時期對抗共產主義最前線的台灣，最早參與進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僅加入美國垂直分工體系，更緊跟著美國的腳步，以美日為核心的加工出口工業化作為經濟發展的圭臬。台灣的戰後嬰兒潮發生在 1940 年代，這世代的人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恰逢「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以及台灣產業轉型為加工出口外銷的年代，因而經歷台灣經濟起飛，趕上各種時代更迭的浪潮。¹而 1970 左右出生的人則趕上台灣在 1990 年代經濟成長的末期。

1990 年以後，台灣產業在受到全球分工下的競爭影響，使得勞動條件與經濟成長相比下，卻未有明顯增長。以 1980 年代出生的世代來講，在這樣的社會背景成長下，會遇到為了學歷而負擔就學貸款，或就學期間半工半讀；出社會求職時，面對因縮減人力而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以及彈性勞動化造成惡化的勞動條件；房價、物價不斷漲幅，保險福利制度又不斷修改；托育、長照體制在公有制度不足下，成為沉重的負擔支出。上述種種現象，使得此世代的年輕人光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就已顯得吃力，若沒有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隨時都有可能因為意外而陷入社會底層的貧窮困境。

因此，有關此類以「世代」或「青年貧窮」為主題的報導或文章越來越多，

¹ 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9。1-58。

從日本、美國翻譯而來的專書也時有所見，台灣也有出版如《崩世代》、《厭世代》等專書，專門探討此類貧富不均下的世代貧困問題。甚至 2016 年政黨三度輪替後，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就職演說上，以「為年輕人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作為開場，說道：

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的處境。一個國家的年輕人沒有未來，這個國家必定沒有未來。幫助年輕人突破困境，實現世代正義，把一個更好的國家交到下一代手上，就是新政府重大的責任。²

將年輕人的困境提升到國家問題的程度，青年貧窮成為被提上檯面呼籲要處理的問題。然而貧困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社會上的問題，也不僅只限於某個世代。過往揭露社會底層弱勢的貧窮書寫中，主要將書寫對象聚焦在社會中的某一群體，例如貧民窟、某類型的社會底層民眾、社會邊緣人、弱勢的勞動階級等，例如 1980 年代的《人間雜誌》便以書寫底層人民處境的紀實報導而聞名，又或近年林立青《做工的人》專門書寫底層勞動階級的生活辛酸。³

這裡就產生一個現象，近年來青年貧窮、世代貧困或貧富差距等等問題，成為社會上的顯學，青年貧窮問題的揭露與世代貧困的書寫，成為報章媒體或書籍出版中常見的主題，被廣泛的討論與探就。當然經濟危機造成的社會現實，理所當然會成為主流大眾議論的話題，但經濟危機帶來的貧窮處境、貧富差距，所影響的群體又不只是年輕族群，但為何貧窮困境會聚焦在一個世代或以青年為主要探討對象呢？

尤其在全球經濟普遍衰弱之際，各國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四起，從英國脫歐，到西班牙、希臘的財務危機，到美國川普在選戰中獲得廣大藍領階級的支持。無不反映各國反對建制的新興右翼政治勢力，都嘗試提出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辦法。這反映出經濟問題形成對中產階級的威脅，以及社會產生高失業率的動盪時，伴隨而來的各種不安，原本大部分能適應並生存於這套社會機制的民眾，因為貧富差距拉大，底層人民越加難以生存，而位居社會中間位置的民眾則懼怕向下流動，成為社會底層的貧困者。民粹主義的興起，正是社會上的這股不安感讓社會中形成想要改變既有狀態的推力。⁴

因此，這些新興右翼政治勢力提出各種解決貧窮問題、失業問題、經濟問題的方案，吸引並獲得民眾的支持。但受這類新興右翼政治勢力號召的民粹寄託的不是任何意識形態的革命、也不是對未來社會的期待或想像，而是既有生活的維持與穩定而已。在此情況下，貧富差距、青年貧窮一類的社會問題如何被提出，就會造成很大影響。以英國為例，經濟問題被導向以脫歐作為解決方案；在歐洲，則大多轉嫁到移民、難民或歐盟體制身上。在視外來者爭奪本地人工作的情況下，

² 請參考 2016 年總統就職演說全文。

³ 林立青（2017）。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

⁴ 約翰·朱迪斯（2017）。民粹大爆炸。翻譯：李隆生、張逸安。台北：聯經出版。

排外情緒遂成為容易煽動的民粹問題。

歷史上，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德國因一次大戰的戰敗，不僅失去原有的殖民地，更被戰敗的賠款壓得國內經濟緊繃，國內貧富差距問題嚴重，希特勒所屬納粹黨（全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便是將國內貧困問題導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壞德國政治經濟，以及進一步將責任推到猶太民族上，期望創建一個符合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強大國家，⁵身處貧窮處境的民眾也因而相信承諾解決貧困問題的希特勒，能夠解決經濟危機帶來的貧窮問題。⁶

在亞洲，鄰近台灣的日本因 1929 年全球性的大蕭條，受到經濟動盪影響，為了解決經濟危機與國內資源的匱乏，擺脫經濟危機造成社會嚴重的貧窮問題，有日本法西斯之父一稱的北一輝，當年提出國家改造論，就主張在日本實行政治、經濟和行政等改革，建立徹底的中央集權，藉此實行土地改革，實施一系列經濟改革，為日本實行軍國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⁷

當前全球各地的民粹興起，不必然重蹈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崛起的覆轍，但足以可見解決貧窮問題，不論是左右派、民間聲浪或政府體制都得面對的經濟課題。然而對現象有不同的看法或詮釋，就會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因此探究為何經濟危機造成的貧困問題，會出現聚焦在青年貧窮或世代貧困的書寫？以及這些再現青年貧窮的書寫之間有何異同、如何書寫？就有其重要意義。

因此，本論文將分析自 2008 年金融海嘯過後至今，以青年貧窮或一個世代遭遇的貧困處境為主題所探討的論述，如何在面向社會大眾傳播的文本中被書寫，這些論述揭露了什麼問題？又是否掩蓋了什麼問題？這些面對貧窮問題的未雨綢繆，究竟產生的政治意義是對體制的不滿？亦或是中產階級擔憂向下淪陷的社會共鳴？還是其實未產生任何具政治意義的行動？

為了回應上述問題，本論文以《遠見》雜誌、《崩世代》、《厭世代》作為研究文本，探討 2008 年以後面向社會大眾的論述中，青年貧窮如何再現，並以論述分析作為研究方法。本論文發現青年貧窮論述揭露了不同世代間的對照，體現緬懷台灣過往的經濟榮景，同時也把過去的社會價值觀與成功經驗，加諸在當前的年輕世代身上。

此外，青年貧窮論述凸顯世代之間的價值觀參照或對過去的緬懷，卻也掩蓋了階級之間的複製與流動侷限等問題。在青年貧窮的論述中，當越強調世代差異時，日益嚴重的階級差異，以及同世代「年輕人」因身家背景經濟條件不一，而

⁵ 希特勒如何看待當時德國的經濟與貧窮問題，可參考：希特勒（1972）。我的奮鬥：希特勒自傳。

⁶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2009）。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回顧德意志國（周全譯），194-195。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⁷ 有關日本法西斯之父北一輝的討論，可參考：唐永亮（2007）。論日本法西斯統治下日本的國民倫理觀念及其特徵。日本研究，3。61-66。

所面對的不同命運，都在青年貧窮的論調中被淡化，而消失在讀者的視角。

青年貧窮聚焦年輕世代的困境，進一步體現台灣發展的困局，並轉化為世代衝突，同時淡化貧富差距、階級複製等社會問題。青年貧窮再現所產生的政治意義遂成為選舉的選票、候選人的政見，失去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想像，形成去政治的青年貧窮談法。

第二節、文獻回顧

貧窮是歷史悠久的社會問題，隨著人類社會生產技術的變革，社會制度與結構也相應變遷，但貧窮問題仍是難以解決的問題，貧窮問題大到可以是意識形態對解決貧窮問題的看法不同，小到是社會弱勢群體生活具體遭遇的困境。因此，眾多領域從各自的專業探討貧窮問題，例如人口統計學、社會福利學、社會工作學、政策、法令、住宅……等等。

我在本論文中想要探討面向大眾的論述如何再現青年貧窮，因此我將文獻回顧聚焦在兩個面向，分別是青年貧窮是怎樣的貧窮問題，以及前人進行貧窮再現的研究成果如何？以下文獻回顧，將先探討青年貧窮有什麼相關研究，進一步借鏡前人所做貧窮再現的研究，作為本論文開展的基礎。

一、青年貧窮是怎樣的貧窮問題？

我要研究青年貧窮在面向大眾的論述中如何再現，勢必得先理解青年貧窮已被提出是怎樣的問題？尤其青年貧窮的貧窮是怎樣的貧窮？跟社會底層弱勢群體遭遇的貧窮是否一樣？因此，以下有關青年貧窮的文獻回顧，將先探討青年貧窮是怎樣的貧窮問題？

以貧窮為主題的研究，大多是社會工作、社會福利政策的專業領域，王永慈（2005）在〈台灣的貧窮問題：相關研究的檢視〉提出台灣貧窮研究中，提出界定貧窮的概念主要有「貧窮線」、「相對貧窮」與「絕對貧窮」，以及其他貧窮測量方法。從林美伶等（2000）、王德睦等（2003）的研究中可得知，貧窮線作為貧窮門檻，針對不同群體或類別設計統計方式，用以作為經濟發展與公共政策之間的成效評估。也作為福利政策施行於哪些服務對象的衡量標準或範圍界定之參考，評斷社會之中誰可以被定義為弱勢者，誰可以申請福利資源。

貧窮線的訂定標準因各國情況各有不同，大多考量個體或家戶經濟類型、各國的物價指數或消費差異。由於制定的標準與考量不同，因此制定貧窮線有「相對貧窮」與「絕對貧窮」這兩種概念。以台灣來說，台灣由中央主計機關公布各縣市地區最低生活費標準，以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作為「最低生活費用」，並以此作為貧窮線。台灣貧窮線的制定方式考量社會經濟、物價等變化，因應生活狀況制定社會所能接受的貧窮線，而非以維持基本生存為原則，可歸類為「相對貧窮」的概念（王永慈 2005）。

「絕對貧窮」則以維持人類基本生存需求（如食衣住等）作為最低生活水準，因此以「絕對貧窮」概念制定的貧窮線，其衡量貧窮的方式為個體是否擁有能維持基本生存所需的費用。以世界銀行制定的國際貧窮線為例，2015 年世界銀行依據全球購買力的平均值作為標準，以基本維生的飲食費用的三倍作為貧窮線，

將貧窮線定為每人每日 1.9 美元，因此屬於絕對貧窮的概念。而美國採用標準預算法 (budget standard method)，⁸，以基本維生飲食費用的三倍作為制定貧窮線的依據，此也屬於絕對貧窮（王永慈 2005）。

儘管貧窮線的定義有相對貧窮與絕對貧窮兩種概念，但林美伶、王德睦（2000）在〈貧窮門檻對貧窮率與貧窮人口組成之影響〉一文中指出：

貧窮概念均蘊含著絕對與相對的特質，只是其成分多少罷了，難以截然劃分。晚近的貧窮研究較不會劃分貧窮為絕對的貧窮或相對的貧窮，而多使用能結合貧窮的絕對與相對特質的方法，來界定貧窮並訂出貧窮門檻，例如由專家依據人類生理的最低或適當需求的專家預算法、基於家庭間的所得或消費的「比較」的比例法、基於家戶自己評定最低或足夠的所得或消費需求量的共識法。

這些方法確實使貧窮門檻兼具相對與絕對的特質，不過他們都各有優缺點，均具主觀判斷 (judgments) 與武斷性 (arbitrary)。因此，並無絕對正確的貧窮門檻訂定方式，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在家戶消費的光譜中，在哪一點時其由「消費不足」轉為「消費足夠」。當我們期望以「科學方法」設定貧窮門檻時，科學也無法決定哪一門檻最適合該社會，科學頂多幫助我們選出一個和社會大眾認知較一致的貧窮門檻。⁹

因此，我們可從近十幾年來的貧窮相關研究中，看到此一相對貧窮與絕對貧窮互相交融，追求最適合台灣社會的貧窮門檻，並往多面向貧窮研究發展的趨勢。

從林美伶、王德睦（2000）；王德睦、呂朝賢、何華欽（2003）；呂朝賢（2007、2016）；王德睦、何華欽、劉一龍（2008）；陳柯玫、呂朝賢、王德睦（2016）等，可以看到從 2000 年以後，過往絕對貧窮與相對貧窮的分析概念逐漸遭受挑戰，為的是解決貧窮問題本身多元且複雜的特性，並開始轉而使用主觀貧窮、客觀貧窮的概念，開始重視貧窮者自身如何看待貧窮處境。最後到多面向貧窮研究時集大成，不僅注重從既有從經濟資源面向切入的貧窮門檻，也注重貧窮者被剝奪什麼基本生存權利的剝奪門檻。從中可看到貧窮研究從絕對貧窮與相對貧窮、到客觀貧窮到主觀貧窮，到最後多面向貧窮測量，這一路演變的歷程。

從上述爬梳中，可以看到既有貧窮門檻的研究不斷遭到挑戰，為了要含括更多不被貧窮門檻所納入的弱勢群體，不斷調整衡量貧窮的方法。然而既有貧窮研

⁸ 標準預算法有三種次分類，分別為：1、以特定必需品支出（如：食品支出）折算的乘數法。2、以需求項目類別，例如食衣住行、醫療照護，來計算的類別法。3、以所有消費支出作為預算法，此方法在於訂定家戶預算時列出細項，如衣服、內褲、襪子、夏裝、秋裝等。詳見王德睦、呂朝賢、何華欽（2003），〈台灣貧窮門檻與測量的建立：FCSU 的應用〉。《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 8 期：頁 1-46。

⁹ 林美伶、王德睦（2000），頁 118-119。

究遭遇的挑戰，主要源自於 21 世紀初一開始，早已參與世界分工的台灣遭逢 2000 年的「網際網路泡沫化」影響，經濟大受打擊。台灣在經歷早年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運動發展後，一來勞動權益越來越受到重視，二來 1990 年代大陸改革開放後，提供更廉價的密集勞動力，台灣本土大量製造業工廠紛紛外移或關廠，經濟發展早已遭遇挑戰。直到 2000 年網路泡沫化的經濟危機，更使得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成為顯學。

黃世鑫、林志鴻、林昭吟（2003）便開始提出舊有貧窮的概念開始被挑戰，並提出「新貧」問題主要呈現在窮人結構的改變，接受社會救助者不僅人數大幅提升，並有年輕失業者比例提升的問題。吳佩瑩（2005）進一步提出「新貧」問題是指受到經濟全球化，以及不穩定就業的影響。一來經濟全球化，促使工廠往人事成本低的地方跑，因而使台灣工作機會變少，造成失業問題。二來新自由主義下的非典型勞動與勞動聘僱彈性化，讓有工作者其薪資卻無法滿足生活所需，而這類不被政府福利制度所保障的群體，就成為「新貧」問題。

從這可以窺見在 2000 年網路泡沫化的經濟危機後，失業問題與工作貧窮問題成為台灣社會上新的貧窮現象。吳佩瑩（2005）在比較美國、法國與台灣在解決新貧問題所提出的政策時，指出：

由於我國目前的法定貧窮線過低，導致台灣貧窮率非常低，遠低於西方福利國家，也使得長期失業者，一方面無法持續領取失業給付，但卻陷入貧窮，而卻又無法符合現行嚴格的低收入戶資格審查，以致於目前台灣在失業給付與社會救助當中，產生一個很大的漏洞。¹⁰

從這就能清楚明白為什麼社會福利專業的貧窮門檻研究，會一直不斷精進與改良統計方式，原因就在於台灣的貧窮線制定方法遭遇挑戰，無法含括更多遭遇貧窮處境的群體。因此從 2000 年以降，一來貧窮門檻的相關研究不斷推陳出新，二來有別於過往的貧窮研究，針對新貧的研究也開始出現。

從黃世鑫（2003）、周佩潔（2003）、吳佩瑩（2005）、李淑容（2007）、呂朝賢（2007）到張芳寧（2009）等，都以新貧為題進行研究。整體而言，新貧研究主要強調出新貧概念有別於舊有的貧窮概念。舊有貧窮概念泛指 1970 年代以前，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全球冷戰格局下，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高度發展戰後經濟，創造眾多工作機會，一方面以福利國家政策照顧社會上無法靠工作維持生計的群體，並大多以老弱殘疾為主。新貧則是在 1970 年代後，因應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大量且長期的失業問題逐漸無法被既有福利政策所解決，以及非典型勞動與勞動彈性化下，使社會上開始出現擁有工作卻依然處在貧窮問題的人。

因此新貧問題，主要聚焦在三個面向：失業問題、工作貧窮，以及既有福利

¹⁰ 吳佩瑩（2005），頁 91-92。

政策，與家庭支持系統的失靈。而有別於舊有貧窮群體著重在老弱殘疾，新貧問題下的貧窮對象則為長期失業者、家中依賴人口過多之家庭，以及有工作但薪資無法滿足基本生活所需者。

而在上述研究中，周佩潔（2003）就探討在新貧造成家計主要收入者長期失業下，對家中的青少年造成貧窮生命週期的影響。而黃世鑫（2003）等人則從意識形態、價值觀等提出台灣面對新貧問題，因改變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思維，徹底檢討社會排除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面相。並提出歐洲兼顧經濟與社會協調之發展，著重社會福利制度，以及建立重視人本生活的理念與方案，有助於台灣作為借鏡，改革政經體制。

吳佩瑩（2005）、李淑容（2007）和張芳寧（2009）則針對政府提出的救助政策去探討，紛紛提出貧窮線過低、社會福利預算偏低，以及政府應制定更為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並精進改良失業救助。張芳寧回顧 2000 年以後政府提出的促進就業政策，總結提出三個問題：一、政府必須定義新貧以及提出更有效統計新貧人口的方式；二、就業政策必須獨立一個部會制定與行，且不受政黨輪替或立場影響；三、就業促進政策應提供更具品質的工作機會，而非彈性勞動或約聘僱工作。

呂朝賢（2007）則認為新貧問題是既有不同貧窮概念集結成的複雜概念，他指出：

新貧所欲指陳的社會事實，已超過一般僅以所得為貧窮門檻所看到的視野，並且與許多既有的貧窮概念系譜中的分支，特別是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底層階級（Underclass）、邊緣化（Marginalization）、剝奪（Deprivation）等幾個概念相互糾纏不清，係一個成份相當複雜的概念。¹¹

呂朝賢認為新貧問題是舊有貧窮的多種問題被一起提出來談。因此他呼籲政府若仍以「發展經濟」為公共政策的目標，面對新貧問題仍「不加思索的奉新右派主張為主臬」，那終究只是持續製造新貧問題，而非解決問題，並指出台灣既有的福利體制，早就有不公正的問題，若政府再不重視弱勢群體的意見，參考弱勢群體的需求改進福利體制，新貧問題將發展為越來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與社會階級衝突。呂朝賢對新貧問題的看法與強調重視弱勢群體聲音的呼籲，反映在後來 2016 年使用「主觀貧窮」與「客觀貧窮」的概念。

然而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台灣經濟深受影響，既有新貧問題未能有效解決下，失業率再度來到新高。教育部於 2009 年 4 月至 2011 年 9 月間推出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也就是俗稱的 22K 政策，減緩社會上高漲的失業率問題。原本用意良善幫助青年就業，卻造成青年就業起薪變成以 22K 為標準，連帶影響到整體薪資的漲幅。這下不僅青年就業遭遇起薪低的問題，連出社會工作

¹¹ 呂朝賢（2007），頁 25。

多年者也遭遇薪資調漲停滯的問題。因此，原本新貧研究便已提出工作貧窮、彈性勞動等問題，在 2008 年後更是以工作貧窮成為重要議題。

羅婉云（2007）、吳德偉（2011）、張家榮（2011）、趙秋雲（2013）和賴郁如（2015）等，都以工作貧窮為主題進行學位論文研究。洪惠芬、李淑容、林宏陽（2014）則發表期刊論文探討低度就業者的工作貧窮問題。從上述人等的研究中可發現幾個趨勢，一、工作貧窮的探討對象從各類群體，逐漸往強調青年群體的工作貧窮問題發展。二、既有解決貧窮問題以工作作為最佳解方，然而工作依然貧窮的問題大大挑戰了「工作解決貧窮」的概念。三、台灣政府過於著重解決失業率問題，卻創造大量彈性勞動或低度就業狀態的工作貧窮者。

羅婉云（2007）、趙秋雲（2013）等人在定義工作貧窮時，以是否符合在工作的定義，以及是否處在貧窮線底下，將這兩概念集合起來，作為工作貧窮的定義。因此提出工作貧窮的定義為「在職有工作，但是全家收入卻低於官方貧窮線或法定貧窮線」。因此探討的對象也會以家戶口為主，在這部分可說還與新貧研究的特色接近，只是著重聚焦討論工作貧窮問題。

到吳德偉（2011）、張家榮（2011）等，就開始逐漸強調年輕人的工作問題，例如吳德偉（2011）探討高工時低薪下，年輕人注重生活品質或寧願從事彈性勞動也不想被高工時工作綁死，卻開始出現工作貧窮的問題。張家榮（2011）則強調非典型勞動的工作使年輕人的勞動力更像輕易被販來售去的商品，因而呈現高度商品化且廉價的問題。

而有關青年工作貧窮的研究中，也有如戴翠莪（2017）納入家戶組成為考量，並含括社會福利、與市場收入相對貧窮率一同分析，以台灣作為參照，跟 21 個工業化國家進行比較後，提出北歐國家因為青年較早離開家，又收入甚少，雖然社會福利有效降低貧窮問題，但北歐青年面臨貧窮問題的比例較高。相較下，台灣、南韓、日本等東亞國家，因為社會福利制度有限，青年與父母同住的情況普遍，因此台灣青年的貧窮率遠低於西方國家。

然而賴郁如（2015）在探討台灣勞動市場中「全時」工作者的工作貧窮問題時，就提出工作貧窮可區分為「個人層次」與「個人、家戶」等兩種操作方式。認為主流較常使用「個人、家戶」作為研究工作貧窮的概念，但用家戶的收入情形來討論，容易忽略個人勞動條件弱勢的弱勢工作問題，尤其是青年工作貧窮者。因此賴郁如（2015）認為若以個人層次來研究工作貧窮，方能真正檢視有工作卻貧窮之弱勢的處境，以及體現出工作貧窮中「過量工時」的特性。

上述可看到在這工作貧窮的研究發展中，開始從新貧所談的工作貧窮逐漸開始著重青年工作貧窮的問題。然而只談工作貧窮問題，卻也會遭遇如吳德偉（2011）所提年輕人可以為了追求生活品質，而願意從事低薪，而讓自己陷入工作貧窮的處境，或要高工時方能有高薪的就業環境，也體現出青年工作貧窮中，也帶有價

值判斷的問題。

因此，從舊有貧窮門檻的貧窮研究遭到挑戰，開始提出新貧研究並聚焦在工作貧窮的問題，並開始出現聚焦探討青年貧窮的研究。回顧這發展趨勢，可以總結出早在 2000 年以前因經濟發展停滯就開始產生失業率問題，而在 2000 年經濟危機後，新貧問題逐漸成為顯學並挑戰既有貧窮研究，而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新貧問題不僅是失業率問題，更因政府 22K 政策，使工作貧窮問題成為主要問題，首當其衝的青年逐漸成為問題匯流的焦點。

上述研究的爬梳與回顧，指出青年貧窮並非社福專業領域貧窮研究中，處在貧窮線底下的弱勢群體，而是青年遭遇工作貧窮，以及因為工作貧窮而遭遇困境的社會問題。我將以上述研究指出的範圍，尋找面向大眾探討青年貧窮問題的論述或文本。接下來，我進一步追問再現貧窮的研究有哪些，以及既有探討再現問題的研究提出什麼見解，作為本論文開展研究的依據。

二、再現貧窮的研究回顧

陳光興（1992）藉由將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相對照，提出：

文化研究的優點在於能夠指出「意義作用」的實踐過程，「意義」的生產與「再現」的政治。而弱點也正在於，無法解析外在於意識形態、其他層次的效果。¹²

基於此，陳光興認為在面對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擬仿、意義內爆、過度真實時，應將布希亞的理論讀成「對於歷史中再現的政治轉變的分析」。因此面對布希亞的理論，因將論點限制在一個效果層面，把擬仿視為真實運作的部份；而在同時不把它化約成社會世界中唯一操作的效果。以避免陷入跳脫社會現實，而糾結在文本再現真實與虛偽的迴圈中。

在這前提下，我們應認識到在生活之中的「非真實」或是過度真實的力量，如何在社會場域中運作，並產生了具體的效果，以及必須學習去處理和提出其中的政治性。因此：

我們必須將「影像」、「文本」、「符號」理論化為真實的部份，而不將它們只視為真實的再現。將擬仿納入真實，就是在躲避掉入真／偽這種不必要的陷阱，以及「再現的危機」。如此一來，文化分析也才能更逼近大眾的生活（找到大眾的語言）。¹³

陳光興上述論點提供本研究非常重要的方向。文化分析若不是為了更貼近大眾，或尋求能與大眾更連結互動的語言，就失去了研究的意義，也失去了文化研

¹² 陳光興（1992），頁 100。

¹³ 陳光興（1992），頁 102。

究作為批判理論的政治意涵。

例如夏曉鵬（2001）在〈「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中，就認為不能將任何「真實」視為理所當然，要以較批判的角度檢視「真實」，揭露社會建構背後的權力運作，或支撐權力的結構性機制。因而指出媒體彼此間複製同樣的一套論述，建構出新移民「外籍新娘」的刻板社會形象，這社會形象被媒體所生產，又被官員或專業人士認證，讓定義本身獲得續命力時，也建構出整體社會壓迫新移民的現象。

或郭力昕在《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2014）與《製造意義：現實主義攝影的話語、權力與文化政治》（2018）中，集結他諸多針對紀錄片或攝影的評論，以及探討再現政治與意義製造的研究。例如在〈人道主義攝影的感性化與政治化：閱讀 1980 年代關於蘭嶼的兩部紀實攝影經典〉（2008）中批判中產階級人道主義關懷的偽善、虛偽、贖罪式、獵奇。或在〈紀實攝影與意義建構的去／脈絡化：兩個案例分析〉（2008）一文中，藉由探討當紀實攝影不再其文本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情境中被理解時，意義如何被重新建構，以及進而產生何種政治效應。

其中郭力昕在文中參考批判論點時所提到的美國批判學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圍繞攝影文化提出許多批判與綿密的思考。最經典的在於「提出新聞／寫實主義攝影如何讓讀者在觀看現實災難影像裡的不安與震驚中，逐漸轉為麻痺無感。」¹⁴郭力昕（2014）就提出桑塔格這些圍繞攝影，開展的有關攝影與現實之間的辯證關係、攝影的政治與去政治性、人道主義攝影的濫情、攝影作為商品成為資本主義的共謀者……等等討論。

儘管桑塔格有一個從《論攝影》（2010b）到《旁觀他人之痛苦》（2010a）之間的態度轉換，桑塔格原本認為寫實主義攝影有助於認識現實世界，但也因為出於人道主義式的關懷與感動疲乏，因而不具政治能動性。但幾十年後出版的《旁觀他人之痛苦》，桑塔格又認為例如戰爭攝影中的照片，還是有可能激發人們的良知，進而採取政治行動的可能。但桑塔格從紀實攝影探討政治性有無的批判思考，給了我一個研究文本再現的思考方式。

上述研究都指出文本再現的政治性，桑塔格對於攝影文本的批判與思考，更點出辨識文本與真實互動後，指出文本再現真實世界的政治性。我們無法揣摩作者怎麼想，但可以藉由作者自己呈現的文本內容，來分析內容造成什麼影響，並推論文本與真實世界之間的互動，以及其背後蘊藏的政治意涵。這些政治意涵可說是否存有自我省思、自我批判？是否揭露真實的複雜與糾結，或挑戰既定的觀念與印象。

¹⁴ 郭力昕（2014）。再寫攝影，頁 201。

有了上述再現政治性的研究作為基礎，後續將梳理相關貧窮再現的研究，分別有林怡君（2004）的〈媒體吹起貧窮風：貧窮新聞的初探，兼及「新貧」議題之考據—以《聯合報》1999-2003 年 6 月為例〉；呂雅雯、盧鴻毅、侯心雅（2010）的〈再現貧窮：以電視新聞為例〉；以及王英倩（2010）的〈製造貧窮：台灣媒體對貧窮的社會建構—以 2000 年後的媒體文本為例〉。

林怡君（2004）以 1999 年到 2003 年 6 月的《聯合報》內容作為材料，研究新聞媒體如何呈現貧窮新聞。研究發現貧窮新聞通常呈現在社會新聞中，且貧窮的主角往往是犯罪的主角，或是悲劇新聞的遭難者。但不論貧窮者被如何呈現在報導中，貧窮新聞終究只是媒體業者呈現給閱聽眾的「商品」。也因此，這樣的內容無助於閱聽眾認識真實的社會處境，甚至忽略自身也遭受同樣的社會結構問題。而此類貧窮新聞中，往往主要以官方消息作為解釋，鮮少有貧窮者發聲的機會，因而使貧窮者的實際需求或遭遇的社會問題難以被呈現在新聞中。

但這上述問題，林怡君提出並非記者缺乏同理心，而在於貧窮問題的本質不被了解，這也是主流社會對貧窮的刻板印象。最後，林怡君也藉由研究貧窮新聞，觀察到媒體報導中出現的「新貧」問題，並提出新貧現象有七種類型與意涵指涉。

15

呂雅雯等人（2010）延續林怡君的研究，並進一步探討新聞媒體內容商品化的問題，藉由內容、敘事與符號學分析，探討電視中的新聞媒體如何再現貧窮。與林怡君（2004）有相似的發現。首先新聞媒體喜歡以戲劇化的手段展演貧窮，尤其喜愛呼籲善心人士幫助貧困者，藉以增加可看性，卻忽略深入報導形成貧窮問題的成因或解決之道。因此新聞中的貧窮報導往往僅止於個案處理，而從未延伸探討貧窮問題。也因為只處理單一貧窮個案，又加上喜愛渲染效果，因此常常強調個人影像或過度描寫個人處境，因而忽視貧窮問題可能來自社會不公的公共層面，形成將貧窮悲情化後感染觀眾情緒，並取消了進一步思考解決貧窮問題的可能。

為了渲染貧窮個案的處境，新聞報導喜愛強調貧窮元素，突顯貧窮者與社會中產階級在生活經驗上的差異，形成足以使中產階級獵奇的、被媒體「他化」為生活混亂的社會底層樣貌。此舉加強了社會不同階層之間對貧窮者的刻板印象。而上述處理貧窮新聞的方式與過程，無不在於讓閱聽眾為貧窮新聞感到動容不捨，藉以賺取收視率，即是將貧窮底層成為被消費與再次剝奪的「商品」。

王英倩（2010）也延續林怡君、呂雅雯等人的研究。王英倩將貧窮意義視為媒體製造的產物，認為媒體將窮人建構為不符合現代文明生活方式的群體，以滿足坐在電視機前的中產階級觀看，進而加深中產階級充滿同情心的，並關注社會

15 分別為：(1)國家社會政策與新貧戶；(2)對於他國與中國新貧問題的想像；(3)金權國家與中產階級問題；(4)消費商品與消費者；(5)政府政經作為與失業者；(6)知識新貧與知識新貧之內涵；(7)自由社會主義與福利公民、福利行動者

貧窮問題的觀感，而窮人則永遠是需要被幫助的弱勢群體。因此王英倩提出媒體製造三種貧窮的意義，分別為（1）中產階級的新貧化；（2）省錢大作戰及窮人商機的崛起；（3）將窮人境遇道德形象化，而與經濟領域無關。王英倩進一步指出這類媒體製造的貧窮意涵，間接鞏固了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既有階級結構。

林怡君、呂雅雯等人與王英倩接續針對媒體再現貧窮所做的研究發現，可整理歸納如下：

（一）貧窮再現在媒體產業中被商品化，且將貧窮者形塑悲情、弱勢、無助等窮苦刻板印象，藉以博取閱聽眾的憐憫與收視。

（二）將貧窮問題個人化，並採取悲情化、道德化的處理方式，使觀眾只停留在情緒感染，無法將貧窮問題化，進一步探討社會結構問題，或提高到社會不公的公共層面。

（三）加深主流社會中產階級對貧窮的刻板印象，也滿足中產階級對社會底層貧困處境與行徑的獵奇心態。

林怡君則特別提出貧窮者在媒體現在貧窮中，沒有發聲的機會，強調媒體主宰了話語權，因而貧窮者實際的需求或遭遇的問題，都是媒體因收視需求而形塑出來的形象。王英倩則特別提出貧窮問題在媒體產製中，還有省錢方法及窮人商機等產製內容，並進一步批判媒體製造的貧窮意涵，強化台灣資本主義社會既有的階級結構。

其中有趣的是林怡君在 2004 年也提出新貧問題，並嘗試給予新貧現象定義，王英倩在 2010 年更具體提出中產階級新貧化的現象，並試圖透過各種文獻資料解釋新貧化的問題。兩人於再現研究中發現與提出，也符合上述青年貧窮的研究發展回顧，並確實體現出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過後，新的貧窮問題越來越成為顯學。

上述林怡君、呂雅雯等人與王英倩的研究儘管提出各種媒體再現貧窮的問題，林怡君和王英倩也觀察到中產階級新貧化的現象，但卻並未觸及青年貧窮或世代貧富差距的問題如何在面向大眾的論述中被呈現。因此，本研究將接續研究青年貧窮如何在這些以大眾為傳播的論述中再現，提出：

（一）青年貧窮的文本再現了什麼問題？存有怎樣的社會想像？

（二）青年貧窮的文本再現揭露了什麼社會問題，又是否遮掩了什麼問題？

（三）再現青年貧窮的文本之間，是否存有某類書寫的共通模式？

（四）最後，本論文進一步提問青年貧窮的文本再現具有怎樣的政治性？

第三節、恩格斯與狄更斯：來自 19 世紀的參考

我在進行完文獻回顧後，對於青年貧窮再現研究有更為明確的方向與範圍，青年貧窮是延續新貧、工作貧窮的問題，並聚焦在年輕世代為主要呈現內容。雖然過去有貧窮再現的研究，卻還未有關青年貧窮論述再現的研究。因此，我將探討青年貧窮再現論述的政治性研究。但在展開研究前，我仍然缺少一個參考的方向或視野，即我如果認為當前的青年貧窮論述談論了什麼，又似乎遮掩了什麼，那遮掩的東西會是什麼？我又該用什麼視野來閱讀或挑選文本呢？

因此，再挑選文本與研究方法之前。我找到來自 19 世紀的參考對象，即來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恩格斯與狄更斯。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初期，恩格斯與狄更斯便敏銳的觀察到英國社會上的貧窮困境，兩人創新且具革新意義的書寫，不僅在當時掀起熱論，以現在來看也是書寫內容型式上的創始者地位。狄更斯首度以底層民眾為主要角色，並在小說中嘗試扭轉上尊下卑價值觀，恩格斯首次指出無產階級具有自己幫助自己，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

這一節，我將簡單談論本論文如何透過參考恩格斯與狄更斯，找到適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文本，研究當前青年貧窮論述的再現。

一、為什麼找恩格斯與狄更斯？

當前 21 世紀遭遇的經濟危機與貧富差距問題，早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初發展時便已存在，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後，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正是當時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發展最快的國家，這時的英國也是世界國力最強的國家，為了開拓全球商品市場也不斷向外擴張，成為當時殖民地最多的世界霸權。

狄更斯在《雙城記》裡給了維多利亞時代最好的註解：「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在這資本主義初發展的英國社會裡，前所未有的生產方式提高了生產力，經濟發展的成果促使社會上出現開始有能力從事休閒娛樂的中產階級，戲劇、文學、報導、旅遊等休閒娛樂開始紛紛出現。同時，也是因為生產方式的變革，社會上也開始出現只能販售自身勞動力求生存的人群，假若失去工作，也因為失去土地而無法務農維生，社會上開始出現隱藏在城市角落裡的貧困人民。

在維多利亞時代初期，有兩位年輕人，日後分別成為著名的革命家與文學家，分別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與查爾斯·狄更斯。兩人在當時極為敏銳的洞察英國社會的問題，並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關心社會並進行書寫。兩人不同的書寫方式，在當時造就不同的效果。因此恩格斯與狄更斯在同個時代裡，兩人如何呈現當時社會的貧困現象，給了我參考的方向。

我認為兩人的書寫有二個值得參照的特點，第一個是維多利亞時代初期在資

本主義社會初發展下，政治經濟體制剛開始形成運作的社會樣貌。在毫無法律限制與保護下，貧富差距極大，但也因此出現生活穩定但又有可能隨時墜入底層困境的中產階級；第二則是兩人的寫作皆具有代表性意義。在現今我們看來已認為是常態的書寫方式，在恩格斯與狄更斯那時代，兩人可說是先驅且發揚光大的創作者。

有鑑於此，參考狄更斯與恩格斯兩人在書寫中如何提出問題，又各自呈現什麼政治意涵，是組非常鮮明的對照。當 21 世紀的新自由主義發展遭遇危機時，兩人在當時代所具創新意義的書寫，有助我理解一個新的局勢變動出現時，社會問題在書寫中的政治性。因此我下面會先簡介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氛圍。並探討兩人書寫中的再現政治。

二、恩格斯與狄更斯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

在狄更斯於 1837 年到 1839 年之間於雜誌上連載《孤雛淚》後沒幾年，恩格斯在 1842 年來到英國，開始他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田野考察。不論是狄更斯小說裡反映的社會問題，或恩格斯在文章中揭露的工人處境，都剛好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r. 1837-1901 A.D.）統治時期，也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剛開始的年代。

要談論這時候的英國，恩格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向，便是從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始談起。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裡，提到英國最早的工業革命，是從蒸汽機和棉化加工機發明開始，鑒於機器生產設備的發明，促使手工業逐漸被機器取代，不僅促使商業與工業繁榮，廣大的殖民地也促進了便宜原物料的獲取，以及海外市場的擴張。¹⁶

恩格斯說「近六十年來英國工業的歷史，在人類的編年史中無與倫比的歷史」，¹⁷精準道出當時英國產業發展的興盛。當時英國的主要產業大致有棉紡織業、羊毛加工業、麻紡織業、蠶絲加工業。因應蒸氣機器所需，煤礦的需求大量增加，促進了礦業的發展。因應商品與原物料的運輸需求，以及蒸氣的發明運用，交通建設也在英國大量興起，除了公路外，更有許多運河供蒸氣輪船運行，以及修築鐵道供蒸汽火車通行。

英國作為世界霸權之首，國力為當時全球之最。英國能有此光景，除前述所說經歷第一次工業革命，促使國內產業型態變革外，也有當時社會結構的變革。歷經從 16 世紀開始，長達三世紀的圈地運動，農村勞動力逐漸往城市轉移，成

¹⁶ 國力興盛的英國在 1815 年聯合普魯士王國，在滑鐵盧擊敗拿破崙領導的法蘭西第一帝國後，逐漸奠定其在歐洲的霸主地位，擁有殖民地之數量為列強之首，遂有「日不落帝國」之稱，日後主導國際事務長達百年之久。可參考：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2015）。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黃中憲譯）。台北：麥田出版。

¹⁷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頁 295。

為城市裡工廠所需的勞動力，或留在家鄉成為佃農，讓貴族或地主能夠累積資本，進而由農轉工，發展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生產。

圈地運動迫使農民無法自給自足，離開土地的農民若沒有工作，便會陷入貧窮困境。因而失業造成的貧窮問題成為英國統治者不得不正視的社會問題，並制定相關政策。從 1555 年起徵收濟貧捐，到 1563 年開始徵收濟貧稅，到 1601 年要求各地教區徵收濟貧稅，直到 1834 年議會通過《濟貧法》的修正案。然而習藝所的各種管理問題，與如監獄般的生活條件，使濟貧政策帶有懲處窮人的思維，反而延伸造成許多社會問題。

然而因為收入穩定又有閒暇能夠休閒的中產階級也開始出現，並促進英國當時的流行文化和休閒藝術發展，例如戲劇、小說、旅行、下午茶等生活娛樂。在維多利亞時代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卻也因為每次的經濟危機，造成企業主縮減人事來降低成本，導致大量勞工會突然失去工作，並也在都市裡失去生存能力，各種窮困到生存艱難的社會底層弱勢，集中在大城市裡的貧民窟，與貴族、中產階級的享樂文化形成強烈對比。

在工業社會初發展時，勞工權益、勞動保障、就業規範或職場安全等概念，正用勞工的血汗經驗逐漸建立。在市場競爭機制中，工人被迫參與惡性競爭，而能找到工作的，又被惡劣的勞動條件所剝削。在當時英國國力強盛與中產階級興起之下，底層民眾的失業問題、居住問題、貧困問題，都集中到貧民窟並被視而不見，放任弱勢者自生自滅，或被充滿問題的濟貧法來處理。

而在政治部份，因城市出現大量中產階級群體，促使英國下議院在 1832 年改革法令，增加中產階級參與議會的機會，此外英國社會上也充滿各種不滿現狀的抗爭。恩格斯在《英國無產階級狀況》一書中的〈工人運動〉章節裡，就提到在 1824 年時通過修法，工人得以結社，使得過往只能秘密進行的工會運動得以浮上檯面，工人得以透過籌組工會、發動罷工來爭取提升薪資、工時改善等勞動權益。

而憲章運動更是當時社會上影響更廣的政治改革運動，爭取工人階級參與政治的訴求。¹⁸當時的憲章運動與激進的資產階級、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一同合作，甚至曾一同起草請願書，要求廢除穀物法和實施憲章。而廢除穀物法正是資產階級期望開放外國進口的低廉穀物，要求廢除原有保護地主而實施的進口關稅，因而與當時原有的貴族與地主的利益產生衝突。

此外，當時以工廠主歐文進行的社會主義實踐，在對資產階級不進行任何批

¹⁸ 倫敦工人協會委員會在 1835 年草擬了六條人民憲章：(1) 精神正常並且沒有犯過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選權；(2) 議會每年改選一次；(3) 議會議員支薪，使沒有財產的人也能夠當代表；(4) 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方面的賄買和恐嚇，選舉採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 設立平等的選區以保證平等的代表權；(6) 取消純屬形式的 300 英鎊地產的代表資格限制，使每個選民都同樣有被選舉權。詳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頁 516-517。

判與鬥爭下，期望在小範圍裡實踐財產公有的社會主義制度。恩格斯因而批判歐文這種社會主義為「一下子就把國家置於共產主義的境界，而不是進一步開展政治鬥爭以達到國家自行消滅」¹⁹。因為有此批判，所以恩格斯認為：

工人運動分裂為兩個派別，一派是憲章主義者，一派是社會主義者。憲章主義者比較落後，比較不開展，但他們是真正的道地的無產者，是無產階級的代表。社會主義者看得遠得多，提出消滅窮困的實際辦法，但他們來自資產階級，因此不能和工人階級融合在一起。²⁰

但不論是什麼派別，上述所提工人運動、憲章運動或空想社會主義實踐，都呈現出當時英國社會上，群眾透過參與運動期望改變困境的政治參與。從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抗議地主和貴族的穀物法，到訴求更多人能參與政治選舉的憲章運動，以及工人爭取自身權益的工人運動，到要求政府改善底層弱勢的濟貧法修法，無不體現出在休閒產業因應而生時，民眾的政治參與也正蓬勃發展。

這些不公不義，這些時尚娛樂，共同開啟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與動盪。英國昨為當時全球最強盛的國度，展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樣貌，帶來生產力的興盛與消費社會的到來，卻也同時造就剝削、苦難與資產階級跟無產階級的矛盾。

狄更斯、恩格斯所生活並書寫揭露的，正是這樣背景下的英國社會。因工業革命而國力強盛、生活富庶的英國，在國際上不僅是世界霸權之首，更是殖民地最多的帝國強權，在國內則興起一批開始注重生活品質的中產階級，使得整個維多利亞時代充滿欣欣向榮之感。

但也是這樣的英國，擁有最惡劣的社會競爭，以及最悲慘的貧民窟生活處境，以及各種被社會淘汰而難以翻身的弱勢群體。以及各種爭取更多政治參與的運動，以及工人爭取勞動權益的抗爭，在英國風起雲湧的四處開展。如恩格斯所說，「只有在英大不列顛，特別是在英國本土，無產階級的境況才具有完備的典型的形式。」²¹恩格斯所言，簡單的體現當時英國作為全球霸主，所具備最具探討社會問題的代表性。

在當前 21 世紀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出現經濟危機的動盪，且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下，當年恩格斯認為具探討社會問題的代表性，也提供我一個參考的視野與方向。若以維多利亞女王從 1837 年至 1901 年的統治，稱為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狄更斯與恩格斯就分別在這時代初期，分別以《孤雛淚》與《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批判與揭露這時代的不堪與問題。因此，下面我就透過兩人書寫的對照，尋找一個觀看當代青年貧窮再現的視野，以及書寫之中可帶有的政治意涵。

¹⁹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恩格斯在此的批判於後來的英譯本中有過更改，將後半句改為：「而不是通過國家的合乎規律的進一步的政治發展，直到這一過渡成為可能的和必然的。」詳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頁 525。

²⁰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頁 525。

²¹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頁 278。

三、狄更斯與恩格斯的書寫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與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前者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重要運動家與理論家，後者是繼英國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之後，在英語文學圈裡，最偉大的小說人物塑造者之一。²²

1836年，時為倫敦《時事晨報》記者的狄更斯開始為查普曼和霍爾出版公司撰寫畫報文字，最後集結為小說《匹克威克外傳》，在英國社會引起轟動並引起狂熱討論。狄更斯藉此成名後辭掉報社職務，開始專職寫作，並於1837年2月到1839年4月之間，開始於雜誌上連載《孤雛淚》（*Oliver Twist*），透過人道主義的關懷視野與對社會弱勢的同情，透過主角奧利佛·退斯特呈現英國社會底層貧民的處境，尤其是孩童悲慘的遭遇。²³狄更斯更因為《孤雛淚》成為維多利亞時期的第一個小說家，開啟新興文學時代。²⁴

三年後，彼時22歲的恩格斯於1842年11月來到英國曼徹斯特，擔任家族企業「歐門—恩格斯紡織廠」的總經理一職。恩格斯利用在英國期間，親身走訪並收集工人階級的生活處境，並將田調成果整理並發表在報章雜誌上，²⁵分別在《德法年鑑》發表〈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²⁶，並在《前進報》上發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²⁷、〈英國狀況。英國憲法〉。最後恩格斯於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之間，將這些在英國收集的材料統整並書寫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並在1845年5月時在萊比錫出版。

狄更斯與恩格斯先後出版《孤雛淚》與《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分別以文學和紀實報導的方式呈現社會底層人民的貧困處境。²⁸狄更斯的小說先以連載方式於雜誌上連載。恩格斯則是先將調查成果陸續發表在報上，最後在將材料集中撰寫成書。兩人創新且具革新意義的書寫，都在當時代掀起廣大爭論，影響非常大。

²² 蔡明燁（2012）。狄更斯誕辰兩百年。全國新書月刊（161），頁68-72。

²³ 請參考：謝天振（1994）。狄更斯傳。台北：業強出版社。

²⁴ 珍·斯邁利（Jane Smiley）（2005）。狄更斯：尋找救贖與幸福的小說家（鄭惠芬譯）。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²⁵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2000）。恩格斯傳（易廷鎮、侯煥良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²⁶ 寫於1844年1月，並刊載於1844年的《德法年鑑》上。主要描寫英國社會問題與英國工人狀況，並批判卡萊爾唯心主義的宗教觀。請參考：常艷（2010）。恩格斯晚年社會發展理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²⁷ 〈英國狀況。十八世紀〉寫於1844年2月，載於1844年8月31日、9月4、7、11日，《前進報》（巴黎）第70、71、72和73號上。〈英國狀況。英國憲法〉寫於1844年3月，載於1844年9月18、21、25、28日、10月5、16、19日，《前進報》（巴黎）第75、76、77、78、80、83和84號上。這兩篇文章主要分析英國產業革命，以及所引起的社會變化與政治變化。同時恩格斯批判英國憲法與政治制度的虛偽，認為資產階級及民主制的階級本質具有侷限性。請參考：常艷（2010）。恩格斯晚年社會發展理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²⁸ 在兩人的傳記中，可以看到狄更斯和恩格斯有一個有趣的相似之處，就是兩人都很喜歡到貧民窟，不論是觀察、體會貧民窟人群的處境和苦難，或是為了實際理解貧民窟的狀態。

狄更斯與恩格斯的這兩部作品，在面向大眾銷售的文字商品市場中具有接近祖師爺或開創者的地位。

狄更斯的《孤雛淚》除了是第一部以孩童為主角的英國小說，也是首度嘗試扭轉上尊下卑價值觀的小說，在小說中書寫貧民窟、諷刺社會時事，讓狄更斯因此成為維多利亞時代的第一個小說家，寫實的揭露大英帝國繁華的陰暗面，開啟維多利亞新興文學時代的盛世。²⁹

在恩格斯之前講述無產階級困境的書也很多，³⁰但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首次指出無產階級不只是受苦的弱勢群體，更是因為受苦受難的經濟地位，讓無產階級具有自己幫助自己，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也是第一本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探討經濟發展的變革推動社會歷史進程，並進而引起社會的動盪，形成社會中人們的生活處境，並將此系統呈現的專書。³¹

狄更斯的《孤雛淚》

狄更斯因為童年當童工的經歷，³²小說中常出現無依無靠的小孩。狄更斯首次描寫底層人民處境的《孤雛淚》，便是典型的例子。《孤雛淚》講述了奧利弗的母親在貧民習藝所裡生下他後便逝世，成為孤兒的奧利弗在苦境當中成為童工，加入扒手集團，又被友善的貴族所幫助。最後原來奧利弗的境遇在深刻體會現實悲慘外，還有一場陰謀詭計。奧利弗的善良與身世終究讓他得以脫離貧窮苦境，過上幸福生活。而一切的陰謀與詭計終究邪不勝正，最後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皆大歡喜作為結局。

狄更斯以寫實主義的手法深刻描繪底層人民的處境，在小說裡將各種當代的寫實情境融入劇情或背景之中，例如充滿問題的貧民習藝所，在底層人民中的犯罪與竊盜行徑，孩童去當童工、底層人民克難困苦的生活環境、或醫生對未婚生子的女孩的習以為常……等等，讓小說讀來充滿該時代的灰暗與不公不義，再現了當時社會上的情境。加上小說極具戲劇張力，讀來節奏流暢且高潮起伏，令人隨著小奧利弗的際遇而不時感到緊張或舒緩。

狄更斯透過文學的方式揭露社會問題的寫實主義筆觸令人讚賞，但在狄更斯的作品裡，道德、善惡通常是對立的存在，擁有個性鮮明的好人、與非常壞到骨子裡的壞人。雖然故事中也有呈現對現實感到糾結與無奈的底層人物。³³

²⁹ 請參考珍·斯邁利 (Jane Smiley) (2005)，頁 26-30。

³⁰ 例如法國歐仁·畢萊(1840)的《英國和法國工人階級的貧困》。請參考奧古斯特·科爾紐(1980)。馬克思恩格斯傳 III：1845-1846 (管士濱譯)，頁 124-12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³¹ 請參考奧古斯特·科爾紐(1980)。

³² 1824 年 2 月狄更斯 12 歲時，父親約翰·狄更斯因債務問題而入獄，狄更斯因此被送到一家鞋油廠做童工，直到同年八月才離開。請參考：謝天振(1994)。狄更斯傳。台北：業強出版社。

³³ 書中以描寫女配角南茜最為深刻，當貴族對南茜協助奧利弗，想要給予回報，對她伸出救濟的援手時，她卻認為自己已經來不及過上好生活了，因而不求任何回報。南茜充滿良善又已無法離開充滿罪惡的生活，最後被她的流氓愛人因誤以為她出賣自己而殺了她，在某種程度上，南茜

我認為狄更斯的《孤雛淚》有令人讚嘆的一面，揭露底層民眾生活樣貌的寫實主義寫作風格。但底層民眾的處境是如此的不堪，又遭遇這麼多苦難，這些問題卻在小說中被劇情的張力給消解掉了。我認為狄更斯的書寫在兩個處理方式下，消解了自身所提出的問題。分別為將悲慘處境的遭遇回歸到個人的道德良善，以及小說的美好結局，讓揭露的問題一起在小說裡被解決了。

《孤雛淚》也確實反映狄更斯對於政治參與的態度，以及對美好社會的想像。在狄更斯心中，慈善事業是仁愛與善良所產生的自然物。對於如何拯救社會，狄更斯認為社會問題主要出在人們漠然的態度與貪婪的私欲，因此他除了批判當時社會上的偽善，他也追求道德的良善以促進社會和諧。

因此，狄更斯雖然對激進的政治理念有相當認同，但他卻無法接受社會上的秩序被破壞，並反對任何革命運動、罷工、甚至任何鼓吹階級之間的暴力對抗。建立社會秩序是他心目中最崇高的理想。因此，狄更斯也對有錢階級逃避應負的社會責任大肆批判，並用他文學建立起來的名氣進行評論批判，以及慈善事業。

34

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相較下，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便是描寫英國工人階級處境的經典之作。在恩格斯 1842 年 11 月來到英國時，這時是英國工業發展如火如荼的階段，資產階級推動穀物自由貿易鬥爭貴族、城市裡的工人群眾透過推動人民憲章來爭取參與政治的權利。

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恩格斯用政治經濟學分析英國工人的處境以及其背後原因，主要環繞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並具體表現在各種商品以及延伸的制度問題中。例如食安、公衛、酒癮、醫療、幼保、教育、工傷等問題，恩格斯使用了大量的田野、官方或非官方資料，分析社會問題背後形成原因，且將問題指向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從中獲利的資產階級。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不僅描寫出底層民眾的貧窮與困境，也提出底層民眾的問題，例如產生了犯罪、道德敗壞、充滿絕望等。這使我們會不只同情的看待這些底層民眾，也看到貧窮的民眾產生許多社會問題，例如犯罪、酒癮、道德敗壞等。恩格斯從方方面面來寫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因此貧窮是日常生活的樣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是形成日常生活的背景因素，而這些問題具體從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中呈現，並導致底層民眾陷入各種困境中。

成為本書最為悲劇的角色。而另位貝茨，一直是扒手集團中的小弟角色，當扒手集團被瓦解後，作者只短暫的交代，經歷這些風波的貝茨開始思考是不是該靠誠實過生活，進而去當農工，並在多年的努力後成為小農場主。

³⁴ 狄更斯曾花很多心力在經營「天堂的小木屋」，專門收容從事性工作的貧困婦女，提供協助外並給予轉職訓練。請參考：珍·斯邁利（Jane Smiley）（2005）。

列寧認為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傑作，認為本書的重要性在於，恩格斯是第一個將無產階級視為社會變革的主體：

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寫過無產階級的痛苦，並且指出了幫助無產階級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一個說明了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的階級；說明了正是它所處的那種低賤的經濟地位，無可遏止地推動它前進，使它去爭取本身的最終解放。而戰鬥中的無產階級是能夠自己幫助自己的。³⁵

狄更斯與恩格斯書寫的政治性

因此，狄更斯與恩格斯兩人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好的想像，以及個人跟社會這大環境如何產生連結的想像，在兩人的寫作中明顯呈現出來。狄更斯追求的是社會的和諧，因此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的運作並不批判，但狄更斯非常重視個人在社會中是否善盡其該負起的社會責任，如果是底層民眾就是要透過努力工作讓生活得以過的更好，如果是統治者就該積極處理社會弊病，有錢人更該負起道德良知改善這社會的問題。狄更斯相信個人的道德良善，能更促使社會更加和諧運作，這一信念也表現在他的小說裡。

恩格斯則在日後與馬克思一同發展馬克思主義，與當時許多社會主義者進行路線對抗，並也積極投入共產主義運動，相信無產階級的覺醒，能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並帶來一個更理想、更公平更符合正義的社會。而恩格斯提出的無產階級作為改變的主體，是一種將資本主義社會與個人連結起來的論述方式，透過生產中的關係，上銜接到政治與經濟的分析，向下銜接無產階級作為改革的主體。相比下，狄更斯的文字中，只顯露出個人要如何在社會中以道德良善來為這社會的運作增添一分力，當每個人都存好心做好事，社會就會有如田園風景般的美好。

狄更斯、恩格斯兩人如何書寫出維多利亞時代初期的英國社會問題，以及他們如何在書寫中呈現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經過參照後給了我一個鮮明的方向，回到 21 世紀來探討青年貧窮的再現。在一個經濟危機帶來社會動盪的時刻，各種以世代或青年處境為題書寫的內容，無不呈現出台灣社會氛圍，然而這樣的書寫中，不論是世代為名也好，青年貧窮也好，都指出年輕世代如何面對當前社會上的政治經濟問題。

但個人遭遇怎樣的困境或問題，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如何？是否書寫出具政治意涵的內容？或其實遮掩了什麼政治內涵？便是我可以藉以參考並分析的方式。

³⁵ 列寧（197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寧全集，2，頁 38-39。北京：人民出版社。

第四節、研究方法

我在進行文獻回顧，並透過參考恩格斯與狄更斯的經典對照後，我將在此節提出文本的範圍與進行研究的方法。

一、文本範圍

2008 年金融海嘯後，貧富差距問題在全球範圍內成為顯學，以世代之間的貧富差距為題，或以青年貧窮為主打的論述，時常在主流媒介上出現。若以 2008 年金融海嘯為分水嶺，在這之前，相關專書大多呈現中產階級貧窮化的處境，也就是新貧問題，例如美國知名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就在 2001 年出版《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³⁶，並在 2015 年接著出版《Bait And Switch : The (Futile)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³⁷，這兩本著作在海內外都引起重大關注，因作者透過親身體驗，獲得第一手的寶貴資料，並用她擅長的文字能力，體現出美國底層人民的弱勢處境，以及白領階級實際正逐漸趨於弱勢的風光不再。

這正是前述文獻回顧中，青年貧窮研究的發展歷程裡，2000 年後新貧問題在台灣被提出的過程，而新貧問題在美國則發生更早在 1980 年代，在歐洲則發生於 1970 年代（吳佩瑩，2005）。也正是林怡君（2004）與王英倩（2010）提出中產階級新貧化的問題。

但在 2008 年以後，因為全球金融危機，青年貧窮的問題開始從就業處境呈現出來。國際勞工組織於 2010 年發表《全球青年就業趨勢報告》，指出 2009 年全球的平均青年失業率高達 13%，有 8100 萬人之多。台灣政府則在 2009 年時推出「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也就是俗稱的「22K」，原本用意是解決青年就業的困境，卻直接將青年就業的起薪瞬間拉低至 2 萬 2 千元，加深青年就業人口工作貧窮的問題。至此之後，青年貧窮問題不僅只在台灣，更是全球各國關注的重點。

有鑑於此，本研究為探討青年貧窮在主流論述中如何再現，因此將時間範圍定在 2008 年以後至今。而在參考恩格斯與狄更斯的經典文本後，我認為兩人同樣面向大眾寫作，又都是刊載在當時的雜誌或月報上，而青年貧窮的論述又並非新聞或報紙上的簡短報導能夠清楚說明，因此我將挑選雜誌或專書作為研究的文本。

³⁶ 中文書名為《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作者藉由實際參與服務業、清潔業等勞務工作，記下田野觀察，呈現出美國正有多數人口處在繁重的低薪勞務工作，且遭受普遍消費者對底層工作的輕視與壓迫。

³⁷ 中文書名為《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專欄作家化身高年級求職生的臥底觀察》，作者依然親自參與一般被認為白領階級的辦公室行政或文書工作，從中發現主流想像中的白領階級正遭遇越來越艱困的勞動條件以及工作壓力，並從中提出美國的貧富差距已比想像中來得更加嚴重。

由於財經雜誌或就業資訊雜誌極為重視就業市場與年輕人才就業的問題，因此年輕世代出社會後的各種處境，也就成為財經雜誌或就業資訊雜誌重視的課題。像《Career 職場情報誌》曾在 2003 年以〈六、七年級生，你為何不生氣？〉一文探討世代衝突的問題，³⁸《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在 2006 年也以「悶世代」作為特別企劃探討青年貧窮的問題。

然而就業資訊雜誌雖然有相關青年貧窮的專題，但雜誌內容大多以就業資訊為主，因此論述的篇幅不多，往往只有單篇。而財經類雜誌則較多深入且長期的追蹤報導，其中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的《遠見》雜誌就不時以特別企劃探討與青年處境相關的課題，且《遠見》雜誌 2012 年探討青年貧窮課題的「年輕人憑什麼贏」企劃獲得當年許多獎項。³⁹

此外，《遠見》雜誌的創辦人與董事長高希均教授，以鮮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領導著《遠見》雜誌的論調與風格。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困境造成青年貧窮的諸多問題時，高希均教授打造的《遠見》雜誌如何呈現青年貧窮課題，就特別具有探討的意義。

因此在眾多財經雜誌中，我認為《遠見》雜誌如何再現青年貧窮課題，別具代表性以及特別有探討的價值。因此我將以《遠見》雜誌作為主要分析的文本，研究《遠見》雜誌在 2008 年到 2017 年之間如何再現青年貧窮的問題，從 2008 年 1 月第 259 期到 2017 年 12 月第 378 期，共計 120 期，本研究篩選與青年貧窮再現相關之期別，共計 27 期作為主要分析的文本。⁴⁰

除雜誌外，我也挑選兩本面向大眾並以世代為主題探討青年貧窮的文本，分別為《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與《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崩世代》出版於 2011 年，《厭世代》出版於 2017 年，從 2011 年到 2017 年，兩本書分別用「崩」與「厭」形容一個世代。然而兩本專書各自有其書寫的脈絡，與書寫呈現的方式，以及所欲呈現的內容。並試圖與《遠見》這類財經雜誌呈現不一樣的論調。因此我認為就再現青年貧窮論述而言，以《遠見》雜誌加上這兩本具代表性的專書，能形成一個完整體現青年貧窮再現的論述內容。

二、研究方法

論述分析提出了一種批判的視角，避免將「問題」或「真實」視為理所當然，並關注意義建構及詮釋時所作的關連（linkage），或文本之外跟社會之間的各種文化資源是如何形成的，體驗出文本之間的政治性。

³⁸ 《Career 職場情報誌》第 330 期，2003 年 10 月發行。

³⁹ 2012 年 APC 亞洲出版獎創新合作傳播優選獎，與行銷傳播傑出貢獻獎的年度傑出新聞報導獎首獎。

⁴⁰ 期別詳細請參考論文附件。

游美惠（2000）認為論述分析能探討的內容更為廣闊，除檢視文本本身，也得關注文本建構使用的論述、相關社會場域(*institutional sites*) 和歷史文化因素。因此論述分析不進行任意拆解，物質性的基礎與實質效應都需要納入分析之中。

傅柯曾提出論述分析探討的內涵，知識—權力—主體三條主軸，以及瘋狂、規訓、性論述等主題，藉此以論述分析展開相關研究，進而影響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等思潮。Van Leeuwen 也提出論述是一種社會實踐，本身是一種行動方案，因此論述是再現社會實踐的一種知識形式。⁴¹

因此論述分析可以探討如何形塑規範，可以兼顧微觀與鉅觀的連結（*the micro-macro link*）。將文本與社會脈絡進行系統地分析，便能從文本中挖掘出社會意涵與運作機制。

據本論文文獻回顧，青年貧窮的現象從 2000 年以後開始出現，我認為由於青年貧窮的課題含括許多領域與層面，並非我能力所及。因此有關文本研究的方法中有內容分析法、文本分析和論述分析，但由於內容分析法較偏重強調量化分析，但較難回到文本與現象脈絡去關照。

文本分析通常對單一文本進行解析和意義詮釋，雖然也強調「互為正文的分析」或「語境分析」。但由於我認為青年貧窮的論述還是一個很大很多且雜的論調，以及前述涉及諸多領域與層面，因此文本分析也是我較難使用的方法。

而論述分析可以對媒體訊息的結構進行更加明顯化、系統化的了解作用。也認為論述分析可以將媒體結構與不同認知、社會、文化等脈絡屬性相互連接。並從中檢視論述是由特定的社會體制所生產出來的語言陳述，而意識形態是透過陳述來散播流傳。

由於從文獻回顧中體現青年貧窮所內涵的層面多而廣，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我以論述分析作為研究方法，並從四個方向作為我關注文本的特色，並對文本進行論述分析，分別為：（一）時間發展；（二）世代對照是否衝突；（三）個人與社會；（四）政治性。我期望透過這四個歸納方式，探討 2008 年以後的青年貧窮再現論述發展？青年貧窮是怎樣的世代問題或呈現出怎樣的世代對照？而青年貧窮中呈現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什麼連結？而又這個人與社會連結之間產生什麼政治性？並藉此回答青年貧窮論述的再現政治。

在前述介紹過文本挑選的範圍後，我在此說明我的分析框架與方式。由於《遠見》雜誌是月刊，在單篇文章上內容輕薄短小，又《遠見》因在市場銷售，得顧及內容是否營合社會的價值，至少不能是太過批判或太過激進的論點，因而凸顯主流價值。因此，我將在第二章分析《遠見》雜誌中的青年貧窮再現，以《遠見》作為代表，探就主流價值中如何呈現青年貧窮。

⁴¹ 倪炎元（2018）。論述研究與傳播議題分析。台北：五南出版社。

由於專書出版的內容多元，且書寫自由度大，在市場中是否熱銷，則端看出版的目的何在，對倡議或非市場商業考量的書籍而言，較沒有太多市場壓力，因此可以書寫較為批判，甚至相較下比較非主流的論調。因此，我將在第三章，以《崩世代》、《厭世代》兩本專書，在橫跨六年出版下，如何再現青年貧窮，以及是否提出有別於《遠見》再現青年貧窮的論調。

在最後第四章，我將把《遠見》、《崩世代》、《厭世代》再現青年貧窮的論述分析進行統整並總結，試圖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因此我將以論述分析作為研究方法，試圖發掘文本之間再現的政治性，探究青年貧窮論述再現說出了什麼問題，而又跟台灣社會之間具有何種連結與關聯。

第二章、《遠見》雜誌中的青年貧窮再現

青年貧窮成為台灣社會上廣泛討論的社會議題，是在 2009 年金融海嘯過後，政府為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由教育部提出「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俗稱 22K)，儘管用意良善，卻造成青年有了工作卻貧窮的處境，年輕世代領了兩、三年低薪後，發現景氣似乎開始回升，但薪資卻沒有跟著一起成長，整個社會開始不得不重視青年貧窮的問題，報章雜誌、新聞媒體也紛紛探討這問題。但青年貧窮被提出，並非 2009 年後才開始出現，早在 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經濟危機後，就已開始逐漸浮現。

當 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危機爆發，隔年台灣經濟出現自 1960 年代以來首次經濟負成長，失業率更是飆升，就業市場蕭條成為台灣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政府為挽救失業率，提供大量就業補助計畫，提供約聘僱職缺，雖有效解決失業率，卻也助長非典型勞動的聘僱模式，「新貧」問題開始逐漸被提出與討論。

過往對於貧窮的理解，主要在於沒有工作收入而陷入貧窮處境，因此群體大多聚焦在老弱殘幼，但「新貧」則主要指有工作卻仍然處在貧窮困境。當「新貧」、「工作貧窮」的現象開始出現時，青年世代陷入工作貧窮，或因為低薪而陷入困境的狀態也開始逐漸浮現。

根據新聞媒體報導的歷史紀錄，青年貧窮成為重要課題被提出來，最早應是泛紫聯盟在 2004 年召開「青年，你的名字叫貧窮！」記者會，訴求學生打工的時薪從 66 元調整到 90 元，⁴²之後 2005 年 4 月 19 日成立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更以爭取青年勞動者權益為主要訴求，關注青年貧窮的議題。台灣立報更從 2009 年起有「面對青年貧窮化」專欄，以批判資本主義的視野探討青年貧窮以及其他社會問題。

財經雜誌則以報導財經資訊、產業動態、經濟發展等資訊為主，因此在產業發展中最為重要的人力問題，是財經雜誌不可或缺的主題。尤其當社會新鮮人初入社會時，因應不同的成長背景與教育環境，影響的不只是社會新鮮人本身，在職場中的管理層級或公司老闆，都得適應新進入就業職場的年輕世代，磨合彼此之間的工作關係，不論是主管要帶新鮮人，或社會新鮮人開始要適應職場。

因此新世代年輕人對待工作的態度、價值觀以及其教育養成等，總在職場中突顯出來。尤其當台灣經濟在發展遭遇困境下，期望產業能更創新、人才能夠進入就業市場，科技日新月異下，努力跟上產業變動的浪潮，年輕世代投入就業市場、就業市場需要年輕人才等等的就業問題，就成為財經雜誌極為重視且會特別探討的主題。在此情況下，年輕一輩出社會後的各種處境，也就成為財經雜誌重

⁴² 《中央日報》。2004 年 11 月 4 日。〈泛紫聯盟：青年貧窮化 扁政抽手〉。以及《聯合報》。2004 年 11 月 11 日。〈泛紫：重視青年貧窮問題〉。

視的課題。

因此，像《Career 職場情報誌》以青年職場就業為主的雜誌，最早就曾在 2003 年以〈六、七年級生，你為何不生氣？〉一文探討世代衝突的問題，⁴³2005 年也因應前述「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抗議，以〈青年貧窮化 勞資衝突的新地雷〉一文探討青年貧窮的問題，認為「青年貧窮化，將是台灣社會最不可忽視的一顆未爆彈！」。⁴⁴出版商天下雜誌群的《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在 2006 年也以「悶世代」作為特別企劃探討青年貧窮的問題。⁴⁵

而在 2008 年到 2009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台灣經濟再次遭受波及，原本 2000 年網路泡沫經濟化危機造成的失業率，在 2003 年後逐漸降低到 3.91%，到 2009 年又來到 5.85% 的新高，同年教育部提出 22K 政策，雖有助減緩失業率問題，卻將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起薪壓低，造成青年薪資難以提升，也影響到整體薪資成長的幅度，經過幾年的時間發酵，當經濟不景氣逐漸好轉時，青年貧窮卻成為社會上的普遍現象，新聞媒體、報章雜誌，無不報導青年貧窮的課題，中國時報也在 2012 年以「悶世代」為主題開展系列報導。

除了新聞媒體製作專題，財經類雜誌更有深入且長期的追蹤報導，其中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的《遠見》雜誌就不時以特別企劃探討與青年處境相關的課題，例如第 286 期的特別企劃「六年級生前途閃亮學 職場進化論：35 而立」專題，⁴⁶就探討六年級生的處境，第 314 期以「年輕人憑什麼贏」為封面主題，整期探討年輕世代遭遇各種困境的問題。⁴⁷更透過三支微影片以多媒體串聯的方式延伸探討，⁴⁸並舉辦北中南三場巡迴論壇，甚至發起青年夢想起飛公益募專刊計畫，對於年輕世代的困境不僅深入探究，更以具體行動來實踐其理念。

《遠見》雜誌對年輕世代困境的關心，也讓《遠見》雜誌獲獎無數，「年輕人憑什麼贏」此一企劃不僅獲得當年度 APC 亞洲出版獎創新合作傳播優選獎，更獲得行銷傳播傑出貢獻獎的年度傑出新聞報導獎首獎。而根據尼爾森媒體調查，《遠見》雜誌在 2012 年時，是台灣平均每期閱讀人口成長的第一名，也是同年唯一兩位數成長的財經雜誌，成長率高達 15.2%。⁴⁹《遠見》隔年更拿下第 37 屆金鼎獎最佳財經時事類雜誌獎。

除了《遠見》雜誌在青年貧窮議題火熱時銷售成績最好外，《遠見》雜誌的創辦人與董事長高希均教授，以鮮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領導著《遠見》雜誌的論調與風格。當社會上批判新自由主義發展遭遇困境時，高希均教授打造的《遠

⁴³ 《Career 職場情報誌》第 330 期，2003 年 10 月發行。

⁴⁴ 《Career 職場情報誌》第 350 期，2005 年 6 月發行。

⁴⁵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第 68 期，2006 年 5 月發行。

⁴⁶ 《遠見》第 286 期，2010 年 4 月發行。

⁴⁷ 《遠見》第 314 期，2012 年 8 月發行。

⁴⁸ 三支微影片分別為〈黑手也能變金手〉、〈音樂家的早餐店〉、〈不像命運低頭的派報人生〉。

⁴⁹ 《遠見》第 319 期，頁 18。

見》雜誌如何呈現青年貧窮課題，就特別具有探討的價值。

高希均教授 1977 年在《聯合報》發表〈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文，引入美國知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的經濟學理念，引起當時社會廣泛討論。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大意就是每件事都要付出代價、每件事都有機會成本，因此沒有白吃的午餐。高希均教授一路走來、始終如一，1996 年 12 月以《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為書名，2017 年出版《翻轉白吃的午餐：台灣從小龍年代到溫水青蛙的警示》，雖然都是收集他平常發表的文章，但都是在倡導米爾頓·傅利曼所主張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理念。⁵⁰

《遠見》固然不能代表諸多財經雜誌，也並非台灣第一本財經雜誌，但創辦人與董事長高希均鮮明且堅持四十幾年來的自由主義理念，說明其旗幟鮮明擁戴並期望資本主義社會變得更和諧、更美好的資產階級立場。因此，我認為在高希均主導大方向下的《遠見》雜誌，極具有代表性。⁵¹

因此，《遠見》雜誌在青年貧窮課題最為引起關注的 2012 年之際，不僅深入報導，更因此獲得許多獎項肯定。其創辦人與董事長高希均教授鮮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以及鮮明的資產階級立場下所領導《遠見》雜誌的論調。都讓我認為在眾多財經雜誌中，《遠見》雜誌如何再現青年貧窮課題具有研究的代表性，以及特別有探討的價值。後續我就將以《遠見》雜誌作為主要分析的文本，研究《遠見》雜誌在 2008 年到 2017 年之間如何再現青年貧窮的問題。

第一節、2008 年後《遠見》雜誌中的青年貧窮再現

《遠見》雜誌創辦於 1986 年，以「成為台灣以及整個華人社會中『前進的動力』」為使命。創辦人高希均提出創辦《遠見》雜誌的兩個宗旨，一為傳播國際知識，增進世界觀；二要揚棄偏見，提倡遠見。因此《遠見》雜誌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己任，期望透過傳播讓讀者掌握全球局勢變動，進而關心台灣的現狀與未來。

《遠見》雜誌也確實如其宗旨所說，非常關注台灣的時事，以封面故事或特

⁵⁰ 詳見高希均（2017）。翻轉白吃的午餐：台灣從小龍年代到溫水青蛙的警示。台北：天下文化出版。

⁵¹ 1974 年創刊的《財訊》月刊，是台灣第一本財經雜誌。第一本財經周刊，則是創立於 1987 年的《商業週刊》。而第一本加入報導新聞的財經雜誌是 1981 年 6 月創辦的《天下雜誌》，當時的《天下雜誌》由殷允芃、高希均與王力行共同創立；後來因對雜誌的發展想像不同而分家，據《天下雜誌》主筆李雪莉在〈天下三十〉一文中所提：「創刊第五年，《天下》三位創辦人分家，殷允芃繼續領導《天下》、高希均和王力行專注《遠見》與《天下文化》；當時主要是路線之別，殷允芃強調走新聞媒體專業並以台灣為優先，高希均希望更專注企業經營甚至擴展至大陸。」。請參考〈天下三十〉，網址：<https://www.cw.com.tw/about/philosophy03.php>，檢閱日期：2019 年 6 月 3 日。

別企劃專題介紹台灣相關熱門議題，或介紹世界趨勢。這些議題中也包含經濟危機下，一般大眾遭受到的影響，以及台灣整體社會的氛圍，例如失業問題、就業問題、青年處境…等等。

我以 2008 年金融海嘯後作為起點，爬梳 2008 年至 2017 年之間，《遠見》雜誌探討有關青年貧窮的企劃或文章，這之間我以談論有關青年失業問題、就業問題、世代、青年處境等有關的文章，作為主要探究的內容，試圖整理出從 2008 年到 2017 年之間，《遠見》雜誌如何呈現青年貧窮的課題。

一、從新貧、工作貧窮到青年貧窮

如前述所說，青年貧窮大約是在 2009 年後才開始在新聞媒體、報章雜誌中形成討論，但早於 2000 年網路泡沫經濟化危機後，新貧問題、工作貧窮問題就已形成諸多討論。在 2008 年 4 月《遠見》第 262 期的特別企劃「發現台灣『薪』藍海」中的〈薪人王、派遣王、兼差王 不景氣一樣成王〉一文裡，就探討非典型聘僱與起薪低的受訪者，各自如何憑藉著努力、對工作的積極態度或找到商機，反而突破困境，例如從派遣變正式員工，或是兼差反而賺大錢。

2008 年 8 月《遠見》第 266 期的特別企劃「集體創意 終結貧窮」，探討全球化下貧富差距的問題，提出聯合國在 2000 年發表《千禧年宣言》，要在 2015 年時，將生活在貧窮線 1 美元以下的 12 億絕對貧窮人口減少一半。而在 2007 年時，全球絕對貧窮的人口已減少到 9.8 億人。⁵²當全球絕對貧窮人口在減少時，全球貧富差距擴大卻又增加新的相對貧窮人口。

台灣以平均消費支出的 60% 作為低收入戶的貧窮線標準，但從 1998 年到 2007 年之間，落入貧窮線下的人口增加 9.5 萬多人，貧窮人口占總人口數比率從 0.57% 提升到 0.96%。而 2006 年，當受雇者平均月薪增值 1.77% 時，物價漲幅卻有 1.8%，反映受薪群體集體變窮的狀態。⁵³

因此接近貧窮線而未掉落貧窮線下的近貧族，或不被列為低收入戶卻面臨貧窮處境的新貧，都是台灣要面對的貧窮課題。因此《遠見》第 266 期透過都市原住民、單親媽媽的成功脫貧經驗，探討新貧族如何脫貧的問題。

《遠見》第 267 期封面故事「撿回來的校長獎」，探討台灣貧富差距擴大下，弱勢偏鄉兒童的教育問題。偏鄉處於弱勢困境的兒童，大多來自弱勢、失能的家庭，在全台灣整體弱勢家庭惡化增長的情況下，偏鄉區域的弱勢家庭因缺乏社福資源，處境更加艱難。

《遠見》也在第 267 期中，與伊甸基金會合作，針對 25 縣市進行弱勢指標

⁵² 《遠見》第 266 期，頁 231。

⁵³ 《遠見》第 266 期，頁 232。

大調查，結果發現「10年來，台灣弱勢群體家庭情況越來越嚴重。」⁵⁴而造成弱勢家庭增加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失業率的高漲。

從2008年以來這些特別企劃，可以看到《遠見》持續關心因經濟不景氣而導致的新貧問題、工作貧窮問題。而在2008年12月《遠見》第270期的特別企劃「流浪畢業生」專題，開始出現探討年輕世代的處境，聚焦討論大學畢業生在大學學歷貶值與經濟危機下，遭遇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例如畢業生投履歷200封也找不到1個工作，或名校生賣雞排等。進而點出台灣高等教育與產業之間供需失衡的問題。

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嘯，重創全球經濟，台灣經濟也受到影響，失業率更是成為社會問題，影響許多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王力行在2009年3月發行的《遠見》第273期裡，寫了〈如果你失業了〉一文，點出經濟危機造成全球範圍的失業問題。

隔個月的4月《遠見》第274期，就以「50萬白領大轉型」作為封面主題，探究台灣白領的失業問題，在封面主題的介紹文章〈50萬白領大轉型〉一文中，就點出不景氣、失業潮造成社會上人人惶恐的氛圍，連過往金融業、科技業等勞動條件較優渥的白領工作，也在金融風暴的動盪中遭遇危機，文章開頭生動形容這波失業浪潮：

該怎麼形容目前的職業市場呢？

那就像一艘艘大船遭遇湍流，在大河上左搖右晃。正前方，竟然又出現了大瀑布，船隻們來不及掉頭，艘艘如自由落體般墜落……。

船上的人群，被甩了出來的，救命嘶喊聲不斷。倖存留在船上的，個個都濕了身，狼狽不堪。

這瀑布，就是金融危機引爆的全球經濟衰退。這大船，就像是一間間大企業、大集團。船上的人，則是你我一般的工作人。⁵⁵

在此特別企劃中，是以白領作為主題，因此受訪者的年齡從36歲到48歲都有。也從〈重新開機 30、40、50世代的轉型對策〉一文中，可以明確看到三個世代的年齡層分別為25到35歲、35到45歲以及45到55歲。金融海嘯造成的經濟不景氣，所影響的層面不只單一某個年齡群體，而是面向不同年齡層。

一年過後，2010年4月《遠見》第286期以特別企畫「職場進化論：35而立」，探討六年級生中後段班群體的處境，在2010年4月時探討這課題時，六年級生被如此描繪：

⁵⁴ 《遠見》第267期，頁196。

⁵⁵ 《遠見》第274期，頁137。

誰是此刻台灣的 30 世代呢？正是民國 60～69 年次間出生，過去被灌上沒有抗壓力的「草莓族」稱號的「六年級生」，今年正好全部進入 30 歲的關卡。過去的草莓族，霎時間全進入「準中年」，到底這一代的徬徨、機會與挑戰在哪裡？⁵⁶

回顧六年級世代的成長背景，可說六年級成長在台灣剛好經濟發展的年代，「適逢 1970 到 1980 年間的十大建設，也就是台灣早期大興土木，推動各項基礎建設的十年」⁵⁷而求學階段則剛好遇到台灣經濟最蓬勃發展的黃金十年：

股市在 1989 年破萬點大關，1990 年更上漲到 1 萬 1983 點的歷史新高。房地產也大漲，經濟呈現一片榮景。⁵⁸

六年級生也剛好遇上電腦與網路共同發展的數位時代，因此六年級生可說成長背景中經歷朝氣蓬勃的經濟發展，數位資訊的多元發展，國際視野、多元資訊隨手可得，然而「一走出校園，卻遇上職場上最悲慘的十年風暴。這也讓他們成為第一個由富轉儉的世代。」⁵⁹

六年級生若跟父母輩的四年級、五年級生相比，生活經歷似乎剛好顛倒過來，有別於四、五年級生小時候物質缺乏、處於戰後經濟發展的初階段，六年級生剛好成長在社會快速發展的階段，然而剛出社會找工作，卻開始遭遇經濟走下坡：

六年級生，出生在富裕年代，但工作求職時卻遇上麻煩的景氣不佳、高失業率，甚至台灣經濟成長遲緩的困境，反成了愈吃愈苦的「甘蔗人生」。⁶⁰

從這時候起，《遠見》談論台灣就業環境、經濟發展等問題時，已越來越傾向聚焦於年輕世代的處境談起，也使得青年貧窮的探論開始逐漸浮上檯面，成為《遠見》開始持續關注的問題，從這個變化中，可以看到關於社會新貧問題、工作貧窮、窮忙的討論，逐漸往呈現青年世代的貧窮處境發展。

2012 年 1 月《遠見》第 307 期〈「小資世代」來臨，敢享受卻更務實〉一文，談論「追求自我的六年級後段＋七年級前段」，提到當年 2011 年走紅的偶像劇《小資女孩向前衝》，因反應當下年輕世代的處境與社會氛圍，因而讓大陸走紅的用詞「小資」⁶¹一詞紅到台灣，成為兩岸共同的流行用語。

「小資」一詞在台灣，意指出社會幾年後，比較有固定收入與存款，開始追

⁵⁶ 《遠見》第 286 期，頁 228。

⁵⁷ 《遠見》第 286 期，頁 228。

⁵⁸ 《遠見》第 286 期，頁 228。

⁵⁹ 《遠見》第 286 期，頁 231。

⁶⁰ 《遠見》第 286 期，頁 232。

⁶¹ 小資一詞為「小資產階級」的簡稱。在馬克思主義中，原指小商人、工匠或技師等自僱營業者，因並非受雇者、也非從事農務採集，所進行的生產又還未形成如資產階級般，以僱傭大量人力進行生產的方式進行大量生產，並從事剩餘價值的積累，因而稱為小資產階級。後來不論在大陸或台灣，「小資」一詞的用法都已與原意不同。

求一定生活品質的年輕群體。而這樣出社會幾年的群體「大約 25~35 歲之間，正值台灣六年級後段班與七年級前段班。」⁶²代表的是一個世代的生活態度。

所謂生活態度是指願意將錢花在有一定品質的事物上，文中指出「小資世代雖然幼時的社會大環境很好，但長大後面臨的是景氣緊縮，薪水不比上一代。」⁶³因此不是亂花錢，而是精打細算，會願意在一些不在意的事物上省吃儉用，並將錢花在喜愛的事物上，追求一定的生活品質。

「小資」浪潮作為一個現象，體現出一種新世代的生活樣貌在社會上開始引發關注與討論。2012 年 4 月《遠見》第 310 期就針對網路世代的青壯年，以「覺得自己幸福嗎？」為主題進行調查，並分析出：

各年齡層中滿意度最低的，則落在 25~29 歲間，只有 45.7%認為自己幸福，亦即超過一半認為自己不幸。⁶⁴

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感到不幸福，可以看到年輕世代受到環境影響，因而感到不幸福，也缺乏自我實現感：

近年來台灣 30 歲以下的年輕世代面臨失業率比其他年齡層高三倍、達 12% 的陰影，讓他們對於自我實現的滿意度也成為各年齡層中最低的，只有 27.9%。⁶⁵

《遠見》這樣的調查也確實反應出當時年輕世代感到貧困的社會氛圍，也是從這時候起，年輕世代的處境與困境越來越浮上檯面。前期出現的小篇幅文章或調查彷彿預告，《遠見》之後的一連串企劃，開始聚焦年輕世代，並進行討論。

隔了 4 個月，2012 年 8 月《遠見》第 314 期以「年輕人憑什麼贏」作為封面主題，針對年輕世代的處境推出一系列企劃，包含第 314 期整期的企劃探討，更透過三支微影片來多媒體結合，⁶⁶呈現年輕世代的貧困處境。更舉辦北中南三場【年輕人憑什麼贏】全國巡迴論壇，邀請專家學者一同來探究年輕世代遭遇的問題。最後更發起「青年夢想起飛公益募專刊計畫」，透過《遠見》的社會影響力，來為追夢的青年募款，提供相關資源。

從這些企劃內容，可以充分感受到《遠見》作為一個有理念的企業，非常關注年輕人的處境。《遠見》總編輯楊瑪利在第 314 期〈全民動員，為台灣年輕人找出路！〉一文中，就點出《遠見》關心的重點：

經過了大半年訪問，其實可得出一個結論，台灣的確已走過快速成長高峰期，

⁶² 《遠見》第 307 期，頁 65。

⁶³ 《遠見》第 307 期，頁 66。

⁶⁴ 《遠見》第 310 期，頁 217。

⁶⁵ 《遠見》第 310 期，頁 217。

⁶⁶ 三支影片分別為〈黑手也能變金手〉、〈音樂家的早餐店〉、〈不像命運低頭的派報人生〉。

此刻的年輕人要像過去那樣，跟著大環境水漲船高，不管是誰都能年年跟著加薪、升遷的時代，的確是過去了。

但是，這不代表所有的年輕人都失去了加薪、升遷與完成人生夢想的機會。我們拜訪各行各業，發現很多高薪或是很有前景的工作，沒有年輕人要做。我們也發現年輕人購屋好像一下子想的是豪宅或精華區房子，其實許多交通便利的地方也有年輕人負擔得起的房子。而許多年輕人因為累積知識與專業，也讓自己十分搶手。換言之，儘管社會新鮮人的起薪倒退到 1998 年的水準，但只要找到方向、堅持努力，台灣這塊土地仍然提供了許多機會給認真努力的人。

.....

綜合本期意見領袖的意見，也可得出，儘管時代不同、成功領域不同，做事方式可能不一樣，但不管任何世代，年輕人希望完成心目中的成功夢想，其實需要的態度、堅持、努力等，跟過去世代並沒有什麼不同。過去一段時間，一些社會意見領袖與政治人物不斷發言，台灣年輕人會陷入困境，是政府的錯、企業的錯、教育的錯，政府必須用很多社會福利來幫助年輕人。

但是年輕人，你要陷入抱怨，然後等待救援？還是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打造屬於自己的機會？

希望本專輯可以讓更多人一起關心年輕世代，一起找出路。也希望提供自覺陷入失落的年輕人，值得思索的參考。⁶⁷

從楊瑪利的文章中，清楚看到《遠見》雜誌關注年輕世代的處境，台灣社會確實出現問題，不論是已走過快速成長高峰期，或起薪倒退到 1998 年的水準；政府、企業、教育也確實出現問題，導致年輕人陷入困境。但面對大環境，年輕人卻不該自怨自艾，而該努力打造自己的機會。

從這時候起，青年世代遭遇的境成為探討台灣社會問題的重點，從 2008 年的新貧、窮忙，到後來 2010 年開始談六年級生，2012 年起，年輕人的困境逐漸浮上檯面，成為不得不去探討與重視的問題。

二、2012 年後《遠見》怎麼談青年貧窮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到青年貧窮的困境被提出來討論，不僅跟隨社會的脈動，也有一個逐漸浮上檯面的過程，而 2012 年 8 月《遠見》第 314 期的「年輕人憑什麼贏」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從這期開始，年輕人處境、青年貧窮課題開始被聚焦討論，因此接下來我將談論《遠見》怎麼談青年貧窮。

⁶⁷ 《遠見》第 314 期，頁 35。

在第 314 期的主題文章〈他們是台灣必須面對的未來：小薪青年：400 萬 30 世代的困境人生〉一文中，提到許多年輕人的處境，例如描述年輕世代成長的背景，以及所接觸的科技環境：

他們自小生長在充滿娛樂、科技的物質環境，沐浴在民主、自由的開放社會氣氛，但面臨人生抉擇與艱困的未來，卻顯得無力感重重。他們一生下來，就開始盯著客廳的電視，到了學生時代，電腦、網路、手機，陸續進入生活。體驗到前人從未經歷的感官刺激、科技應用、及虛擬世界文化，自成一個獨有的「美麗新世界」。

不少研究都發現，這代年輕人擅長一心多用、多工作業、24 小時不關機，他們的困擾是資訊太多、無法專注。⁶⁸

然而年輕世代生長在各個社會層面都成長進步的環境裡，為何還會身處困境呢？文章中進一步提出：

為何擁有高學歷、思想最自由、科技能力最強的年輕人，會看不到希望？答案可能是社會流動的停滯，讓他們感到灰心。

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以及高不可攀的房價，想靠老實工作翻身、實現夢想的機率，似乎變得愈來愈小。⁶⁹

因此，停滯的社會流動、貧富差距拉大、高不可攀的房價，都形成年輕世代陷入困境的問題。而 2008 年以來不斷探討的新貧問題、窮忙問題，非典型聘僱或越來越差的勞動條件，也都是年輕世代得面對的社會困境：

不少具備高學歷的青年，都落入低門檻、低工資、低技術的「三低行業」，只能用時間或勞力換取報酬，即便白領階級，也常困於「責任制」牢籠。為降低成本，愈來愈多企業用人趨於彈性化，不僅拉低就業品質與勞動條件，也增加青年不安全感。⁷⁰

但為何當時社會上會形成一股青年陷入貧窮困境的社會氛圍，文章中卻提出獨特見解：

生活中諸多的不滿與無奈，讓大批憤怒青年成了「糞青」，到處宣洩負面情緒，透過科技媒介不斷散播，形成集體憂鬱。

面對主導局勢的上一代，他們不但收入微薄、地位卑微、連夢想都顯得微小，稱他們「微青年」，十分貼切。⁷¹

⁶⁸ 《遠見》第 314 期，頁 54。

⁶⁹ 《遠見》第 314 期，頁 56。

⁷⁰ 《遠見》第 314 期，頁 58。

⁷¹ 《遠見》第 314 期，頁 60。

也就是說年輕世代的情緒結合了年輕世代熟悉的科技媒介，將原本存於個人體驗的生活不滿與無奈串聯起來，最後形成一股憂鬱的社會氛圍，而跟上一代相比，更突顯年輕一輩的困境。

《遠見》後續文章〈日本青年 經歷裁員和衰退，失去做夢能力〉、〈韓國青年 肚子都餓不飽，哪能談理想？〉、〈中國青年 蝸居、裸婚、逃離北上廣〉、〈英國青年 人事凍結，找份工作需二年〉，透過與各國比較，提出青年困境是全球各國都在面對的問題，且不單只是經濟問題，也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緊接著的青年觀點調查中，甚至以狄更斯的經典名句作為開場，對照當前年輕人遭遇的處境：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生於 1812 年的英國大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的小說《雙城記》開頭是這樣寫的。這一句舉世流傳的經典名句，聽在距離狄更斯 200 年、近 1 萬公里遙遠的今天多數台灣青年耳裡，不知道能否前後兩句都得到認同？⁷²

儘管調查中點出最讓年輕人感到壓力的為財務問題，也指出 85% 的年輕人不滿意目前薪資，但在之後的〈小薪青年有話要說：我很努力地拚，為何翻不了身？〉一文中，進一步講述年輕人努力卻仍然感受不到前進的希望時，卻也提出到底年輕人遭遇這些困境是因為找不到工作？還是挑工作？還是真的遇到困境？文中就寫道：

現在隨便上網搜尋，都可看見一大堆青年急著吐苦水，輪番抱怨時代條件差、痛罵政府無能、討厭老闆腦殘、苦惱為何父母不支持自己的夢想，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集體的鬱悶氣氛。對於「小薪青年」說不完的種種煩悶，《遠見》選擇走出去實地接觸、近身採訪，觀察青年到底遇到了哪些困境？背後反映了哪些社會現象？又有哪些是年輕人自己必須負責的呢？⁷³

後續的特別企劃「愛拚卻不定贏」專題中，《遠見》訪問許多不同處境的受訪者，呈現出許多年輕世代的困境，比如努力工作追夢、為追求夢想省吃儉用，或不怕吃苦也肯做傳統產業的年輕人，或是寧願苦一點也要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有理念的青年。而在特別企劃「別再貼我標籤。」專題中，《遠見》也透過線上訪調，調查年輕人最排斥的標籤，並在最後透過受訪者表示：

王文華提醒，前輩們看年輕人的眼光，要避免把自己的價值觀硬套在對方身上，假設下一代的穩定性真的很差，與其批判他，倒不如先接受，更重要的是想辦法引導年輕人往正面發展。

⁷² 《遠見》第 314 期，頁 86。

⁷³ 《遠見》第 314 期，頁 111。

同樣的，台灣工業銀行集團策略長駱怡君也為青年說話，「責怪他們沒有好的工作技能和職場倫理，大人和教育體系都要負更多責任，」她提倡，上一代應該要檢討為什麼會栽培出無法獲得肯定的人才。⁷⁴

還在探討年輕世代被貼籤的〈青年最討厭被當成 草莓、啃老、低頭族〉一文，隨即內容一轉，即開始轉為〈想要出頭天 先破除自己的迷思〉，點出年輕人的一些迷思，例如工作應該要先求有再求好、買房可買在市中心外的區域、薪水不高也能理財，以及除了年輕人自身的觀念外，「不少父母也因為管太多，而讓子女失去獨立機會。」⁷⁵

因此，年輕人的問題，除了年輕人自身存有迷思外，「三多父母」也形成問題，三多即是：照顧太多、給太多、管太多。但探討完這些問題後，年輕人要如何不要再被貼標籤，就要打破這些年輕人自身存有的迷思，因此接著一系列的文章，就試圖打破年輕人的迷思，例如：〈想加薪？先問自己憑什麼？〉、〈理財難？學學不虧待自己的存錢法〉、〈房價高？換個想法你就買得起〉。

其實標籤在年輕人身上，年輕人要憑自己的本事去除這些標籤，例如〈想加薪？先問自己憑什麼？〉中最後結論就是：

想幫自己加薪，先讓自己成為獨特且無可取代的人吧。你如何面對工作，工作就如何回饋你！⁷⁶

或者〈房價高？換個想法你就買得起〉一文中，最後結論：

誰說房價高，就買不起房？重點是能不能換個想法，先購買適合自己的第一棟房子。先求有，幾年後再慢慢換屋到更理想的下一棟。⁷⁷

這樣的提法，也點出年輕人的心態問題，認為年輕人眼高手低、好高騖遠。因此後續透過訪問不同對象，提醒年輕人面對工作的心態與態度，例如：〈吳若權：找工作 別把 Fun 擺到太前面〉、〈丁曉雯：沒練完功就上台，消耗半年就玩完〉、〈番紅花：調整對物質仰賴就能踏入婚姻〉。

這樣的編輯方式，夾雜著《遠見》試圖帶給年輕人希望與方向的勉勵與建議，一方面這些話也不只是《遠見》自身的見解，而是社會上許多成功人士或名人給年輕人的建言。

破除完迷思，《遠見》提出了行動。除以〈苦悶的反抗，青年是改變社會的創新力〉提出年輕人參與社運，也開始反思一味追求經濟的發展主義問題。《遠見》也製作微影片鼓勵年輕人：

⁷⁴ 《遠見》第 314 期，頁 156。

⁷⁵ 《遠見》第 314 期，頁 161。

⁷⁶ 《遠見》第 314 期，頁 168。

⁷⁷ 《遠見》第 314 期，頁 179。

年初，當《遠見》開始構思青年專刊時，便同步委託「大逆光影音製作公司」，拍攝以青年為主題的微影片，描繪他們現實生活中達到的成就、遇到的苦悶、與心中的困惑。

超過兩個多月的案例篩選與故事搜尋，加上過程中不斷討論與確認方向後，最後共拍出〈派報人生〉〈音樂家的早餐店〉〈黑手變金手〉三部微影片，反映台灣不同狀況的青年族群。⁷⁸

而在邀請知名主播李四端觀影，並在觀影後分享心得的訪問中，李四端的回應不僅體現出《遠見》關心年輕人的用心，也確實呈現出《遠見》點出年輕人遭遇的困境：

過去沒有那麼多媒體在關注某個世代的遭遇，《遠見》報導讓我感覺非常深刻，我也看出「青年不能放棄」可能是報導希望描述的主題。

.....

現在年輕人有太多可能性，是我這代看不見的。我們那時可照體制走，社會還有很多保護。但這代年輕人面臨的壓力是，一定得闖出一條路，而且不能跟前一代走一樣的路。⁷⁹

從這些鼓勵與勉勵年輕世代的文章中，有一個重點被逐漸呈現出來，即是不同世代之間價值觀的差異，因此在「我們這一代」特別企劃中，以不同世代的對話來呈現世代之間價值觀的差異。包含工作和生活、資訊接收的方式、以前沒太多選擇，現在選擇很多、生活環境中成長背景的差異、時代氛圍……等等。比如林懷民在受訪時，就提出：

我們這代為國家民族，他們現在沒有了，就是要 enjoy 到各地去過生活，選擇人生的路，把東西做得好，做得帥，活出生命的典型，就是一種成功。⁸⁰

現在台灣的 20、30 歲世代，卻比以往任何世代的年輕人，顯得更加迷惘。他們是台灣經濟起飛後成長的一代，是台灣第一個不需餓肚子長大的世代，但大學畢業後，卻面臨經濟衰退階段。又面臨國際化、大陸崛起的競爭壓力，他們吶喊，機會變少了。造成不少人卡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⁸¹

而在「他們也曾年輕」的特別企劃中，透過訪問各個受訪者年輕的打拚經驗，想要告訴年輕世代，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其實背後也是苦盡甘來、不斷努力成長、克服各種困難，成功背後是各種辛苦、努力的過程。例如〈繼續成長！花時間失望，不如花時間學習〉在訪問 104 創辦人楊基寬時，寫道：

⁷⁸ 《遠見》第 314 期，頁 186。

⁷⁹ 《遠見》第 314 期，頁 189。

⁸⁰ 《遠見》第 314 期，頁 235。

⁸¹ 《遠見》第 314 期，頁 256。

大多數的媒體都喜歡報導年輕人的成功與風光，例如周杰倫又添購新的超級跑車，或是 Facebook 創辦人馬克·佐伯格，驚人的身價又飆高多少等。這樣的新聞太過氾濫，讓年輕世代以為成功好像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其實，他們在成功前咬牙克服多少困難的報導，卻很少。⁸²

後面更有九次創業失敗的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經歷過低潮的藝人黃國倫、創業 40 年每晚睡不足 5 小時的郭台銘：

苦悶、失落，似乎成了年輕人的代名詞，但面對這些呻吟、抱怨，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全球事業的郭台銘卻不怎麼認同。他挑戰年輕人勇敢築夢，唯有掌握自己命運的人，才擁有最大的財富。⁸³

或是 SGS 東亞區營運長兼台灣區總裁楊崑山的吃苦經驗談：

近幾年 SGS 的海事檢驗員，一直找不到年輕新血輪，仍有 20~30 個缺。儘管只需要高中學歷、看得懂初略驗貨所需的英文、年薪可達 70 萬到 100 萬，但因為在碼頭要風吹日曬雨淋，又要船艙爬上爬下，「這份工作很多人上班一天就跑了，年輕人很少，是我最大的隱憂，」楊崑山大歎。⁸⁴

因此他給年輕人的建言是：「年輕人現在不能吃苦，一有困難就退縮，會成為他們最大的不幸！」⁸⁵

《遠見》給年輕人的鼓勵，不只企業公司，也有像黃春明、林懷民、桂綸鎂等等各式各樣的人物、創作者等，例如黃春明受訪時就表示：

他憂心，社會氣氛變得愈來愈機械化、功利化，每件事都習慣換成貨幣計算，找工作也可以跟消費商品一樣，愛換就換、不再需要珍惜。

而從小到大的教育訓練，都只要求年輕人考好試、顧好成績，卻忽略其他層面的文史體驗與生活教育。⁸⁶

此外，《遠見》也提出年輕人精進自己的一些方式，在特別企劃「你也可以成功」中就提出 10 大心法，⁸⁷甚至針對每一個心法，提供一個受訪者成功的經歷分享。以及最後以特別企劃「工作，其實就在這裡」，介紹不景氣下，其實還是有很多工作機會可供挑選。

《遠見》雜誌中體現年輕世代遭遇的困境，但同時也認為環境並沒有到那麼

⁸² 《遠見》第 314 期，頁 248。

⁸³ 《遠見》第 314 期，頁 267。

⁸⁴ 《遠見》第 314 期，頁 269。

⁸⁵ 同上。

⁸⁶ 《遠見》第 314 期，頁 271。

⁸⁷ 分別為適應力、視野力、學習力、模仿力、傾聽力、熱忱力、合作力、逆境力、創新力、未來力。詳見《遠見》第 314 期，頁 280。

慘烈，並透過世代對話、成功經驗，試圖鼓勵年輕人，而在鼓勵年輕人的過程中，不斷提到的世代差異、價值觀的不同、對工作賺錢成功的理解不一，又體現出老一輩與年輕世代之間的环境不同。

而在世代對話的過程中，又期望年輕人要能吃苦耐勞、勇於面對挑戰與困難，透過講述成功重點不在表面上的光鮮亮麗，而是背後努力面對困境。《遠見》一方面點出整個年輕世代遭遇的不景氣困境，一方面又要年輕人在困境中努力奮鬥，看似矛盾得要人在困境中掙扎，但實際上並不衝突。

年輕人面對困境仍然得努力，是一種山不轉路轉的概念，既然環境不好，不如回看早年世代長輩那也不好的環境，學習他們是如何辛苦面對過來。或是學習從那年待努力打拚到現在的成功人士，不要只看他們光鮮亮麗，要知道成功背後是需要努力、吃苦與持之以恆。

在這過程中，《遠見》確實關心台灣社會發展，且發揮具有理想與抱負的雜誌所扮演的角色，面對困境，給予年輕人鼓勵與希望，希望年輕世代成為改變世界的主體，因此不論是要創業、是要工作求穩定、或是冀求改革，《遠見》都提供了相關資訊，也確實謹慎的做了調查與採訪。這最後最終都是要鼓勵年輕人，以及勉勵年輕人在新的時代動盪之中，精進自己、面對挑戰。

但如果深入探討，以《遠見》第 314 期來看，雜誌基本上分為兩部份。前面一半書寫困境，後面一半給予希望與鼓勵，但困境與鼓勵之間其實是互不相干的兩部份。我會認為互不相干的原因在於，這個時代的困境是個很龐大的問題，從每個人遭遇的各種困境出發，最後會形成一個錯縱複雜且龐大的社會問題，然而這樣的社會問題影響著每個年輕人，年輕人卻只能對這些龐大複雜的社會問題採取被動的姿態，只能逆來順受。

在〈全民動員，為台灣年輕人找出路！〉一文中，重點介紹《遠見》第 314 期的內容時，楊瑪利寫道：

綜合本期意見領袖的意見，也可得出，儘管時代不同、成功領域不同，做事方式可能不一樣，但不管任何世代，年輕人希望完成心目中的成功夢想，其實需要的態度、堅持、努力等，跟過去世代並沒有什麼不同。過去一段時間，一些社會意見領袖與政治人物不斷發言，台灣年輕人會陷入困境，是政府的錯、企業的錯、教育的錯，政府必須用很多社會福利來幫助年輕人。

但是年輕人，你要陷入抱怨，然後等待救援？還是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打造屬於自己的機會？⁸⁸

即是說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低薪問題、高房價問題、少子女化問題，都是社會上有目共睹、難以迴避的社會現實，但當這些問題在每個人的生活中該如何

⁸⁸ 《遠見》第 314 期，頁 35。

面對時，「年輕人，你要陷入抱怨，然後等待救援？還是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打造屬於自己的機會？」社會問題與個人之間開始脫節了，即社會環境影響著個人，但個人卻只能在這社會環境中努力求生存，社會環境是個他者般的存在，明明深深的影響著每個個體，每個個體卻無法對這整個社會環境產生影響或變革。

因此，面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遠見》雜誌期望提供年輕人一個希望與努力的方向。也就是《遠見》第 314 期後半部「他們也曾年輕」、「你也可以成功」、「工作，其實就在這裡」等專欄。

從上述這些內容來看，可以將《遠見》第 314 期的內容簡單總結為年輕人遭遇各種困境，在網路上形成集體鬱悶，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糟，長輩其實也是在艱苦的環境中走過來，長輩給予一點鼓勵，而年輕人自己也要努力，除了精進自己外，其實還是很多不錯的工作。

第二節、《遠見》給年輕人的希望與鼓勵

在第一節中，我爬梳 2008 到 2012 年之間，《遠見》逐漸聚焦探討年輕人的處境，是一個從新貧、工作貧窮、窮忙逐漸轉為談青年貧窮處境的過程，其中以《遠見》第 314 期作為一個指標，「年輕人憑什麼贏」的企劃，不僅僅只是第 314 期的內容而已，更有影音、論壇、募款活動等。是一個《遠見》企圖透過自身社會影響力，傳達對年輕人的鼓勵與提出一個面對困境的論調。

因此我認為在《遠見》第 314 期之後，有關青年貧窮的呈現，其實有一個明顯的主調，即儘管大環境不好，但年輕人只要肯努力、肯吃苦，還是能在不景氣的大環境中走出自己的路。因此本章節不僅延續《遠見》2012 年對於青年貧窮的再現，更聚焦體現出《遠見》如何在呈現青年貧窮的困境時，一邊給予各種鼓勵與提點。

一、年輕人要努力、要吃苦、要堅持、要創新，要有熱情

在 2012 年 8 月《遠見》第 314 期「年輕人憑什麼贏」的大企劃後，《遠見》編輯部後續仍然追蹤且持續關注這股社會上瀰漫的青年貧窮困境。《遠見》第 316 期「總編輯的話」專欄中，《遠見》總編輯楊瑪利以〈要當台勞，何必到澳洲？台灣不乏高薪苦工〉為題，回應當時台灣社會上引發清大生到澳洲當台勞的輿論討論，⁸⁹楊瑪利就在文中寫道：

⁸⁹ 2012 年 9 月 17 日出刊的《今周刊》第 821 期封面故事為「清大畢業生為何淪為澳洲苦勞」。出刊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後《今周刊》發出聲明強調「我們這次報導的主軸是，透過赴澳洲打工的故事，突顯台灣經濟的問題。」詳見：

<http://www.bu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34/post/201307150002/清大畢業生%20為何淪為澳洲苦勞>。最後查閱日期：2019 年 4 月 29 日。

我第一時間很想分享給這些年輕人，如果目標只是單純想賺錢存錢，而且在台灣也願意像在澳洲那樣，任何吃苦的工都願意做，連想像自己是被送往集中營的猶太人都可以忍受，其實台灣本地就有高薪的苦工找不到員工，應該不必到澳洲當勞工。我邀請大家再回頭看看《遠見》8月號。⁹⁰

楊瑪利的論點，可說是《遠見》對年輕世代如何面對社會不景氣困境的重點。從2008年之後，《遠見》雜誌有關青年貧窮課題的討論，能看到《遠見》作為一本具有理念與抱負的雜誌，非常關心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問題，也非常嚴謹的、即時的透過訪問與調查，探究問題與原因。

《遠見》一邊點出台灣遭受金融風暴的影響，以及後來經濟雖然復甦卻以低薪成就微薄利潤，打造台灣競爭力，結果低薪問題突顯的不僅是產業發展問題，更是青年遭遇工作貧窮的問題。但同時《遠見》也指出台灣在失業率極高時，卻也遭遇一些產業招不到工的困境，造成產業與就業市場供需失衡，並透過訪問提出年輕世代不願意進入這些冷門、辛苦、或承擔業務壓力或藍領等等的職缺。

因此，整體看下來，《遠見》在呈現青年貧窮的問題的方面，一來也認為台灣經濟出現問題，尤其是政策面、產業面，但同時年輕人的貧困問題不是無解，因為還有很多願意給高薪的產業在徵人，因此只要年輕人肯努力，肯勇於挑戰眼前的困境，其實問題並不大。

大量成功人士的經驗與舉例，是在這些專題中不斷出現的舉例。但如果看到《遠見》第270期特別企劃「流浪畢業生」、第314期「愛拚卻不定贏」時，也可以看到《遠見》會提供許多也是陷入困境的例子。因此，社會氛圍、社會問題，《遠見》總是能找到符合這狀態的受訪者，來佐證文中所提的論點或作為依據。例如在困境中仍然因為努力而能有些成果的，在不景氣中仍然找得到工作的，仍然創業成功的。

但不論是努力成功的例子，或很努力仍然遭遇困境的例子，都體現出這些受訪者的經驗是為了加強且佐證《遠見》的論調，即重點在於《遠見》有一個主要的論述方向，而受訪者則是因應這樣的論調而呈現出來。因此不論是好是壞、是要講不景氣下仍然有發展、或努力嘗試卻還是遭遇困境，《遠見》都能找到符合文章論調的受訪者。

因此，重點在於《遠見》的論調是什麼？我認為《遠見》不厭其煩的在許多特別企劃或封面故事，一直想傳遞給讀者的論調，就是「希望」與「鼓勵」。如果說從2008年到2012年的之間，《遠見》隨著社會氛圍，呈現出青年貧窮的年輕世代困境，那在2012年314期後，《遠見》便將青年的困境定調，並開始以各種方式鼓勵年輕世代。

⁹⁰ 《遠見》第316期，頁26。《遠見》8月號即《遠見》第314期。

在 2012 年 8 月第 314 期後隔三個月，同年 11 月《遠見》第 317 期的封面故事為「創造自己的阿信：五月天告訴你 年輕人憑什麼贏」，就以五月天的奮鬥故事鼓勵年輕人勇敢追夢、努力堅持。但其實《遠見》也並非不提年輕世代遭遇的困境，在第 316 期的《知識經濟論壇：李誠專欄》以「台灣青年勞動市場要崩解了嗎？」一文，探討青年面臨失業與工作貧窮的問題，文中寫道：

15～19 歲的青年人，長期失業人口占該年齡全體失業人口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3.26% 上升到 2011 年的 17.98%；而 20～24 歲的長期失業人口比例在同期間由 3.56% 上升到 20.69%，更糟糕的是，青年人的失業已不限於 15～24 歲，而是延長到 25～29 歲青年，他們長期失業人口占該年齡失業人口的比例也由 1990 年的 4.86% 上升到 2011 年的 23.16%。⁹¹

不僅點出年輕人失業年齡層的擴張，以及比例的上升，且也點出經濟危機後造成的動盪，在景氣復甦後並沒有好轉：

在 2000 年與 2008～2009 年兩次經濟衰退，無論是 15～19 歲，20～24 歲，他們的就業率在經過 48 個月以後仍無法恢復到衰退前的水準，而 2008～2009 年金融海嘯後連 25～29 歲的青年人也受波及，在經濟衰退的 48 個月以後，就業水準仍在持續下降，下降了 10% 左右。這是為什麼近兩年來總失業率雖然在不斷地下降，但是人民還是無感，因為不但年輕人的失業期間延長，在經濟復甦期間他們的就業水準無法恢復到衰退前的水準。換言之，雖然表面上台灣青年失業率沒有其他國家高，但受創的程度相當深。正因為勞動市場情況不佳，台灣年輕人的勞參率與年青人占全體勞動人口的比例都在不斷地下降。

而第 317 期的封面故事以知名樂團五月天的故事為例，希望鼓勵年輕人，文案寫道：

從他們的答案中，可以發現勇敢做夢、努力圓夢雖然是老生常談，卻是人生無憾的解答。更重要的是，這個時代再也沒有成功的標準答案，「創造自己的阿信」、負責任堅持自己的夢想，就能贏得自己的人生。⁹²

那怎麼「創造自己的阿信」呢？在〈台灣年輕人的夢想成功學—五月天密碼〉中，《遠見》細數五月天出道以來的經歷與努力，最後總結寫道：

比任何人專業、勤奮，又合作、謙虛，並永遠積極樂觀，由阿信為代表的五月天成功六大密碼，又何嘗不是每一個現代人成功的方程式？你是百萬阿信迷嗎？你應該也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阿信成功學！⁹³

⁹¹ 《遠見》第 317 期，頁 35。

⁹² 《遠見》第 317 期，頁 267。

⁹³ 《遠見》第 317 期，頁 280。

事實上，《遠見》第 317 期確實是第 314 期「年輕人憑什麼贏」的後續，在〈為什麼要創造「自己的阿信」？〉中就寫道：

自《遠見》8 月號推出「年輕人憑什麼贏」後，各種關於時下青年工作低薪、生活勞苦、對未來感到無望的報導，不斷轟炸各大媒體版面。

可是，這代表年輕人對未來不再有希望嗎？⁹⁴

文中指出日本 NHK 曾在 1980 年推出連續劇「阿信」，藉由女主角阿信在戰後努力生存打拚，打造出努力、認真、吃苦的經典形象。甚至指出日本人打算重拍阿信，鼓舞經濟蕭條近 20 年而沉陷低迷的日本社會。而以五月天的團長同樣叫阿信，文中進一步指出：

但面對當前挑戰，年輕人「能吃苦」已經不夠，還得具備「信念」跟「創意」，並對工作賦予「意義」，才是這個時代需要的「新阿信態度」。

什麼叫能吃苦？就是肯做人家不做的苦差事，從沒人看重的「垃圾活」中學得技能。本期《遠見》蒐集了十多個年紀 35 歲以下，隱藏在台灣各角落、各產業的新阿信。⁹⁵

後續文章便陸續介紹各種例子，例如日薪 3,000 元的 28 歲木工師傅蔡閔傑願意從事技術工作，並認為「看著許多跟他同齡年輕人抱怨薪資太低、加班太多，蔡閔傑忍不住建議，不如先思考自己到底要什麼？」⁹⁶

或是邊上班邊寫作年收百萬的部落客宅女小紅；放棄台大學歷，透過網路行銷賣蚵仔，月收十萬的年輕養蚵蚵農；或是跑船月收 13 萬，且船隻自動化，並沒有太多骯髒烏黑的粗活；或是靠著勤奮努力練習，從建教生練成世界冠軍，且年薪近百萬的美髮設計師；或是月薪高達七萬的鋼構業第二代陳怡文，雖然是 1984 年出生的年輕世代，卻也感嘆說道「現代人生得少，不忍小孩做工，卻從小養大他們的物質慾望，導致以後無法屈就低薪、勞苦的工作。」、「我們找的不是『粗工』，是肯吃苦的『人才』！」⁹⁷；或是年收破百萬的音樂創作藝人嚴爵也鼓勵說道「我認為年輕人，不管要做什，都要確定你對那個領域是非常有熱忱的才去做，不然那就太可惜了」⁹⁸

從《遠見》挑選的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到收入接近百萬或破百萬是個成功指標，在這標準下，有創業的、做技術工作的、跑船的、努力專精技能的，或是沒有被困難打倒而能堅持到底。當然也有不是攸關收入，而是透過電競選手鼓勵「只

⁹⁴ 《遠見》第 317 期，頁 294。

⁹⁵ 《遠見》第 317 期，頁 294。

⁹⁶ 《遠見》第 317 期，頁 297。

⁹⁷ 《遠見》第 317 期，頁 313。

⁹⁸ 《遠見》第 317 期，頁 317。

要找到興趣，肯努力、有方法，絕對可以出頭天！」⁹⁹或是透過演藝人員堅持熱情與夢想，強調堅持就能成功：

能成為 Beatbox 代言人，Echo 強調，他靠的不是天分，而是堅持。他的故事說明了，年輕人只要找到熱情之所在，堅持下去，不成功也難。¹⁰⁰

因此《遠見》不只是鼓勵年輕人工作賺大錢，也鼓勵年輕人為自己的夢想堅持努力。此外也有如何透過腦力激盪，或就自身擁有的條件去解決問題，例如被稱為「漁二代」的陳致豪把捕魚船轉型成休閒漁業，並活用免費科技，推廣休閒漁業的客戶群，文章中指出：

不少年輕世代出身農漁民或中小企業，有上一代傳承的資源，若善加利用，加上現代化的經營手法，就能創造符合時代需求的新商機。就像陳致豪，在外面繞了一大圈，才發覺金礦就在家鄉！¹⁰¹

或從運動員轉型網球教練的李宗凱，創辦台灣最大網球教學組織，讓他月薪高達六位數，他就建議：

30 歲前難免要用勞力跟體力換取收入，但 30 歲後，就應該靠智慧跟人脈賺錢，才能打破低薪的宿命。¹⁰²

這些例子無不從幾個角度鼓勵年輕人，包括：找到熱情、換個角度思考、堅持、努力、創新、熱情。透過這些成功案例，我認為《遠見》對年輕世代遭遇困境的談法非常清楚，即這些社會上的失業問題、低薪問題、不景氣問題都是真的，也真的造成很大影響，但就算大環境變這樣，日子還是得過，還是得工作生活，因此就來看看這些不受景氣影響的人是怎麼努力的吧！

在這樣的論述過程中，《遠見》確實將年輕世代遭遇的困境給提出來了，但也同時將大環境的問題擱置一旁，並聚焦提供成功人士的經驗、故事與心得，不斷給予年輕人鼓勵。或是透過這些人的成功經歷，提供一種學習這些人的精神，或許你也能成功的希望。

我認為就在這論述的過程中，社會環境的問題開始與個人分開了。《遠見》的這種論調，一方面點出台灣社會遭遇的困境與造成年輕世代的各種問題，一方面也很務實的提供個人如何在這社會困境中繼續走下去的建議與提醒。但個人面對大環境的問題，只能被動的載浮載沉，唯一握有主動權只有自己如何在這困境中繼續生存。

⁹⁹ 《遠見》第 317 期，頁 322。

¹⁰⁰ 《遠見》第 317 期，頁 321。

¹⁰¹ 《遠見》第 317 期，頁 311。

¹⁰² 《遠見》第 317 期，頁 319。

我認為《遠見》這樣的論調，恰好去除了個人參與政治、介入社會的政治性，去除了個人在這些有政策與有問題的環境中，開啟個人參與公共議題的可能性。這樣的後果，在於有關政策面的事物，仍然託付給政府、或某個政黨，或是某個政治人物。

《遠見》是非常關心年輕人的，事實上也正是為了鼓舞年輕人面對不景氣，與大環境的困境，《遠見》才花費這麼多篇幅鼓舞年輕人。其實，當時市面上許多類似《心靈雞湯》、《秘密》等勵志書籍，也是極為熱銷。而《遠見》對年輕人的鼓勵則可從後續發行的期別中看出，例如在 2013 年 1 月第 319 期中介紹 Google 的 Android 平台時，就以〈大陸 3 年就開花，台灣年輕人加不了薪〉點出台灣產業轉型與低薪問題：

當台灣科技產業遲遲不轉型，這些人才，要不被對岸與全球快速的產業創新勢力吸引，繼續出走。要不就是困在硬體廠商裡，沒有太多發展機會，更別談加薪。¹⁰³

但同時也鼓勵年輕人趁著這波 Google Android 熱潮，抓緊機會，並認為台灣科技人才缺乏熱情，或年輕人打安全牌難以突破，藉以鼓勵年輕人要找到做軟體的熱情，以及要有創造新價值的使命感。

而 2013 年 3 月《遠見》第 321 期的特別企劃「第三波台灣人闖大陸」，更提出中國大陸的工作機會，且認為台灣人具有優勢，並以數個在大陸工作或創業的年輕人經歷，鼓勵年輕人西進打拚：

當台灣還在面臨大學社會新鮮人月薪 22K 保衛戰時，有一群年輕人已將眼光放遠於國際，西進大陸一展拳腳。大陸的人才需求又快又急，相對大陸人，台灣人工作態度、專業度、價值觀和穩定性都較佳，成為一大優勢。¹⁰⁴

但同時《遠見》也以各種特別企劃，關心台灣的產業與經濟發展，例如同樣是 321 期的特別企劃「工匠精神打造最低失業率：瑞士是故意的」就認為台灣與瑞士有許多相似之處，認為瑞士經驗值得台灣學習。並提出瑞士的工匠精神，中小企業以打造全球品牌為目標……等等，但也在〈台灣想學瑞士？請先放棄大國夢〉中指出：

台灣想學瑞士，應該學對地方，學堅持發展品牌、不當大廠代工傭兵的精神，學他們尊重技能跟職業的工匠文化，還有由民間驅動創新、追求全民共識的理性民主。¹⁰⁵

¹⁰³ 《遠見》第 319 期，頁 160。

¹⁰⁴ 《遠見》第 321 期，頁 133。

¹⁰⁵ 《遠見》第 321 期，頁 219。

在 2013 年 4 月《遠見》第 322 期以封面故事「全球飆大學，台灣怎麼追」提出台灣高等教育需要改革，以及應重視技職教育後，第 324 期也以封面故事「台灣經濟奇蹟不是靠福氣，是靠百萬技職生：他們打敗失業率」，提出失業率高漲的時候，更突顯台灣技職工作的優勢，並再次強調技職教育、師徒制、工匠精神，台灣重視白領輕視藍領的社會氛圍……等等。我認為上述主題都可以明顯看到《遠見》對台灣經濟與產業發展的關心。

而同樣的關心，也在於鼓勵年輕人不要被侷限住，可以往很多工作去發展，去從中尋找自己無限的可能。2013 年 8 月的《遠見》第 326 期封面故事為「你，悶壞了？讓我們一起來反彈：台灣憑什麼再贏」，主題呼應一年前 2012 年 8 月第 314 期的「年輕人憑什麼贏」，突顯不僅經過一年，社會上年輕人遭遇困境的問題仍然存在，但也更突顯《遠見》從鼓勵到要年輕人一起來反彈悶的問題。

二、2014 年後逐漸減少的青年貧窮論述

《遠見》不斷提供年輕人希望，並給予各種鼓勵，但當 2014 年 3 月爆發太陽花運動時，《遠見》也不得不正視這場以年輕人為主體反映出來的社會不滿浪潮，2014 年 5 月出刊的《遠見》第 335 期就以「90 後，你在想什麼？」為封面故事，主題文章中開頭寫道：

自從太陽花學運後，「世代差異」成了一門「待解答」疑問。太陽花學運像是一面鏡子，折射出目前在政府、企業等領導階層的三、四、五年級生間，與七、八年級年輕世代的巨大落差。這群在全球化浪潮、資訊革命、教育改革、民主化土壤下成長的種子，思惟模式、價值觀與溝通方式，顯然已與上一輩截然不同。

因太陽花運動點出台灣的世代差異，不論是年輕世代參與政治、參與議題的情況，甚至是透過網路、手機傳播的方式，提出年輕世代重視自我價值與實踐，因此不論是教學現場的教育方式要改，企業也面臨年輕世代對工作態度的變化：

雖然年輕世代不滿太低的薪水，但如果工作不符合自己意志、無法自我實踐，高薪工作也未必能得到年輕人青睞。¹⁰⁶

我認為從這時候起，《遠見》呈現青年貧窮處境的論調，就開始逐漸產生變化。在這之前，《遠見》除了給予年輕人鼓勵與希望外，也鼓勵年輕人創業，且主要以台灣曾經有過的經濟繁榮作為底氣，鼓勵年輕人要找回台灣曾經有過的打拚精神、創業精神，這部分由於可討論的內容太多，我會在後續章節中特別討論。

但這邊突顯一個現象，以太陽花運動作為一個分水嶺，在太陽花運動後，《遠見》探討青年困境的論述越來越少。但若對照當時的社會氛圍，在太陽花運動後，

¹⁰⁶ 《遠見》第 335 期，頁 230。

整體社會對於青年貧窮的討論也逐漸削減，彷彿太陽花運動讓青年不滿的情緒，在大爆發後有了抒發的窗口而開始減緩。

以《遠見》雜誌來看，例如 2014 年 7 月《遠見》第 337 期「打破 22K 魔咒，青年創業潮再起」，延續 2013 年 8 月第 326 期「台灣憑什麼再贏」的封面故事，就提出當時檢討年輕人雖然充滿創意，但創業者卻面對許多困境與挑戰，形成空有創意理念而創業實踐不足。但在一年的努力下，年輕人創業風潮不僅興起，並指出年輕人透過運用網路時代的創業風潮，包括在網路上打造資訊平台、服務平台或 APP 應用軟體。這邊雖然仍然提供青年創業的成功經歷，也仍然給予鼓勵與希望，但所用篇幅跟之前相比已經減少許多。

《遠見》仍然關注台灣社會的各種貧富差距或就業問題，但跟前幾年對照來看，已鮮少再聚焦在年輕世代上，例如 2015 年 3 月《遠見》第 345 期特別企劃「貧富不均 重擊台灣」點出來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並也指出台灣需要進行稅改，不然高所得卻能少繳稅的狀況，根本使台灣成為富豪天堂。

或 2015 年 7 月《遠見》第 349 期時，以封面故事「一部勞基法 搞慘 360 行？」探討台灣勞資爭議與勞動條件的問題，《遠見》更提出「勿讓這場風暴更加衝擊台灣經濟。只是讓企業好怕，員工更累，到底好了誰？」¹⁰⁷後續文章一邊點出責任制、高工時、職場上的性別爭議等問題，但也同時提出人力調配上、勞動法條不適用個別行業、人事成本增加等企業經營上的困境等問題。

《遠見》少提青年處境，難道是因為環境逐漸變好，年輕人的困境正在好轉嗎？其實並非如此，2015 年 9 月《遠見》第 351 期「名家專欄」中，作者李誠¹⁰⁸在〈台灣青年失業問題東亞之最，該怎麼辦？〉一文中，就指出台灣青年失業率的問題長期沒有改善，原本以為「人口老化、少子化與入學人口、教育程度的提升、技術提升後，能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結果並沒有解決，相反的愈來愈惡化。」

而造成台灣青年失業率最大的問題則在於：

台灣年輕人每個都大學畢業，低學歷、低技術的工作都沒人想做，只好被東南亞、印度、中國大陸所代替。台灣的勞力密集產業工，也不少外移海外。

但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快速，培養出來的高端人才，卻不能全為企業界吸收，因為台灣的產業升級並沒有趕上台灣高等教育青年的供給速度。¹⁰⁹

這樣的論點都開始呈現同理年輕人的處境，也將問題指向台灣產業的發展面與台灣高等教育的发展問題，形成高等教育與產業無法搭上的問題。隔個月的《遠見》第 352 期封面故事「消失中的上班族」指出 20 年後，台灣職場會有 885 萬

¹⁰⁷ 《遠見》第 349 期，頁 240。

¹⁰⁸ 中央大學國鼎管理講座教授。

¹⁰⁹ 《遠見》第 351 期，頁 34。

人因為退休而退場，人力短缺將造成衝擊，「缺工，儼然成為少子化、高齡化之後，台灣最迫切的危機。」¹¹⁰

面對專題中所預言 20 年後的缺工狀態，《遠見》卻針對當下的青年就業者，指出年輕人的問題為「青年晚近職場，不耐操又早出！」：

台灣勞參率偏低，除了中高齡早退，年輕人太晚進入職場也是主因，初業年齡從 2006 年的 20.5 歲，升高到 21.7 歲。在校園待太久，也較難適應工作生態，做沒多久就離開，「晚進早出」嚴重！¹¹¹

在這論點上，也指出：

延後進入職場事小，真正讓企業苦惱的是，學歷愈高，挑工作的眼界就更高，許多工作乏人問津。¹¹²

因此台灣有一個奇怪現象，就是產業明明缺工，失業率卻還很高，原因就在於「年輕人在就業市場還有嚴重挑工作的問題。」¹¹³文中根據勞動部調查結果，提出：

台灣 15～29 歲青年，不外出找工作、也沒服兵役、求學或參加職訓，也就是不願意進入職場的賦閒人口比例，居然占 25.2%。¹¹⁴

文中最後總結，勞動力老化、少子化衝擊、中高齡早退、職場精英外流、青年晚進早出、移工政策不彰等六大原因，為台灣缺工問題的最主要原因。

後續文章並指出被列為 3K（骯髒、危險、辛苦）產業的公司一直招不到人，例如製造業的螺絲工廠、蘇花改水管工人、郵局、銀行，就連被製造業說年輕人都跑去的服務業，也指出留不住人。

這樣的論調仍然延續之前認為年輕人挑工作、不願吃苦等論調，但都不再以特別企劃或大篇幅，甚至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來專注聚焦年輕世代來探討問題。而是在談討其他課題時點到年輕人的狀態。

直到 2017 年 10 月《遠見》第 376 期，《遠見》又開始出現討論年輕世代處境的論述。在第 376 期「遠見調查」中，針對台灣、上海、新加坡、香港等四地華人青年進行「翻轉力大調查」。指出台灣青年對現狀最感到無力，但也最勇於築夢，以及最任勞任怨，文中指出：

¹¹⁰ 《遠見》第 352 期，頁 144。

¹¹¹ 《遠見》第 352 期，頁 149。

¹¹² 《遠見》第 352 期，頁 160。

¹¹³ 《遠見》第 352 期，頁 161。

¹¹⁴ 《遠見》第 352 期，頁 161。

正因為「低薪風暴」讓台灣新生代吃了不少苦，因此當問起年輕人，希望未來的社會是「低薪低物價」「物價薪資持平」還是「高薪高物價」？台灣是四地青年中，最寧願邁向「高薪高物價」（53.5%）的，亦即寧願物價高，也不願再領低薪，證實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觀念，已在台灣年輕人心中萌芽。¹¹⁵

最後也總結表示「改善台灣低迷環境已是刻不容緩的挑戰，否則不少台灣有能力、有理想的年輕人，還將繼續出走台灣！」

總編輯楊瑪利也在〈不要再說年輕人只想小確幸〉文中以這些調查數據，指出台灣年輕人願意努力工作的態度，因而提出：

把工作擺第一又選擇忙碌充實勝於悠閒，可見台灣青年給社會普遍喜愛追求小確幸的印象，可能失真，多數年輕人還是想奮鬥。¹¹⁶

這樣的論述與發言方式，與幾年前給予年輕人希望與鼓勵的論調有所落差，也從這過程中，可以看到在 2014 年後，《遠見》雜誌對青年貧窮相關課題的討論逐漸變少，且對於年輕人的態度逐漸給予肯定，而不再是幾年前的成功經驗、勵志故事、要年輕人堅持努力了，體現出《遠見》對於年輕世代的論調正從鼓勵年輕人轉變為肯定年輕人。

第三節、不同世代的經驗參照與衝突

在前面章節中，探討《遠見》如何呈現青年貧窮問題時，不時會呈現出世代之間的衝突、對話、經驗參照，我將在第三節裡聚焦討論《遠見》談青年貧窮時，在世代對照之間，製造出的世代衝突，以及將台灣曾有過榮景的想像加諸在年輕人身上。

一、找回上一世代的打拚精神

在 2010 年 4 月《遠見》第 286 期特別企劃「職場進化論：35 而立」，探討六年級生的處境時，就有許多對於世代之間的差異書寫，例如《遠見》提出六年級生成長在物質豐裕的環境，出社會卻面對經濟不景氣，因為工作、婚姻等成家立業壓力而導致罹患精神疾的患者增加，也開始出現依靠父母的「啃老族」。《遠見》透過採訪世新大學社心系教授邱天助，指出：

許多六年級生在多元選擇的文化下長大，但當無法建立自我形象、自我價值體系時，許多人到了 30 多歲還在問「我是誰」「我要幹嘛」，反而讓生命變

¹¹⁵ 《遠見》第 376 期，頁 76。

¹¹⁶ 《遠見》第 376 期，頁 18。

成一種漂泊，很難找到靠岸的地方，似乎世界「到處是我家」，但也慨歎「何處是我家」，成為「浮萍世代」。¹¹⁷

面對六年級生出社會遭遇的台灣經濟發展困境，以及優渥富裕的成長環境與職場之間的巨大落差，《遠見》則鼓勵說道：

當傳統機會變少，競爭環境又變激烈時，不妨培養彈性變通的調適能力，跳出既有結構，去開創屬於自己小而美的新舞台。尤其六年級生擁有以往世代沒有的科技能力、國際觀與多元價值，事實上更能夠突破傳統、創造自己的舞台。他們的未來本來就應該跟上一代很不一樣。¹¹⁸

不僅以「浮萍世代」稱呼六年級生，也點出因為成長環境與父母輩的不同，六年級生的價值觀本就該跟上一輩不同。在後續的文章中，就開始探討六年級生「不再把工作當成唯一價值，然而對『理財』卻愈趨積極精明，也唯有如此，才能在薪資不漲、物價漲的情況下，繼續他們的品味人生。」¹¹⁹

這邊有趣的是，在版面安排中穿插一篇短文〈看準趨勢，35 歲系列書大賣〉，指出我識出版公司從 2007 年開始出版一系列「35x35」系列叢書，例如《35 歲前要有的 33 種能力》、《35 歲前要爽的 33 種樂子》……等等。文中訪問我識出版集團總經理蔣敬祖，就說道：

可能大家都太鬱卒了，特別對 35 族群的人來說，時間的壓迫感真的讓他們喘不過氣來，「愈鬱卒，書就愈大賣！」¹²⁰

由此可見這類一世代人遭遇困境的現象，也可以趕緊推出相關商品，藉以處理相關問題，或提供方向與建議。《遠見》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許多建議，例如在同個特別企劃中，《遠見》訪問因翻譯《魔戒》而出名的朱學恆（受訪時 35 歲），朱學恆在受訪中提出：

六年級生在大學時代都是看所謂的「成功雜誌」，一味地「教導我們只要努力就會成功」。就連老師也在課堂上告訴我們，只要努力讀書就能考上研究所，只要成績好就能順利進入大企業。結果呢？出了校門才知道，「許諾（commitment）被否定了。」工作機會愈來愈少，老師缺額變少，衍生出一堆流浪教師。科技公司大量分紅配股的時代也過去了。¹²¹

儘管朱學恆如此說道，《遠見》仍然認為朱學恆是一個成功典範，透過朱學恆的經歷，鼓勵年輕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緊接著下一段就接續寫道：

¹¹⁷ 《遠見》第 286 期，頁 233。

¹¹⁸ 《遠見》第 286 期，頁 233。

¹¹⁹ 《遠見》第 286 期，頁 237。

¹²⁰ 《遠見》第 286 期，頁 234。

¹²¹ 《遠見》第 286 期，頁 238。

為六年級打抱不平的同時，朱學恆其實是六年級生的典範。不管是成立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推動開放課程，還是過去一年來，平均三天就出門一次，到各地高中、大學去演講，傳遞創意及熱情的觀念。朱學恆早些年還會在意別人的看法，自己是否成功、賺大錢、受人尊敬、是個好人等？但慢慢覺得討好社會那麼多人太困難。¹²²

我認為這邊非常有趣，朱學恆在受訪時就批判「成功雜誌」「一味地『教導我們只要努力就會成功』」但朱學恆受訪的文章就放在「35 關卡！是沒機會還是不夠努力？」的標題下。朱學恆成為「成功雜誌」讚揚的另種典範，用來告訴讀者「年輕人應為自己的選擇負責」¹²³，雖然朱學恆不屬於文中所提「努力就會成功」的例子，但也成為另一種可供參考的案例。後續文章則是繼續鼓勵讀者要努力面對困境與挑戰，例如〈如果你是潛才，無論如何都會出頭〉。¹²⁴

而後續的「35 徬徨：職場大塞車」則進一步點出六年級生的現實困境，例如〈失業 200 多天，連孩子都不敢生〉一文中，因公司宣布解散而失業超過半年的 Heaven，在經歷寄出 150 封以上的履歷，卻只接到保險業及直銷業者的電話，領取失業救助金近半年後，Heaven 在朋友補習班兼差，並知足說道「人生可以在現實中失業，但心理不能失業。」¹²⁵

也有「35 衝刺：挑戰新格局」在〈25 歲創業，從被告邁向百億營業額老闆〉一文中，則訪問群聯電子董事長潘健成的創業經驗，最後鼓勵說道：

目前台灣社會能讓年輕人創業的機會是愈來愈少了，就連他再重新來一次，也難說一定會成功。但不論如何，「一定要努力才能使美夢成真」，這個道理是永遠不變的。

以及〈26 歲創 Miss Sofi，連父親都半信半疑〉中，訪問「26 歲創業，30 歲當上總經理，今年剛滿 35 歲的碩豐國際總經理王曉萍」，並指出：

六年級與上一代不同之處，在於上一代辛苦打拚，這一代希望更有效率工作。上一代賺代工辛苦錢，這一代創造品牌，希望賺大錢。這就是六年級世代不一樣的地方，王曉萍朝目標邁進中。¹²⁶

或是「35 出路：創造新選擇」系列在〈重新選擇，把家庭放人生第一位〉一文中，訪問藝人李李仁，分享他選擇退出當紅連續劇的演出，全職在家帶小孩。不僅是一種價值選擇，也是「在 30 世代的分水嶺上，他選擇把『家庭』放在人生的第一位。」

¹²² 《遠見》第 286 期，頁 239。

¹²³ 《遠見》第 286 期，頁 239。此段文字出處的短標。

¹²⁴ 《遠見》第 286 期，頁 240。

¹²⁵ 《遠見》第 286 期，頁 245。

¹²⁶ 《遠見》第 286 期，頁 252。

從《遠見》第 286 期特別企畫「職場進化論：35 而立」，可看到當探討六年級生的成長背景與處境時，《遠見》也點出越來越艱困的環境，以及努力難以成功的現實，但同時也從不同角度鼓勵六年級生，不論是做出選擇為自己負責，或就算失業心理也要堅強面對難關，或仍要相信努力才有機會成功，甚至選擇另外一種不同價值也會是種出路。可說當成功不一定能成功時，《遠見》提供許多不同的面向，提供讀者面對困境的思維與希望。

但在呈現這些論述時，各種與上一代的比較，以及世代之間的差異不斷被突顯而出，不論是為了分析新一代年輕人為何遭遇困境，或分析年輕一代對成功的想像跟上一代已不一樣，各種呈現出世代之間差異的論述座落在這些鼓勵年輕群體的論述中。

然而這樣的世代差異，也表現在後續其他特別企劃中，例如在 2010 年 5 月《遠見》第 287 期的特別企劃「10 年一遇的職場榮景再現 工作回來了」，以景氣復甦後的缺工浪潮，但也藉此指出現在年輕人挑工作，不願做傳統產業的問題。

此特別企劃先介紹景氣回溫的景況，指出因金融風暴而一度高達 5.85% 的失業率，在 2010 年農曆春年後逐漸恢復榮景，各行各業紛紛呈現徵才盛況：

企業釋出的職缺，也堪稱近十年之最。像科技大廠、房仲業、保險業者，屢屢喊出徵才 3000 人、5000 人，不斷往上加碼，就像菜市場喊價，後來乾脆直接說「徵人無上限」。往往一天釋出的職缺數就超過 2 萬，等於去年兩、三個月加起來的數量。¹²⁷

但實際上，這樣的徵才盛況源自於金融海嘯不景氣時的高度裁員與人事縮編，文章中也指出「過去砍最狠的 現在搶最凶」¹²⁸、「金融風暴受創最深的科技業和金融業，過去裁員減薪最多，現在帶頭復甦，成為目前兩大求才最渴的產業。」¹²⁹然而儘管各行各業開出職缺，因金融風暴而造成的影響依然存在，尤其在薪資上：

根據主計處統計，去年的實質平均薪資是 4 萬 690 元，比 2000 年的 4 萬 1874 元還少，等於是倒退十年，甚至有人預期，今年還可能繼續倒退下去，短期內，薪資成長很難再回到過去美好的時光。¹³⁰

此特別企劃後續文章陸續指出就業市場景氣回升外，也有派遣比重增加的情況，而更多篇幅就指出台灣傳統產業嚴重缺人的問題。例如傳統產業中的傳統工廠，

¹²⁷ 《遠見》第 287 期，頁 122。

¹²⁸ 《遠見》第 287 期，頁 122。

¹²⁹ 《遠見》第 287 期，頁 123。

¹³⁰ 《遠見》第 287 期，頁 125。

現代人的價值觀對於工作環境的要求比已往世代高很多，甚至寧願失業在家，也不願意做太累的、離家太遠的、或薪水不太滿意的工作，導致許多優良企業找不到員工。¹³¹

或是業務工作：

業務工作的需求量大，流動率高，業績壓力也不小，又有會把親朋好友得罪光的刻板印象，自然也就被求職者拒於千里之外。¹³²

《遠見》採訪《Career 職場情報誌》雜誌總編輯臧聲遠，就提出工作不好找，求職者的心態也有問題：「問題不在於沒有工作機會，而是求職者想做的工作沒有。」¹³³並進一步指出：

台灣以代工為主，必須遵守高度紀律的作業員工作，俯拾皆是，可是求職者不想做，至於他們心嚮往之既安穩的行政總務、或可以玩創意的行銷企劃等職缺卻很有限，又搶破頭。這已經是價值觀落差，導致的結構性失業。¹³⁴

如何解決就業職場與產業缺工之間供需失衡的問題，則指出：

至於寧願失業也不願做太累、太死板、太遠工作的族群，到底該如何解決這個供需落差，則有待政府、企業與社會，共同來解決。¹³⁵

後續以系列文章〈業務很缺、很賺 就是沒人想應徵〉、〈逸凡科技 道出中小企業求才的困難〉、〈台中工具機聚落 訂單回春卻缺工〉來深入探討不論經濟是否景氣，卻有產業嚴重缺工的問題，點出職場供需失衡的狀態，

點出這些產業職業別，在失業率高的狀態下，還遭遇缺工問題，這樣的情況之所以特別提出，在於這是《遠見》對呈現青年貧窮的處境中，會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明明還有很工作缺人，但年輕人卻不願意做這些工作。因而轉而探討年輕人的心態問題。然而年輕人的心態之所以有問題，在於有一個參照對象，而這參照對象就是上一代人的打拚精神。

前述曾經提過《遠見》在 2012 年 1 月第 307 期〈「小資世代」來臨，敢享受卻更務實〉一文，文中也進一步比較「小資世代」跟五年級世代的差別，文中寫道：

五年級世代，歷經中美斷交、學運、修憲，認為社會是闖出來的。因此，常聽到人說做一番「大」事業、或者願意參與運動改變大社會。……然而，現在是一個「小我世代」……七年級的學生告訴她，雖然政治已經民主化、但

¹³¹ 《遠見》第 287 期，頁 138。

¹³² 《遠見》第 287 期，頁 138。

¹³³ 《遠見》第 287 期，頁 139。

¹³⁴ 《遠見》第 287 期，頁 139。

¹³⁵ 《遠見》第 287 期，頁 139。

面臨不斷的爭吵、又有金融風暴毀滅性的地震。反正大環境不是自己能改變，所以只要在自己能管好的範圍內好好活著，做好小我，比什麼都重要。¹³⁶

因此一個世代形成的社會氛圍已經逐漸成為社會現象，不論是電視劇，或因應而生的小資商機，也開始體現出世代之間的差異，並突顯年輕世代在所處環境下呈現出來的特質。文章中寫道：

過往，形容六、七年級的名詞大多較為負面，如月光族、草莓族、青貧族，然而，「小資」這個詞彙則讓人看見了這個世代的務實面向。¹³⁷

對照上一代的生長環境與當時的社會氛圍，不僅突顯出青年世代遭遇的困境，也呈現出年輕世代與上一代的不同之處與特質。但同時，不同世代之間的參照，也對照出異同，儘管環境與條件不一樣了，但也有些東西仍是可以延續或繼承的。

例如在 2012 年 8 月第 314 期重要的「年輕人憑什麼贏」這一重要企劃中，就有許多強調上一代刻苦耐勞精神，來鼓勵年輕世代的論述。比如：

前幾代台灣人，靠著刻苦跟勤奮，換來下一代溫飽。享受到這些環境的新世代，也有義務替下一代打造值得倚靠的未來。

被封為「宅神」、堪稱是青年意見領袖之一的朱學恒說，「我當年多希望有大人告訴我簡單的幾句話：沒有問題，你一定做得到！我們相信你！」

這些話，現在必須大聲地告訴年輕人，「我們相信，你們辦得到，因為台灣的未來，就掌握在你們手裡！」除非年輕人選擇繳械投降，否則沒有人有資格說他們是「失落的一代」！

因為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從來沒有忘記我，對自己的承諾，對愛的執著～

我知道，我的未來不是夢，我認真地過每一分鐘。我的未來不是夢，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跟著希望在動～¹³⁸

可以從上述內容清楚看到雜誌中的筆調，在年輕人的遭遇的困境中，也同時分析環境並沒有糟糕到完全沒有機會，例如產業缺工的情況，找不到年輕人來做，只能聘僱移工，40 多萬人沒工作，數據幾乎等同於移工人數。或提到對年輕世代來說「工作與賺錢，已經不是人生的全部」¹³⁹，或者是寧願去便利超商領低薪吹冷氣，也不願去機械工廠在充滿油汙又吵雜的環境工作。

¹³⁶ 《遠見》第 307 期，頁 68。

¹³⁷ 《遠見》第 307 期，頁 68。

¹³⁸ 《遠見》第 314 期，頁 61。

¹³⁹ 《遠見》第 314 期，頁 52。

因此，文章中也提出年輕世代在所處環境下成長起來，所與上一輩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自小生長在充滿娛樂、科技的物質環境，沐浴在民主、自由的開放社會氣氛，但面臨人生抉擇與艱困的未來，卻顯得無力感重重。他們一生下來，就開始盯著客廳的電視，到了學生時代，電腦、網路、手機，陸續進入生活。體驗到前人從未經歷的感官刺激、科技應用、及虛擬世界文化，自成一個獨有的「美麗新世界」。

而在上一輩提供優渥的環境與條件下，年輕一輩不僅選擇變多，就學時間延長、出社會時間延後，連不工作都可以成為選項。

在文章中，年輕世代遭逢環境問題，但同時也因為較好的成長環境，出社會後看不到社會流動的可能，以及「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以及高不可攀的房價，想靠老實工作翻身、實現夢想的機率，似乎變得愈來愈小。」

但同時年輕一輩也遭遇跟長輩不一樣的工作環境，例如「非典型工作」或低門檻、低工資、低技術的「三低行業」，而面對高房價，對買房更是只能望洋興嘆。因此，困境確實存在，如何衝破困境才是重點，原本前述文章中也提出世代之間成長背景不同、環境不同，但最後以非常鼓勵與勵志的語句做結：

或許時代旋律不同，但那股硬頸的傲骨、不肯向現實妥協的無畏精神、還有勇於挑戰未知的憨膽，依然流在當今台灣青年的血液裡。我們總如此相信！

140

在第二節中，我指出《遠見》在呈現青年所處的社會困境後，給了年輕人鼓勵與希望，但這樣的鼓勵與希望，實際上有一個來自前個世代經驗參照，即台灣曾經有過的打拚精神。因此《遠見》的鼓勵不是單純精神面的鼓勵，而是有一個整個台灣社會曾經成功過的典範，即過去一世代人的努力打拚精神，而這樣的的精神只要年輕人能找回，就能面對台灣當前的困境。

二、對過往榮景的緬懷擋不住現實的無情

《遠見》用上一代的打拚精神來鼓勵年輕世代的方式，也體現在出《遠見》對台灣經濟發展與產業發展的想像，例如在 2013 年 8 月的《遠見》第 326 期封面故事「你，悶壞了？讓我們一起來反彈：台灣憑什麼再贏」，總編輯楊瑪利在本期的總編輯的話專欄中，就指出：

我們要強調的是「再」字。因為台灣曾經表現非常好，只是近十幾年來失落了光環，必須再一次贏回來。¹⁴¹

¹⁴⁰ 《遠見》第 314 期，頁 61。

¹⁴¹ 《遠見》第 326 期，頁 28。

而要怎麼再一次贏回來呢？文章中提出的解方是：

《遠見》跟此刻許多產官學界的看法一致，台灣欲突破低薪與低就業、低經濟成長的困局，必須靠一波創業動能，才是再贏的關鍵。¹⁴²

而在封面故事的主題文章〈台灣憑什麼再贏〉一文中更直接指出：

其實創業精神，就是你我引以為傲的台灣精神。400 多年來，台灣是政治難民與經濟移民的後代，先賢們一無所有地前來墾荒，勇敢地渡海涉險，探索未知領域，讓台灣變成冒險家的天堂。……從「中小企業白皮書」更看出，2011 年全台中小企業多達 127.9 萬家，占全體企業數量 97.6%，雇用近八成的就業人數。幾乎每 18 個台灣人裡，就有一個擁有「老闆」頭銜。¹⁴³

因此台灣憑什麼再贏？就要找回台灣曾經有過的精神，那是什麼精神呢？文中說道：

台灣人自豪的打拚精神與硬頸態度，都源自幾百年來的累積與遺傳。冒險犯難的行動力、從無到有的創造力，曾是我們的驕傲。然而，如同陷入停滯的經濟成長曲線，這幾年，台灣人的創業精神逐漸改變，甚至有消退跡象。¹⁴⁴

因此台灣要擺脫代工宿命與高失業低薪的困境，就要找回曾經有過的創業精神，並付出更多具體的創業行動。台灣往日的創業精神是什麼？《遠見》列舉的資本家與創業事蹟，各個都是經典：

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經濟奇蹟成為世界經濟史上的經典之作，而傲人的奇蹟，正式由一些具冒險精神、執行力與視野的企業家們聯手締造。

從創辦台塑的王永慶開始，接棒的是分別在 1947、1976 年創立鴻海與宏碁的郭台銘、施振榮，正好標示出台灣由傳統產業轉為資訊代工業的成長軌跡；1987 年級 1997 年分別創立威盛電子與宏達電的王雪紅，則是資訊業從代工走向品牌的代表。

王品集團創辦人戴勝益為台灣服務業的品牌寫下新里程碑；誠品創辦人吳清友則讓台灣擁有令華人世界稱羨的文化景深。而面對未來，台灣需要更多創業的小巨人接棒……¹⁴⁵

因此台灣憑什麼再贏的關鍵就是創業，而《遠見》在這裡也點出一個重要的課題，文中說道：

¹⁴² 《遠見》第 326 期，頁 28。

¹⁴³ 《遠見》第 326 期，頁 117。

¹⁴⁴ 《遠見》第 326 期，頁 118。

¹⁴⁵ 《遠見》第 326 期，頁 121。

該是重新喚回台灣人「野性」基因的時候了。或許真正適合創業的，只有 5～10% 的精英與狂人，但那些瘋狂的夢想家們，卻足以改變台灣的未來。¹⁴⁶

也就是說《遠見》期待台灣再次出現下一個郭台銘或王永慶，期望 5～10% 的精英或狂人，透過創業來改變台灣的未來。對此，文中最後對不同群題提出不同的期待：

如果你是上班族，請發揮創業家的學習力與廣闊視野，在工作中逐步累積各項技能，試著尋找改變產業未來的可能性與創業機會。

如果你已屆事業有成、衣食無虞，應該擔任創業導師的角色，把經驗跟資源傳承下去，協助縮短年輕人的摸索期。

如果你是資源及政策的制定者，請解除不必要的法令限制，提供台灣一個更友善的創業環境與社會氛圍，讓台灣再次成為冒險家的逐夢天堂。¹⁴⁷

而《遠見》也以上述期待為主題，後續分析與討論台灣創業環境的挑戰與困難，點出個人要努力、經驗要傳承、法令要調整。並列舉創業成功的經驗，且很多例子是 30 歲左右的年輕世代，足以看出給予鼓勵，例如：

儘管有不少台商都抱怨年輕一輩的抗壓力不足，但是根據《遠見雜誌》近幾年在國外採訪的觀察，海外已逐漸出現台灣年輕人的身影，他們散居在世界各地創業，用行動證明自己不是草莓族，而且還保有「打死不退」的精神，讓台灣的創業香火得以延續到海外，生生不息。¹⁴⁸

這些不是草莓族的年輕人儘管付諸行動證明自己，但也確實握有一定的資源，比如台商第二代、企業家第二代自行創業、繼承家業、家裡提供第一筆創業基金。但就算有家庭背景、先天優勢，要創業就得勇於面對挑戰、要能吃苦，得從失敗中撐過與成長，這不僅是創業需要的精神，也是《遠見》鼓勵對年輕人的期許與鼓勵。

而這樣的精神背後，也突顯出緬懷台灣過去經濟成長的成功經驗，那些刻苦銘心的打拚精神、創業家精神，至今仍難以忘懷，不僅用來鼓勵年輕人，也用來期許台灣的產業發展、經濟發展。

但隨著青年貧窮的處境一直難以緩解，《遠見》也不得不面對往日不再的現實，例如在 2013 年 11 月的《遠見》第 329 期封面故事「出國拚第一桶金」，點出台灣年輕人赴海外就業的狀態，主題文章寫道：

¹⁴⁶ 《遠見》第 326 期，頁 122。

¹⁴⁷ 《遠見》第 326 期，頁 122。

¹⁴⁸ 《遠見》第 326 期，頁 254。

22K 彷彿是一道緊箍咒，讓台灣許多年輕人看不見未來的希望。於是，有一群年輕人開始往外遷徙，除了最早起步的大陸之外，他們也看見了新加坡、澳門、菲律賓，寧願離鄉背井，尋找生涯發展的另一種可能。¹⁴⁹

而〈40K 的吸引力，年輕人飛向海外尋找未來〉一文也破題點出台灣年輕人的困境：

台灣的職場正蘊釀一場低氣壓。一個殘酷的現實：薪資倒退 16 年，年輕人起薪一再降低。

就在這時，新加坡、澳門等地正在大規模發展賭場經濟與服務業，急需服務業人才。

兩者結合成一股新潮流，讓台灣年輕人開始大量到國外工作，而且絕大部分從事的是服務業基層工作。¹⁵⁰

而對此也出現台勞的爭議，比如文中訪問專業移工仲介公司，其中業務部經理就感嘆道：

康林引進菲律賓外勞業務 20 多年，現在竟然要仲介台灣人到菲律賓去做『外勞』，感到很諷刺。¹⁵¹

或是：

不少人力仲介公司表示，新加坡看待這些台灣年輕人的角度，和台灣看待來台工作的菲勞、印僱差不多。¹⁵²

而後續分享海外工作的年輕人經驗中，也穿插一些充滿感觸的話，例如：

在台灣工作很單純，但薪水少。在澳門工作環境複雜，但不辛苦，前又多。

¹⁵³

大家都很關注台灣，會一起討論台灣的時事、政治，但經常聊到最後都很失望。¹⁵⁴

五年後如果台灣經濟還是沒有起色，就繼續在國外流浪。父母看到我的成長，都叫我不要回去。¹⁵⁵

¹⁴⁹ 《遠見》第 329 期，頁 248。

¹⁵⁰ 《遠見》第 329 期，頁 252。

¹⁵¹ 《遠見》第 329 期，頁 255。

¹⁵² 《遠見》第 329 期，頁 257。

¹⁵³ 《遠見》第 329 期，頁 265。

¹⁵⁴ 《遠見》第 329 期，頁 266。

¹⁵⁵ 《遠見》第 329 期，頁 269。

台灣相關工作，在新加坡薪水是兩倍多，剛畢業就能拿到 5、6 萬的薪水，光這點誰會想留在台灣？¹⁵⁶

面對台灣昔日光景已難以憑藉努力再次重返榮耀，而擁有打拚精神的年輕人又為了薪水而遠赴他鄉，成為台勞。因此《遠見》也不得不面對在怎麼鼓勵年輕人，也得面對台灣經濟發展遭逢的產業困境。2014 年 4 月第 334 期封面故事為「加薪，老闆沒說的祕密」，就探討低薪問題，點出：

低薪的結果讓台灣的窮忙族愈來愈多。有高達四成二、357 萬的受雇者每月經常性收入不到 3 萬，30 歲以下年輕人超過六成月薪不到 3 萬元。¹⁵⁷

並提出低薪問題在於產業無法轉型、大陸崛起取代台灣、學用落差大等三個困境，最後提到當時正發生的太陽花運動，感嘆指出：

台灣再繼續內耗、拖延下去，就只能困守在 2300 萬人的市場，無法以對等的優惠關稅，與各經濟體進行貿易往來。

低薪是不是國恥，不只是政府的事，立法院也有責任，全民都要面對。台灣到底是要一起均貧，還是要升級賺全世界的錢，讓薪資翻轉，就從現在開始吧！¹⁵⁸

後續文章也指出全球都陷入低薪潮，並點出企業為降低成本、應對金融風險未雨綢繆，就算賺錢也不願立即漲薪，並也指出台灣是資本家的樂土，租稅負擔率是世界最低，薪資卻落後日、韓、香港、新加坡。但也提出壓低薪資的問也在於勞動成本提高，指出顧主為了負擔勞健保、勞退等勞動成本，變得不敢提升薪資。此外，《遠見》也指出派遣工作也是造成低薪的原因，以及本地年輕勞工不願進製造業，而企業為追求廉價勞動力而雇傭外籍勞工。

我認為這一個從對照過往台灣創業造就經濟起飛的願景與參照，到後來呈現台灣青年出外打拚的轉變，也讓《遠見》對於年輕人的論調逐漸轉變。前述曾提過在 2012 年 10 月《遠見》第 316 期中，總編輯楊瑪利還曾經以〈要當台勞，何必到澳洲？台灣不乏高薪苦工〉一文，認為台灣年輕人不一定要出國找工作。到了 2014 年 4 月，《遠見》也不得不正視低薪問題造成年輕人出外找工作的問題。

從這裡就能理解為何《遠見》在 2015 年後，對青年貧窮處境的討論就越來越少，因為《遠見》得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原本給年輕人的鼓勵與希望，根本不現實的問題。不論是要年輕人找回上一世代的打拚精神，或是要年輕人再次衝出創業家精神，但在發現台灣年輕人出國當「台勞」卻能賺到更多錢的現實下，不僅體現年輕人真的具有打拚吃苦、往外闖蕩的精神，但問題在於台灣沒有提

¹⁵⁶ 《遠見》第 329 期，頁 272。

¹⁵⁷ 《遠見》第 334 期，頁 211。

¹⁵⁸ 《遠見》第 334 期，頁 215。

供年輕人相對應回報的環境。這也是為什麼《遠見》後來的論調從鼓勵年輕人，逐漸轉變為開始肯定台灣年輕人。

第四節、小結

我在本章節回顧《遠見》雜誌從 2008 年到 2017 年之間，談論有關年輕世代處境的論述，探討青年貧窮在主流財經雜誌中如何再現。我在過程中所爬梳分析的現象，其實過往也有相關研究以不同角度切入談過，例如鄭亘良（2004）以〈論「年級論」——年級現象的初步探討〉一文，提出年級論述的打造忽略了階級的視野，其實只是表現出中產階級、知識菁英等的集體情緒，將新的世代稱為草莓族或進行詆毀，其實是透過汙名新世代，藉以確保自身地位的策略。¹⁵⁹

邱楷恩（2013）在《「草莓世代」的建構與想像》的碩論中，便提出主流市場媒體雜誌中提出的各種工作倫理、趨勢與價值，打造著理想中成功者的樣貌，並以此作為工作勞動的參考範例，為了擴張服膺當前勞動生產價值觀的論述，不管是反抗或是賣命，不管符合不符合社會價值，全都能被收納為生產力論述中所用，重點是要成為重要生產力。¹⁶⁰

我以論述分析研究《遠見》雜誌如何再現青年貧窮的過程中，也得出與上述相似的觀察與論點。但除此之外，我更具體梳理出種打造之間，在論述上是如何進行，以及論述中預設而沒提及的內涵，因此，我進一步梳理出幾個重點，分別為：一、2008 年的青年貧窮再現；二、以緬懷過去作為改變現況的想像；三、政策與個人之間的距離。以下我將重點整理並回顧。

一、2008 年的青年貧窮再現

《遠見》從 2008 年開始，探討台灣社會貧困問題的企劃，從新貧、工作貧窮、窮忙等，逐漸聚焦到以年輕世代為主，到 2012 年開始逐漸聚焦在談論年輕世代的貧困處境。對照當時社會的氛圍，《遠見》確實緊跟著社會氛圍與脈動，對當下台灣社會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面對年輕世代遭遇的經濟不景氣社會困境，《遠見》一方面點出不景氣下的各種社會問題，一方面也認為年輕人應該要在這不景氣中勇於面對與挑戰。

《遠見》從 2012 年開始，在不斷點出台灣社會各種面向的問題時，也持續這類希望年輕人努力、吃苦、堅持打拚的論調，直到 2014 年後，聚焦探討年輕

¹⁵⁹ 鄭亘良（2004）。論「年級論」——年級現象的初步探討。網址：
<http://sex.ncu.edu.tw/reset/?p=606>，檢閱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

¹⁶⁰ 邱楷恩。《「草莓世代」的建構與想像》。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世代貧困處境的企劃逐漸減少。而當 2017 年逐漸又有談論年輕世代的文章時，開始變成肯定台灣年輕人的論調。

《遠見》一路以來都非常關心年輕人的發展與出路，一直以各種特別企劃、封面故事來鼓勵與勉勵年輕人，雖然這些成功經驗、勵志故事都可說是普遍低薪困境大環境中的特殊案例，但《遠見》提出了面對大環境下，個人如何面對的建言與鼓勵。

這一過程中，青年貧窮的課題，探討起來，面相多且廣，主要的論調基本上是年輕群體的高失業率、低就業率，以及就算有就業卻遭逢低薪的問題，這是青年貧窮的主要關鍵，而以此為基準再延伸，討論會朝向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青年貧窮除就業與低薪問題外，還有其他什麼影響？另一個則是探討為什麼造成高失業率、低就業率與低薪問題，那問題就會開始變得越來越複雜且多樣。

青年貧窮造成的其他影響，大多聚焦在買房、成家與少子女化的問題，因此房屋政策、少子女化的問題，都與年輕群體的狀態息息相關。而探討為什麼造成高失業率、低就業率與低薪問題就更複雜了，一個是朝台灣經濟發展問題與產業發展問題切入來談，一個是朝台灣教育體制問題來談，還有一個是從年輕人的就業狀態來談。

當青年貧窮的問題深入討論時，可以探討的課題非常多且廣，且都是個很大的問題，比如光是一個台灣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問題就是大哉問，台灣教育改革又是另一個大問題。但所有這些之所以集中到青年身上，且能從青年貧窮聚焦，無不指出這個世代的青年遭遇上述這些問題的困境。

因此可以看到大環境的不景氣與有問題的政策深深影響到個人，而這些問題要能解決，也是很複雜的事。青年的貧困處境被提出，但最終直指的是上述眾多問題。因此談的雖然是青年貧窮，但其實不只談青年、也並非談貧窮。而是一個社會整體發展遭遇的困境。

此外，從 2008 年梳理到 2017 年之間，也體現出對於青年世代的處境，出現一種改朝換代的狀況。從最早 2008 年時還聚焦六年級生後段班去探討年輕世代的處境，逐漸的往 80 後、甚至到後來 90 後發展，這之間呈現出《遠見》大抵以 35 歲為一個臨界點，並探討年輕世代的處境。

然而《遠見》聚焦年輕世代的談論方式，也體現出幾個新的問題，是否跨過 35 歲後，因為年齡脫離青年群體的範疇，因而不再遭遇困境？還是因為超過 35 歲後，由於面對的問題與 35 歲下有所不同，因而討論困境的框架有所轉變？總之，從 2008 年以來，聚焦年輕群體討論年輕世代遭遇的困境是很明顯的，但這過程中，也確實呈現從六年級生逐漸變為七年級生、八年級生。

二、以緬懷過去作為改變現況的想像

《遠見》從 2012 年後聚焦年輕世代的困境開展各種企劃後，從這些論述中，可以體現出《遠見》一面點出台灣經濟問題、產業問題，進而造成的就業問題。但同時，《遠見》也指出台灣面臨缺工問題，各種 3K（骯髒、危險、辛苦）傳統產業一直找不到人。因此《遠見》一面鼓勵年輕人要在逆境中努力求生存，一面卻也指出現在年輕人挑工作，不願做傳統產業的問題。

而面對造成這些青年貧窮處境的經濟問題、產業發展問題，《遠見》也透過各種鼓勵創業的論述，期待台灣再次出現下一個郭台銘、下一個王永慶，甚至期許只要 5~10% 少數的精英或狂人創業成功，就有機會透過創業來改變台灣的未來。從鼓勵年輕人努力吃苦、認為年輕人不做傳產挑工作，到鼓勵年輕人勇於創業，這些論調無不流露出對台灣過往經濟繁榮成長的緬懷。

因為緬懷，因而出現以世代對話、世代對照等方式，一邊用來鼓勵年輕人，一邊又用來含蓄指責年輕人。而也因為緬懷過往台灣中小企業讓台灣經濟起飛的榮景，不論是鼓勵創業或期待下一個大資本家的論調，也成為鼓勵年輕人，或作為台灣經濟該如何發展的想像。

從《遠見》的論述中，可以體現從六年級生以降，就開始逐漸出現年輕一輩擁有更多休閒與選擇的社會氛圍，對於生活的追求不再只有努力工作，也可以是追求生活品質，或是工作之餘追求其他興趣。對照過去有份穩定工作後，尋找對象論及婚嫁，結婚生子、買車買房，逐漸把下一代扶養長大，進到傳宗接代的責任，這是上一個經歷台灣經濟成長的世代所度過的社會氛圍，以及這一世代氛圍所定義出來的成功想像。

然而這樣的成功想像正在被挑戰，而挑戰這些想像的，正是被這樣一代人的成功方式養育出來的下一世代。過往台灣社會的發展，促使生活型態迎來很大改變，年長一輩過去的奮鬥與努力，創造當前台灣社會的進步與更為富裕的物質生活，至少年輕世代開始出現不需要努力奮鬥、或尋求自己夢想的選擇。

上一代傳承成功經驗給下一代，這似乎是種延續物種生命再理所當然的事，但上一代的成功經驗卻難以實踐在下一代的現實生活中，因為年輕一輩所處的還境與條件都已與父母輩出現落差。一來台灣已不再能靠加工出口密集產業，在資本追求低成本下，不論是西進大陸或南南政策，台灣過往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條件，早已不存在。

二來台灣產業逐漸從製造業轉為服務業，但相對應的產業轉型卻沒有跟著發展，政府是要主導市場產業發展，還是要越少介入？結果台灣產業發展不論是轉型或提升，卻無法延續過往的成長光榮。

台灣社會過去的經濟發展，造就當前社會的物質條件與培養年輕一輩的優渥環境。但當過去賴以發展的加工出口密集產業沒能得以持續運行，且開始出現挑戰時，造成年輕一輩出社會時產生極大衝突，生於優渥環境，卻希望用同樣的打拚精神去面對就業市場，且這樣的職場還讓人看不到希望。

我認為《遠見》在 2014 年後，對於青年處境的論述逐漸減少，一來是太陽花運動後，年輕世代呈現出來的社會氛圍，反映出年輕世代的主體與力量，促使《遠見》原有的論述失效，得重新思考與年輕世代對話的方式。二來《遠見》這種對台灣過去經濟發展的緬懷，在面對台灣經濟依賴全球分工體制，期望外資投資下，卻又失去過往吸引外資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尤其《遠見》曾認為台灣年輕人不肯吃苦、不努力，無法擔任起產業後備軍應有的角色時，又見識到台灣年輕人為了高薪、為了賺錢，願意到其他國家去當「台勞」。

不論是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想像，或對鼓勵年輕人的方式，都呈現出《遠見》對台灣過往經濟繁榮的緬懷，而當過往的成功經驗難以複製時，面對年輕世代遭遇的困境，也體現出《遠見》這類財經雜誌難以再提供希望與鼓勵的困境。

三、政策與個人之間的距離

《遠見》雜誌對於年輕世代遭遇的困境，確實點出年各種問題，也透過一系列特別企劃給予年輕人希望與鼓勵。然而《遠見》整體的論調呈現方式，卻也使社會問題與個人之間脫鉤。在《遠見》的論調中，台灣社會環境確實越來越不好，也造成很多低薪問題、失業問題、就業問題，並深刻影響每個人。但個人在這樣的環境裡，要努力、要吃苦、要堅持、要創新，得在困境中努力面對生活的挑戰並求生存。

然而這些產業發展問題、經濟發展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工作貧窮問題、窮忙問題，該怎麼辦呢？努力工作、或是抓住商機創業，是個人得以解決經濟問題的方式，也有助於產業、經濟發展。最好年輕人還不要挑工作、投身傳統產業，讓這社會維持 5%~10% 少數精英或狂人推動整個經濟發展，而其他人要不創業、要不在自己崗位上努力打拚，各司其職、扮演好各自在社會中的角色。

從前述分析《遠見》再現青年貧窮的論述中，體現出的就是這樣一個願景，而這樣的願景恰好就是台灣過去以勞力密集加工出口的產業發展促成的經濟發展方式。然而在這樣論述的過程中，經濟危機、產業發展深深影響著個人，但個人卻似乎只能被動地在逆境中想辦法求生存，而能主動的就只有上述各司其職、努力打拚的部分。

我認為這樣談論的方式最後逐漸形成社會問題與個人之間脫離，形成政治歸政治、個人歸個人的狀態，我認為這正是一種去政治的過程。面對台灣整體經濟環境的不佳、產業發展的困境，以及各個貧富差距、低薪、工作貧窮、高房價等

眾多問題，如何促進經濟發展，藉由雨露均霑，來改善年輕人的處境，似乎變成唯一的解決方法。

因此，解決台灣產業發展問題，解決台灣經濟發展問題，就交由政府來煩惱、來處理，只要經濟搞好，很多問題都不是問題。但實際上台灣正面對的就是一個經濟就算搞好、就算景氣回溫、就算經濟正成長，但台灣社會仍然有貧富差距問題、低薪問題、工作貧窮……等等問題。然而在《遠見》談論有關青年貧窮處境的論述中，恰好就將問題給歸類到都是經濟發展的問題。

我並不否定追求經濟發展是解決眾多問題的重要方法，但我想談的是當從青年的處境體現出許多社會上的困境時，最後給予個人鼓勵和希望，讓人有能量來面對這些社會中的困境。雖然讓人充滿希望的在社會中追求更好的生活很重要，但若不對我們身處的社會與既有狀態提出質疑、批判或挑戰，實際上我們也只是被動的參與其中，而沒意識到許許多多的個人一同組成這個社會。

我認為《遠見》在打造整個青年貧窮的論述中，整體上還是鼓勵年輕人在社會中積極工作、尋找生活熱情，藉此面對整個大環境的不友善。然而這些宏觀的社會問題、政策問題，就交給專家、強人、菁英或政府來解決，也因此社會問題儘管深深影響我們每個人，但個人就想辦法過好生活，而缺少對現狀的挑戰、批判或質疑。

雖然 2012 年 8 月《遠見》第 314 期「年輕人憑什麼贏」的內容中，也有提及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的一面，但所談的方式終究是鼓勵年輕人找回對生活的熱情，與找回行動的能量，那怕你是參與社會也好，就是不要因為遭受不景氣打擊，而變得自怨自艾。《遠見》期望年輕人成為更有行動力的主體，去改變自己的生活。

我在本研究緒論時參考狄更斯的《孤雛淚》，我認為《遠見》這樣的論調跟狄更斯雖然在手法上不同，但效果卻非常類似。《遠見》會點出社會遭遇的困境與問題，但最後則是勉勵個人找到生活的熱情，透過成為有行動力，改變自己，進而也改變社會。《遠見》在論述中提供的成功案例，儘管給了讀者希望，但也把論述中點出的社會問題給消解掉了，因為《遠見》試圖證明不好的困境中，還是有人可以成功，因此問題不在社會大環境（或那是政府的事），而在於個人怎麼在這困境努力發光發熱。

狄更斯在小說《孤雛淚》中揭露底層民眾在生活中遭遇的苦難，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最後好角色處在美麗田園景色中的美好結局，彷彿悲慘處境來自個人的道德敗壞與錯誤的選擇。原本小說中揭露的社會問題，卻也在小說最後被消解了。因此社會問題擺在一旁，重點是個人如何追求道德的良善，藉以促進社會和諧。¹⁶¹

¹⁶¹ 相關討論，請參考本論文第 18-19 頁。

當然，狄更斯所處的社會環境與《孤雛淚》接近童話類寫實小說的創作風格，都跟當代《遠見》雜誌的專題報導或所處的社會環境差距極大。但我也得指出《遠見》在論述中呈現的鼓勵與提供的希望儘管重要，但並非促進社會問題的改變或進步，而是追求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運作。至少，《遠見》對於現狀的改善或解決經濟問題的想像，來自對台灣往日榮景的緬懷與參照。但那其實不是進步，而是一種只提當年勇的不斷回首。

四、小結：消失的貧富差距與階級問題

如前述所說，從 2008 年一路爬梳至於 2017 年，《遠見》雜誌從新貧、工作貧窮開始聚焦探討青年處境，並因此體現出世代之間的價值觀衝突，與對台灣過往經濟榮景的緬懷。然而除了在論述中將個人處境與社會問題拉開距離外，這樣聚焦於青年世代的處境的論述，也同時遮掩了某些問題。

在《遠見》雜誌 2008 年初，還比較從新貧、工作貧窮等現象談論社會困境，還可以看到所談論的對象不是以年齡層作為區分，而是以社會上各種遭遇弱勢的群體，例如單親家庭、新移民、都市原住民等等。新貧、工作貧窮的問題實際上影響到的就真的不是某一年齡群體，而是依靠工作收入維生，卻因為工資不足以維持生活基礎，而面臨困境的群體。

中國紀錄片研究學者呂新雨教授，在其《書寫與遮蔽》一書的封面寫著：「書寫既是一個敞開同時也是遮蔽的過程。然而，書寫永遠負擔著一個使命，那就是指向被遮蔽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對書寫本身的懷疑與反思，正是書寫的動力。」¹⁶²因此，當我整理分析出《遠見》雜誌如何再現青年貧窮的現象時，我也同時意識到青年貧窮聚焦談論，實際上凸顯了世代衝突，卻也因此隱匿了貧富差距的問題與階級問題。

在《遠見》雜誌介紹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到很多年輕創業家，實際上都是繼承家業，或是因為家裡本來經商，因而能提供相關人脈或資源。他們的成功案例，似乎暗示了連握有資源的人都如此努力了，可見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成功一定得努力的現實。但實際上，這些案例也隱含著階級複製的一面，即有錢人將金錢、資源或人脈延續給下一代，上一世代存有一定社經地位的，讓下一代也能延續相當的社經地位。

在這樣的論調中，青年貧窮問題聚焦在跨階級的「年輕人」似乎面對共同的處境。然而社會上原本的弱勢群體，比如前述所說單親家庭、都市原住民等，實際上共同面對的社會環境與問題，跟富裕群體青年遭遇的困境是有所不同的，這點在《遠見》的故事中通常看不到。有錢人跟弱勢群體同樣面臨社會的發展困境與經濟不景氣，但在《遠見》的青年貧窮論述中，凸顯的卻是世代之間的價值觀

¹⁶² 詳見呂新雨（2008）。書寫與遮蔽。廣西：師大出版社。

參照或對過去的緬懷，進而呈現世代之間的差異。階級之間的複製與流動侷限，就在青年貧窮的論述中消失蹤影了。

第三章、《崩世代》、《厭世代》中的青年貧窮再現

我在第二章裡以《遠見》雜誌 2008 年到 2017 年的期別作為分析內容，認為《遠見》雜誌中的青年貧窮再現，不僅僅只談青年、也並非談貧窮，而是台灣社會整體發展遭遇的困境。《遠見》雜誌在談論此困境時，常以上一代的經驗作為參照，因而出現世代對話、世代對照的論述，青年貧窮反映出兩個層面，一個是要年輕人找回上一世代的打拚精神，一個是緬懷台灣中小企業讓台灣經濟起飛的過往榮景，進而作為台灣經濟該如何發展的想像。

這樣的想像，仍是以經濟發展作為前提，對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困境，或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並沒有太多討論，因而仍以過往經濟發展的經驗作為未來發展的經驗參照，作為改善當前新自由主義發展遭遇困境的解方。即是說恢復到過往政治經濟得以運作的秩序或狀態，成為一種解決方案。

也因此當這種宏觀的國家層級的問題有賴政府解決時，個人如何面對世代貧困等青年貧窮的問題，也導向個人如何在困境中求生存的論述來解決。而以國家層面來說，經濟發展如何恢復到過往能夠成長的樣貌，追求過往國家介入重回經濟成長的秩序，遂成為世代貧困與青年貧窮背後隱含的思維。即追求過往資本主義社會運作「良好」，促進各階層流動的狀態。

然而《遠見》雜誌對於青年貧窮再現的這類論述，也只是一種面向，試圖反駁或對話的論述也成為另一股聲音出現。因此，我將在第三章中挑選《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與《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這兩本專書，試圖探討這兩本書如何再現青年貧窮，或怎麼談論世代貧困的問題。

第一節、《崩世代》中的青年貧窮再現

《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後稱《崩世代》）出版於 2011 年，據作者之一的林宗弘在〈《崩世代》：一本意外暢銷的社會學書籍〉一文裡所說：

這本書原來是勞工團體因應總統大選出版 2012 勞動政策白皮書的規劃案，希望針對兩黨提出社運團體的政策建議，但是在勞陣內部討論後，認為應該針對台灣社會的長期趨勢提出批判與建議，並且與一般社會大眾而非總統候選人進行對話，改變了整本書的寫作方向。¹⁶³

《崩世代》一書回顧台灣從 1990 年代到 2011 年寫作的近二十年發展歷程，

¹⁶³ 林宗弘（2012）。〈《崩世代》：一本意外暢銷的社會學書籍〉。臺灣社會學會通訊，76。頁 32。

指出台灣政府以新自由主義作為政策發展的主要依據，因而已開始出現困境，並進一步推估未來二十年的台灣社會發展，提出充滿未雨綢繆的警惕，希望這樣的預警，有助台灣社會參考北歐國家，朝中間偏左的新福利國家發展，追求更具公平正義的社會發展。因此，《崩世代》一書談論的是一整個世代遭遇的發展困境，而這遭遇發展困境的一世代人，又陷入工作貧窮或沒有保障的非典型聘僱與彈性勞動之中。

《崩世代》一書的書名在草稿時原為《2020 台灣崩壞》，後因為想吸引年輕讀者，因而在社群網路平台 Facebook 舉行投票，「在第三天就以八百票中的五百多票遙遙領先，作者們一致同意改名為《崩世代》。」¹⁶⁴會有這樣的現象，在第二章爬梳《遠見》雜誌時，已可看出端倪，這裡再次重新簡單回顧。

隨著 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化，新貧、工作貧窮的問題越來越大，不論是失業率問題、低薪問題，都造成社會上極大的不滿聲浪，當時的社會運動也對政府清勞工而長期偏向企業財團利益發展的政策非常不滿。

其中有關青年貧窮的議題，最早是由「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後稱「九五聯盟」）所倡議，「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2004 年 9 月成立，2005 年 4 月 19 日登記立案，主要爭取青年勞動者的權益，以要求當時打工最低時薪從 66 元上修到 95 元為主，因而命名有「九五」。

「九五聯盟」在論述上也非只強調青年勞動的處境，而強調是整體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尤其保障弱勢勞工的最低薪資，面對逐漸高漲的物價，卻長期沒有調漲，變成變相減薪。到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台灣政府於 2009 年 4 月至 2011 年 9 月間推出「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後稱「22K」方案），更是將青年貧窮問題成為顯著問題。

「九五聯盟」就曾於 2009 年 3 月 2 日發表〈面對青年貧窮化宣言〉，歸納出「青年貧窮化」的四個面項，分別為：（1）勞動條件的惡化與彈性化、（2）教育費用擴張與文憑貶值、（3）生活費用高漲與消費社會、（4）稅制不公下的財政危機與世代不正義。

在當時社會普遍年輕世代甫畢業就面臨「22K」低薪政策，以及高失業率，加上全球金融海嘯影響的層面不僅年輕人，從企業到投資客都難以置身事外，無薪假、裁員風波更是當時每天必播的新聞，原本所謂「新貧」、「工作貧窮」的課題，更疊加在「22K」政策上，迫使連大學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都馬上遭逢工作貧窮的困境。

2008 年席捲全台政黨輪替浪潮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更開出「633 政見」作為選舉政見。¹⁶⁵夾帶新官上任的三把火，馬政府在上台後以一連串的經

¹⁶⁴ 同上。

¹⁶⁵ 633 分別為：1、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 6%；2、失業率降至 3%以下；3、2016 年平均國民所得

濟政策，包含消費券、簽訂 ECFA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等等，2010 年經濟就恢復成長到 10%，然而經濟成長的果實，卻只體現在數據上，而與民眾的生活脫節，因而逐漸累積諸多不滿。

這就是《崩世代》2011 年出版時的台灣社會氣氛，加上在這社會氛圍中還有《遠見》雜誌這類以追求經濟發展作為主要想像的論述。因此在《崩世代》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跟「九五聯盟」〈面對青年貧窮化宣言〉共通的論點，以及歷經第二次政黨論題後，從社會運動的視野，提出對國民黨、民進黨在經濟政策上的批判。而全球金融海嘯後的青年貧窮課題更是當時如火如荼的社會議題，也因此在此時的臉書平台上，「崩世代」成為票選的書名了。

一、《崩世代》中的世代貧困再現

《崩世代》全書一開始，除了有許多團體代表的推薦序外，也安排不同世代的人來寫序，除了勞陣的秘書長孫友聯外，另有七年級生、育有兩女的六年級生單親媽媽，以育有一對兒女的及四年級生父親。從序的安排，可明顯感受到《崩世代》要談的並非世代之間的衝突，而是社會在一世代發展中的困境，因而有不同年級、不同處境的人寫序。

《崩世代》全書共五章，分別為：第 1 章「台灣大崩壞？」、第 2 章「財團化危機」、第 3 章「工作貧窮化」、第 4 章「少子女化危機」、第 5 章「創新福利國」。談台灣在財團化下的賦稅不公、貧富差距、以及台灣產業發展的問題；進一步談這些政策與企業財團不斷壓縮成本，造成台灣工作貧窮化的問題，嚴重影響到個人在這社會中的生存問題；以及當年輕世代連工作都會遭遇貧窮的問題時，就算結婚也會抗拒生小孩或「生孕罷工」，來維持僅有的生活品質，但也因而造成少子女化的問題。最後，面對上述因新自由主義發展思維下的經濟發展問題、財團壟斷問題，以及工作貧窮與少子女化等問題，《崩世代》一書提出「創新福利國」，認為台灣應該要從意識形態上根本改變對發展的思考，借鏡北歐福利國家的經驗進行變革。

在第一章裡，以寓言「二十年後的台灣」作為開場，點出失業問題、財團持續造成貧富差距新高、台灣人口下降、城鄉差距、反移民遊行、自殺社會問題，作為全書的開場，點出「我們的分析顯示，這些重大危機主要來自經濟全球化之下，大財團對政治與經濟的長期影響。」¹⁶⁶並表示「如果您與我們一樣，對台灣的未來憂心忡忡，希望您能仔細讀完本書。」¹⁶⁷使用較生動的方式來作為開場，並邀請讀者來一起探究這些問題。

第一章節接下來的內容，講述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衝擊下，全球經濟發展都

達 3 萬美元。

¹⁶⁶ 《崩世代》，頁 6。

¹⁶⁷ 同上。

遭逢巨大變化，「在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述的掩護之下，過去三十年間實際發生的不僅是經濟全球化，而且是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團化——大財團的力量壓倒了國家與一般民眾。」¹⁶⁸ 2008 年的金融海嘯突顯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不論是先進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都受到極大影響，尤其全球化後，影響更不再只限於單一國家、或鄰近區域，而是全球範圍。因此，「過去三十年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其本質就是資本家開始改變遊戲規則，為了賺取更大的利潤，拒絕承擔各種國家與社會責任、不惜拋棄本國弱者、在世界各地劫富濟貧，甚至進行全球性的大規模金融詐騙。」¹⁶⁹

因此就算是先進民主國家，也出現經濟危機，而歐洲更有「歐豬五國(PIGS)」¹⁷⁰陷入公債危機，因而導致嚴重的失業與貧富差距問題。而亞洲國家或社會福利較差的南歐國家也出現世代不公與少子女化的問題，讓年輕人面對較競爭、且工資低的惡化就業條件，進一步影響到生育。而擴大對移工、移民的依賴，就成為許多先進國家解決人口老化或少子女化問題的方法。

台灣跟發展程度更高的歐美日國家相比，也開始受到新自由主義發展困境的衝擊，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岌岌可危」¹⁷¹時，台灣也正朝著這些國家的發展困境前進。因此：

無論藍綠各黨都成了財團的俘虜，政府配合財團減稅與企業逃避社會責任的結果，使得台灣的租稅不公、工作貧窮、貧富差距與人口老化的問題都加速惡化。¹⁷²

而在台灣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與經貿自由化的影響中，此章節花了些篇幅強調與中國大陸發展經貿往來造成的影響，提出台灣從 1990 年代以來越依賴中國大陸，貧窮人口就越多，失業率就越高的論點，儘管之間的因果關係，僅由台灣貧困處境的各項數據每況愈下，與台灣資本西進中國大陸投資不斷升高作為主要論證，¹⁷³但最終仍強調為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問題：

兩岸經貿擴大導致貧富差距惡化，國家財稅政策向財團傾斜、以及勞方越來越弱勢，無不證實了台灣過去二十年來走上了新自由主義之路，相對於國家與一般民眾，台灣大財團的力量正變得越來越強。¹⁷⁴

¹⁶⁸ 《崩世代》，頁 8。

¹⁶⁹ 《崩世代》，頁 10。

¹⁷⁰ 歐豬五國分別為：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與西班牙。

¹⁷¹ 《崩世代》，頁 16。

¹⁷² 同上。

¹⁷³ 例如：「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台灣逐漸步入已發展國家之列，資本與技術供給豐富，土地與勞動力稀缺，而中國大陸則是勞動力與土地豐富，工資相對低廉得多，因此，兩岸經貿往來的擴大將會使台灣大財團等資本與技術擁有者獲益，同時使得中小企業主、農民與工人等中下階層受害，失業人口與貧窮人口雙雙增加，導致了貧富差距的惡化。」（《崩世代》，頁 21）

¹⁷⁴ 《崩世代》，頁 26。

因此，台灣從 1990 年代以後，便開始逐漸遭遇台灣經濟奇蹟的經驗崩壞的問題，造成四大衝擊，分別為：？衝擊之一：富者越富、窮者越窮；衝擊之二：資本集中、創業無望；衝擊之三：文憑貶值與工作貧窮；衝擊之四：生育罷工與人口老化。若再如此發展下去，到了 2030 年假若又遭遇嚴重的金融危機，台灣社會將有可能陷入大量失業、貧富懸殊、人口衰減、國家破產、族群衝突等等困境。

上述內容如可視為全書重點的摘錄，將後面各章節論述的重點串連起來，在第一章中開門見山點出，並於章節末再次邀請讀者進一步來一同檢視與思考這些問題：

本文最初坐著哆啦 A 夢的時光機前往未來看到的那些頭條新聞，在你我的有生之年其實很有可能發生。如果您與我們這些「杞人憂天」的社運份子及學術工作者一樣，十分擔心預言成真，請與我們一同檢視接下來的種種證據、一同腦力激盪，認真思考搶救台灣社會的政策方案。讓我們從這一刻開始改變台灣的未來。¹⁷⁵

由於《崩世代》試圖朝一般大眾對話，因此第一章裡許多統計數據的模型，則放在第一章最後的附錄裡，表明「以下的附錄提供一些關心學術研究與統計證據的讀者參考。」¹⁷⁶更明顯感受到為了讓讀者閱讀第一章全書重點的門檻降低，因而將較學術性的統計資料放在附錄。

從全書開場眾多團體的推薦文，到五個不同社會位置的序言，到第一章生動的開場，以及先開門見山做全書重點整理的安排，以及不斷邀請讀者一同思考的設計，都可看出《崩世代》一書想「與一般社會大眾而非總統候選人進行對話」的安排，也同時可以直接讀出《崩世代》的書寫，著重在台灣社會發展遭遇的困境，而這困境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因此未來將迎來一個崩壞的世代。這樣的論述有別於財經雜誌中追求經濟發展的思維，對主導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提出批判與抗議。

二、新自由主義發展困境下的世代貧困

假若《崩世代》一書如前述林宗弘自己所說並非討論世代衝突，那也難以對後續產生影響。實際上，世代困境所談論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必然使生存其中的一代人受到影響，因此儘管《崩世代》一書初期沒有想要談論世代衝突，但也為世代衝突的論述做好了準備，尤其後續的章節安排，更有層次的循序漸進，從第二章財團化危機，談到第三章因財團化危機導致工作貧窮化後的低薪問題、失業問題以及彈性勞動問題，接續第四章在此情況下，因工作貧窮問題，導致生育成為生存的挑戰，因而生育率下降造成少子女化危機。

¹⁷⁵ 《崩世代》，頁 44。

¹⁷⁶ 《崩世代》，頁 45。

看似不同的社會議題，有一個從大到小、由上到下的安排，從較宏觀的政策面到社會最小單位家庭生育的影響。因此，在第一章節開門見山破題後，後續章節開始深入講述問題的背景、成因、歷史，以及提出真正的問題所在。若與第二章《遠見》雜誌對於追求經濟發展的論述一起看，就可以明顯感受到《崩世代》反駁這類追求經濟發展思考的論調。

例如當財經雜誌談論台灣的經濟面對什麼困境，與需要如何發展、追求產業轉型時，《崩世代》卻提出工運的弱化，使得勞工被迫長期處在薪資停滯的處境，因而導致工作貧窮，進一步造成世代危機，書中就如此說道：

近二十年間產業工會組織與勢力的凋落，卻化為新自由主義茁壯的沃土，失去與資方談判工會平台的受僱者，被迫接受長達十餘年實質薪資成長的停滯，在全球與兩岸經貿擴張以及工會弱化的結構成因之下，勞動者根本無力為自己要求實質工資的提高，再加上政府又採取重資方輕勞動的長期壓抑，台灣經歷了十五年的無感成長，青年勞動力出現了工作貧窮化的現象，也壓低了生育意願，逐步導致了「崩世代」的社會危機。¹⁷⁷

若以《遠見》雜誌為例，實際上《遠見》雜誌也非常重視台灣社會遭遇的困境與問題，如第二章所分析，《遠見》雜誌往往在點出問題後，仍然相信追求經濟發展的思考，也期許新世代的年輕人要努力打拚，同時《遠見》雜誌中對兩岸經貿發展的期盼，呈現出將經濟發展的希望跟著當時的馬英九政府一同朝大陸看的期許。

因此，可說《遠見》雜誌在面對金融風暴影響的世代貧困課題時，點出台灣社會遭遇的困境與問題，但在政策上認同政府追求經濟發展的思維，即是對於追求經濟發展的期盼。而處在這充滿社會問題裡的個人，要更努力追求自己的競爭力，如同台灣政府也在努力追求台灣在世界各國的競爭力般。《崩世代》一書想要對話，甚至反駁的即是這樣的思維與論述。

因此，相較於主流財經雜誌試圖談論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困境，《崩世代》試圖指出台灣在新自由主義思維下發展經濟至今遭遇的困境。尤其在第二章中，就有許多批判主流迷思的論點，例如：

但詭異的是自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以來，一般民眾或勞動者卻經歷漫長的「無感成長」。沒有人否認經濟的重要性，但最弔詭之處在於，政府宣傳的經濟優先，指的是產業經濟而非家庭經濟；至於經濟成長，是 GDP 數字的起伏，並非你我薪資的增加。¹⁷⁸

又或者反駁政府官方宣揚經濟成長的論點：

¹⁷⁷ 《崩世代》，頁 63。

¹⁷⁸ 《崩世代》，頁 64。

監察院在二〇一一年五月對行政院的正文中就明白指出：「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情況正是造成國內「就業市場萎縮，薪資停滯不前，但 GDP 成長卻年年亮麗」的主因。¹⁷⁹

《崩世代》一書中呈現的論點，都能很明確看出對主流經濟發展思維的反駁與批判，甚至影響到世代正義：

一旦經濟擺中間，公平正義就只能靠邊站；只要是企業要求，包括社會福利、環境保護、稅制財政，甚至是世代正義皆被默許可以為了經濟發展而犧牲，以致於「國家政策財團化」的現象也日益明顯。¹⁸⁰

又或當主流財經雜誌在談論台灣過往的經濟奇蹟發展經驗時，點出不同世代之間對於經濟發展認知的差異：

從一九九〇年到二〇一〇年這二十年，台灣與中國以及歐美間之三角貿易大為興盛，促產條例使租稅門戶大開、勞動薪資長期凍漲導致工作貧窮與所得分配惡化、最後造成國家債務快速增加。上一代人還對「台灣經濟奇蹟」、「台灣錢淹腳目」津津樂道，這代人卻不能不替下一代人的未來，憂心忡忡。¹⁸¹

從《崩世代》第二章的總結，更可以看出《崩世代》如何再現世代貧困的前因，即是台灣政府長期重商的不良政策導致：

我們深信，若能透過對民眾的預警——崩世代危機已經迫近，集結民意要求兩黨經由「減債、減赤」公開的政策辯論，對在海外創造就業機會的財團全面取消租稅優惠、提高合理的營所稅稅率，並配合資本利得稅的開徵，降低受薪階級的租稅負擔；擴大服務行業、高科技產業的工會組織，透過基本工資的合理調整公式，讓全體勞動者真正共享經濟成長的具體作為，可以成為台灣社會的集體共識，進而扭轉未來。

反之，若接續放任財團化的橫行，隨減稅與薪資停滯而來的負面效應，將是貧富差距與工作貧窮的擴大與惡化，這也將是加速「崩世代」降臨的第二個成因。¹⁸²

三、工作貧窮的問題

因此《崩世代》一書在第三章開始談論工作貧窮的問題，也是從這裡開始，我們開始看到青年貧窮處境的書寫，在第三章的一開始，就如此寫道：

在編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們採訪了許多落入工作貧窮困境的年輕人，以了解

¹⁷⁹ 《崩世代》，頁 71。

¹⁸⁰ 《崩世代》，頁 74。

¹⁸¹ 《崩世代》，頁 114。

¹⁸² 《崩世代》，頁 121。

他們的生命歷程，我們發現所謂的「六年級生」薪資偏低無力創業，「七年級生」在就業市場上找不到穩定的工作，也看不到自己的未來。¹⁸³

也由此可見，在《崩世代》出書的 2011 年，青年貧窮描寫的對象為六年級生與七年級生。書中只列舉一個案邱全德的例子，談論他的家庭狀況、找工作的狀況、低薪狀況，從此一典型個案的經歷，點出許多工作貧窮的問題：

在當前極度惡化的台灣就業市場環境中，勞工同時被迫面臨「失業」、「非典型工作」、「工作貧窮」、「超時工作」等各種勞動風險。¹⁸⁴

這樣的受訪者故事，在第二章《遠見》雜誌介紹青年困境時，也可以看到許多例子，甚至藉此進一步突顯出世代之間的參照，鼓勵年輕人努力面對困境。而《崩世代》雖然並沒有強調世代衝突，但從這些論述的內容來看，不免仍穿插世代衝突的內容。例如引述當時監察院長王建煊的發言作為駁斥，反駁主流論述中認為青年不認真讀書愛打工的思維：

二〇一〇年底監察院長王建煊院長在一場演講中談到大學生不認真念書而去打工「笨死了」，語出驚人引發輿論爭議。在解釋青年為何打工上，我們認為王建煊院長搞錯了重點，問題在於為什麼台灣有越來越多的青年及一般勞工，為何淪落到被迫從事各種非典型工作？答案主要是台灣的產業結構轉型、以及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變遷，使得全職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少，而非典型的工作機會卻越來越多，進而導致台灣勞工——尤其是青年受僱者陷入了多重的工作崩壞風險當中。¹⁸⁵

這樣的內容，就突顯兩種衝突，一是官員不知民間疾苦，二是年長者不知年輕人的處境，從這也能理解為什麼《崩世代》一書在太陽花運動時能夠促進世代衝突之間的討論。尤其《崩世代》一書中在探討台灣人就業為何越來越困難？為什麼台灣的工作會崩壞？更有以下的論點：

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產業外移衝擊了台灣勞動市場的需求。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資本外移，對產業永續發展與穩定就業造成不利的影響。

二、產業轉型。因傳統製造業與高科技產業大量外移，服務業興起，台灣開始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勞動市場結構型態。服務業超越工業部門，成為就業主流。

上述兩大主要原因，在崩世代前面兩章中都有大量論證，在談論工作貧窮的問題時，在此將問題銜接起來，因而將整個歷程總結來看，可得知工作貧窮的發展問題：

¹⁸³ 《崩世代》，頁 124。

¹⁸⁴ 《崩世代》，頁 127。

¹⁸⁵ 《崩世代》，頁 128。

自二〇〇〇年以來，台灣各種非典型工作者人數不斷增加，特別是在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台灣勞動市場的非典型工作者人數增加情勢趨明顯。¹⁸⁶

從這樣的論述，可以再次清楚看到經濟危機帶來的客觀影響，不論是在《遠見》雜誌或《崩世代》一書裡，都呈現出相似的問題與經濟發展的困境，但當主流面對經濟問題仍期待產業轉型、經濟發展作為突破時，《崩世代》則認為發展經濟無法解決問題。例如：

以往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認為：給人救濟不如給人工作，就業是擺脫貧困最重要的方式，但為何窮人家的工作者越來越多，卻無法脫離貧困呢？¹⁸⁷

或當財經雜誌點出年輕人的困境，但仍鼓勵年輕人要更吃苦耐勞時，《崩世代》則強調勞動條件越變越差的問題：

整體而言，二〇〇七年至二〇〇九年間，台灣的勞工正面臨著「平均工時延長、物價上升、平均薪資卻下降」的過勞化與工作貧窮化困境。¹⁸⁸

因此，當勞動條件越來越差，當許多人遭遇工作貧窮的困境時，就使得社會上有一群人為了維持基本生存而活，因而出現「窮忙族」：

台灣政府在勞動法制層面的漏洞，導致了台灣工作崩壞風險的第三大來源——窮忙族的誕生。不幸的是，窮忙族為公司賣命可能遭受的身心傷害風險得不到合理的保障，過勞死的勞工家屬只能自己承擔苦果。¹⁸⁹

從這就能很清楚看到面對同樣的社會問題，《遠見》和《崩世代》卻有不同角度的見解。從《遠見》訪問當時的王如玄來說，低薪是為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崩世代》卻突顯低薪造成工作貧窮而成為窮忙族的問題。

《崩世代》在第三章中探討工作貧窮的問題，進一步將宏觀的產業發展、政策發展的因素，藉由工作貧窮的問題跟個人銜接起來，再次強調出與主流論述不同的看法：

本章分析了台灣工作崩壞的起因——產業外移與服務業的成本弊病，解剖了三大工作崩壞的現象，也就是非典型工作、失業與工作貧窮，以及窮忙族的形成，也討論了多年來台灣勞工政策背後的預設——把工作崩壞當成個人的責任，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勞動政策根本的價值觀問題。……台灣社會之所以出現大量「工作貧窮」勞工，絕不能以常見的「個人化」簡單論述輕易帶過，因為這種論述將「工作貧窮」勞工陷入貧窮的主因，歸究於勞工自己未能積

¹⁸⁶ 《崩世代》，頁 132。

¹⁸⁷ 《崩世代》，頁 143。

¹⁸⁸ 《崩世代》，頁 148。

¹⁸⁹ 《崩世代》，頁 155。

極工作賺錢，這種論述往往成為社會對於工作貧窮普遍化的危機視而不見的藉口。¹⁹⁰

《崩世代》透過層層分析，強調類似《遠見》雜誌中，這種將工作貧窮中的個人處境，最後導向個人層面，試圖營造出還是有很多機會或方式可以面對困境時，也同時正是新自由主義思維下推動勞動政策的思維。因此《崩世代》提出：

因此想有效解決新時代的工作貧窮危機，就必須雙軌並行，在制度層面的改革上，同時從「家庭」與「工作」兩個層面進行改革，在家庭層面應該從「消極協助安貧」到「積極協助就業」，在「工作」層面，應該從「合理調整基本工資」到「平等勞動待遇」。（《崩世代》，頁 157）

《崩世代》第二章談論失業問題、工作貧窮問題，都得先談論經濟發展的問題，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後，聘僱關係是社會中毫無任何疑慮且普遍存在，因此必須先理解、描繪為何經濟發展發生問題，進而點出失業、工作貧窮與貧富差距的問題，進一步藉由青年的處境含括這些現象問題，形塑青年貧窮的現象。因此，談論經濟發展的問題，涉及政府擬定經濟發展的政策問題，就得探討許多有關經濟政策層面的東西。

四、少子女化的問題

當環境因素影響到就業環境，工作貧窮的問題便會影響到個人，社會的問題跟個人之間深深連結起來。因而在工作貧窮的問題後，《崩世代》進一步在第三章中談論少子女化的問題，這更涉及個人層面，然而涉及個人，又不僅僅只是個人層次的問題。因此，《崩世代》第三章開頭提出：

少子女化的背後，是一個個年輕就業家庭，受到職場求生與養兒育女雙重壓力夾殺的真實故事。比較世界各國長時間的政策經驗，我們就會發現，台灣的超低生育率根本是政府一再「不作為」與「錯誤作為」所導致的人為困境。

¹⁹¹

少子女化的另一面反映的是社會人口老年化的問題，因此不論是老人照護或退休金制度，也都是相應而生的問題，例如：

企業倒閉，經濟停滯，還只是寒冬的序曲。國家的總體經濟衰退，就會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偏偏高齡化時代的政府，要支付一大群老人的退休金。行政院主計處二〇一〇年的資料顯示，台灣政府的潛藏負債約為十三兆八千億元，其中近十二兆的負債就是來自於軍公教的退休金與勞工保險。¹⁹²

¹⁹⁰ 《崩世代》，頁 156。

¹⁹¹ 《崩世代》，頁 165。

¹⁹² 《崩世代》，頁 170。

上有老、下有小，當這些問題逐漸提出，世代問題就變得更明顯，尤其到底是哪個世代得面對最嚴峻世代挑戰？《崩世代》一書從開場的警世預言，到從經濟發展、產業、政策到個人工作貧窮問題，到每個家庭得面對的現實困境，逐漸完善整個世代危機的問題，而當個人會遭遇怎樣處境時，《崩世代》中如此呈現：

少子女高齡化的「格局」一旦形成，就埋下了世代衝突的種子。老年人當然希望早點退休，年金「落袋為安」；但試想二〇六〇年青年人的經濟負擔吃力程度，他們會認定所有的社會保險都是不公平的遊戲，自己繳的保費，都變成老年人的給付，三、四十年後自己卻恐怕要血本無歸。然而，老年人人數眾多有選票，當然希望各種老年福利不斷加碼；於是青年人寧可移民、逃稅、逃避社會保險，想辦法自己救濟。這又更加速社會安全體系的崩壞……。

193

因此少子女化連帶有老人照護、老人年金、退休金等，未來如何延遲社會運作的問題，進而埋下世代衝突的種子。眼前青年貧窮、世代問題的提出，也是如此世代衝突的一環，但這樣的衝突並非如《遠見》中的世代經驗參照，而是在啃子女化的未來裡，不同世代會因為照護問題、退休金問題而產生衝突。

因此，儘管林宗弘認為《崩世代》一書並沒有強調世代衝突，但《崩世代》一書的論述中，針對現實發展的困境，正描繪出一世代政策發展如何影響下一世代。而處在這世代中的個人，也因而得面對工作人貧窮的問題、少子女化的問題。例如《崩世代》中提到：

少子女化牽扯那麼多企業、政府社會安全體系的衝擊效應，但是歸根究柢，來源是一個個年輕就業家庭，所遭受的真實生存壓力。造成此種壓力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國家政策官僚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養兒育女是每個家庭自己的事，政府為什麼要幫忙？」¹⁹⁴

而個人得面對的家庭問題，又是與政策息息相關，例如當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生產關係已經開始改變，女性也大量投入到就業市場時，生兒育女該如何應應，就攸關女性勞動的課題：

少子女化並不是世界趨勢。少子女化是沒制度、沒政策、沒有花心思幫助女性勞工平衡生育與工作的「擺爛國家」所造成的惡果。

減輕女性育兒壓力的政策：一、促進男性的育兒責任；二、創造普及平價的托育服務。¹⁹⁵

當人口逐漸老化又加上少子女化，又加上工作貧窮的低薪問題，青壯年更不

¹⁹³ 《崩世代》，頁 171。

¹⁹⁴ 《崩世代》，頁 177。

¹⁹⁵ 《崩世代》，頁 181。

願生兒育女。儘管政府也有許多補助津貼，但都只是補貼，而非從政策宏觀層面調整，尤其當補貼還得受限於稅收影響，例如：

與日本的政策相似，台北市政府二〇一一年起發放每月兩千五百元兒童津貼，每年預算需要二十五億。但日本政府每年稅收占 GDP 的百分之二十七，能全國普遍實施；台灣政府的稅收太低，僅占 GDP 的百分之十二。因此，我國顯然沒有「全國跨縣市普及發放兒童津貼」的本錢，只有富裕的台北市政府做得到。台北「天龍國」獨享福利的效果，可能就是刺激台灣新生兒家庭的戶籍「移入」台北市。更何況，根據日本的政策經驗推測，台北市生育率實質提高的可能性，也十分有限。¹⁹⁶

此外，少子女化也影響到相關產業的發展，利入托育產業，《崩世代》也因此提及新自由主義思維下，當政府無法介入市場時，造成的托育影響：

正因為私立托育業者的勢力龐大，政府設置公共托育設施，會影響現有托育機構的生意，引起「與民爭利」之譏。在新自由主義市場至上的理論下，公共托育政策經常被批評為國家過度介入市場、破壞自由競爭。民眾對公共教育服務的需求，媒體與政客卻視而不見。¹⁹⁷

因此，假若從少子女化來看，又再次體現出政策上的問題，以及台灣社會發展上，許多思維還無法與時俱進調整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因為稅率低所以政府沒錢做事。我們面對的是不合時宜的家庭觀念、不符現實的自由市場論調，導致因應少子女化的政策應做而未做，做了又做錯，陷入「發錢催生」的陷阱。總之，台灣的超低生育率絕對是一場政策擺爛與既得利益者阻撓所造成的「人禍」。¹⁹⁸

加上前述工作貧窮的各種問題，當一邊生育的政策環境有所不足，一邊又無法有足夠的經濟條件放心生育時，就共同造成年輕世代的壓力：

看似個人生育選擇所導致的人口危機，其實是政府與人民集體決策的危機。如果台灣政府與人民的思維，若非「吝於支持」就是「發錢了事」，二〇三〇年台灣人口崩壞的命運不易改變。¹⁹⁹

在《崩世代》的分析中，青年貧窮的困境一邊是因為就業市場中工作低薪導致的貧困問題，另一邊則是過往相信有了工作就能解決家庭機制運作的想像已不復存在，而政府提出解決的方案又只是以發錢為主。因此面臨，環境越來越不好，政策卻也只提出末端發錢的處理方式，而無更全盤探討結構因素的思維。

¹⁹⁶ 《崩世代》，頁 196。

¹⁹⁷ 《崩世代》，頁 201。

¹⁹⁸ 《崩世代》，頁 204。

¹⁹⁹ 《崩世代》，頁 209。

五、《崩世代》的政策建言與後續影響

《崩世代》一書從整體經濟產業的發展，到工作貧窮的處境，到少子女化生育相關政策、性別政策，都反映出對政府施政的不滿與批判，不僅反映訴諸政策改革的解決方案，也反映出對政府施政的期待。因此，《崩世代》在最後第五章中，以中間偏左的思維提出「創新福利國家」的願景，書中如此說道：

與新自由主義所主張弱肉強食的市場競爭不同，中間偏左的價值觀念核心在於維護公平、社會分享與風險均攤，這不僅符合我們台灣一般民間互助與關懷弱勢的情感與生活常識，更是未來台灣政府與企業所應該遵循的價值理念。

200

我們認為，未來台灣福利國家的建構不應侷限在社會福利或是就業安全體系的改革，如此只是替資本主義「擦屁股」的效率提高罷了，面向未來的福利國家制度，應該考慮國家財政、產業發展與社會政策的關連性與協調性，努力將社會福利與產業創新相結合，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創新福利國家」。²⁰¹

《崩世代》一書進一步提出八項政策建言，分別為：一、管制資本外移，降低兩岸經貿自由化衝擊；二、加薪加稅救台灣；三、強化工會協商能力，革新勞資爭議處理機制；四、減少工作貧窮，扶助低薪者脫貧；五、協助窮忙族遠離過勞；六、逆轉少子女化與高齡化大作戰；七、從外勞到移民政策；八、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

由此來看，《崩世代》在書末提出許多政策上的建議，仍然充滿政策白皮書的影子，但《崩世代》也提出希望社會大眾積極參與議題的召喚：

未來的四年到八年之間將是台灣持續走向新自由主義不歸路，或是建立創新福利國家的關鍵時期，兩條國家發展路線之間的爭議，將可能使台灣遠離最糟糕的未來圖像，改變台灣需要各位的參與。²⁰²

並進一步列舉六項可採取的行動包括：一、網路討論；二、報章投書；三、電話質詢；四、公共辯論；五、投票抵制；六、參與社運。由此可見，《崩世代》一書確實原本是「因應總統大選出版 2012 勞動政策白皮書的規劃案」，但也同時為了「與一般社會大眾而非總統候選人進行對話，改變了整本書的寫作方向」。

也因此前述論述中才會有「未來的四年到八年之間」等用語，剛好是呼應總統任期的四年到八年。現在回顧來看，2012 年的總統大選正是國民黨的馬英九拚總統連任，而民進黨的蔡英文以台灣首位女總統候選人參與角逐，而《崩世代》正是這場總統大選前出版。

²⁰⁰ 《崩世代》，頁 217。

²⁰¹ 《崩世代》，頁 218。

²⁰² 《崩世代》，頁 239。

除了政黨政治外，當時社會上也出充斥許多社會議題，包括華隆勞資爭議案、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核四爭議、日日春文萌樓案、文林苑都市更新爭議、大埔事件……等等。因此，《崩世代》一書中也期許讀者能積極參與運動，或依照自身條件用各種形式參與公共討論。

除台灣自身外，2011 年 9 月美國爆發民眾占領華爾街，由 99%對抗 1%，抗議貧富差距的行動，不僅在美國引起諸多關注與媒體報導，更在全球範圍引起極大討論，更有許多國家民眾紛紛效法佔領行動。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之後，各種社會上不滿的情緒都在強調著貧富不均的重大問題，一味追求經濟發展的思維也遭遇極大挑戰。

因此跟本論文前面第二章所分析《遠見》雜誌中的論述相對照下，可明顯看出《崩世代》提出另一種對於社會發展的思維，並反駁財經雜誌這類論述中將普遍青年貧困問題歸咎到個人身上的論調。同時從經濟政策面、工作貧窮到少子女化問題，層次分明由上而下，一層一層的談論新自由主義思維下，台灣的發展困境。而書中許多為了論證而點出的世代衝突，更是首度系統的談論世代貧困的問題。

然而《崩世代》所再現出的世代貧困是一個包山包海的問題，涉及人口問題、福利問題、經濟問題、就業問題、生育問題……每個問題都可以從不同專業領域發展，而這些問題又共構世代貧困。而世代貧困更是一整個世代發展的困境，並影響在這世代困境中所生活的人。

其中「世代貧困」的論述發展聚焦到「青年貧窮」，很重要的一塊在於，年輕人同時遭遇《崩世代》一書中所提到的工作貧窮、失業問題、以及擔憂生小孩的負擔問題，其中又以生小孩為最重要的關鍵。因為工作貧窮問題、失業問題是每個年齡層都會遭遇的問題，不見得是年輕人獨有。但少子化問題攸關年輕群體為何不生育的問題，儘管隨著醫療科技發展，高年齡層產婦也並非少數，但畢竟不像工作貧窮或失業問題一樣具有每個年齡層的普遍性，因此青年貧窮逐漸成為聚焦談論這些問題最佳的方式。

《崩世代》一書剛出版時，還不是突顯世代衝突，而是以世代談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但當太陽花運動爆發時，各種反對與大陸簽訂服務貿易協定的爭論展開時，由於太陽花運動在檯面上有大量年輕人投入，因此太陽花運動背後的青年貧窮現象也引起諸多討論，到此時世代問題就不僅僅只是談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更也談論處於這樣發展困境中的年輕人的遭遇，而早在 2011 年就提出預言示警的《崩世代》，加上駁斥主流論述中訴諸個人努力面對困境的論調，成為突顯青年貧窮問題較完善的論述。

六、《崩世代》的侷限

儘管《崩世代》一書提出台灣政府在政策上追求經濟發展的迷思，但為強調這問題，也有自身書寫論述上的問題，比如在談因資本外移，導致台灣產業提供高薪的工作變少，因而導致失業、工作貧窮、青年貧窮等問題，因而認為「相對於臨近的日本或韓國，我國產業外移的趨勢更為嚴峻。」²⁰³

但如果因為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資本外移，導致台灣從過去密集勞力、加工出口的產業所提供的工作逐漸減少，因而導致台灣失業率大增、淪為低薪工作或非典型勞工。那如何理解韓國與日本產業外移的趨勢沒有台灣嚴峻，其低薪工作或非典型勞工的問題與台灣相比，日本、韓國勞工遭遇的困境未必比台灣還不嚴重，甚至導致社會上更加激烈的競爭？

這邊就出現論述上一個自身矛盾的地方，像日本、韓國為了增加產業競爭力，也是透過各種非典型勞動、彈性勞動，又由於重大財團而輕中小企業，更導致工作職缺競爭激烈，形成日韓年輕工作者找到工作的得面對高壓的工作環境，找不到工作的得面對競爭壓力極大的求職市場。²⁰⁴

而韓國、日本在此情況下的自殺率更是高於亞洲其他國家。這樣推論回來，使得產業外移是否造成工作貧困的問題，並非如此絕對，至少日本韓國的經驗，就可提供借鏡，就算產業留在本地扶持，但企業在市場競爭下，為了縮減人事成本，而使用各種非典型勞動或更加彈性的聘僱方式，造成競爭激烈的高壓就業市場與社會環境。

產業是否留在本地發展與勞動市場之間的關係，日本、韓國的勞工處境，很難成為台灣產業發展可以參考的對象。我認為更適合參照日本、韓國扶持本地產業，卻為了在國際競爭，而在國內形成更激烈的就業競爭環境，這樣的發展可提供台灣借鏡與對照。

此外，《崩世代》在第一章財團化中，使用大量數據與資料，呈現台灣政府依靠讓財團減稅換取資本進駐投資，然而也因為國際競爭下，資本不斷外移，加上經濟產業發展以高科技為主，導致能夠發展的高薪職缺有限，進而影響工作貧窮、失業，甚至導致個人再也難以負擔家庭生育，因而最後提出福利國家的思考。

在這裡《崩世代》的論述中，很快的將台灣產業發展的困境，以及因經濟危機遭遇的社會危機，與台灣中小企業或大資本西進中國大陸連結在一起，因為同時間共同發生，就建立起因果關係。書中如此說道：

我們發現對中國投資比率越高，也就是資本外移的速度越快，台灣的失業率

²⁰³ 《崩世代》，頁 130。

²⁰⁴ 有關日本、韓國的處境，可參考：陳慶德（2017）。再寫韓國：臺灣青年的第一手觀察；新社會研究院（2016）。憤怒的數字：韓國隱藏的不平等報告書；藤田孝典（2016）。貧困世代。

與貧窮率也就越高。此外，對中貿易出口暢旺時，雖然能稍微緩和失業問題，卻會增加台灣的貧窮人口。根據中研院學者林宗弘的計算，台灣對中貿易依賴度與貧窮率，以及對中國投資比率與台灣的失業率都高度相關。²⁰⁵

只因為同時發生，兩者之間就具有高度相關，這樣的推論相較書中其他論述，因果關係顯得連結太快以及薄弱。但確實能突顯台灣資本追求利潤，往成本低的地方跑的現象。但也因此反映出最後對台灣發展為福利國家的想像，這樣政策想法的論述侷限。

因為福利國家的前提為高稅收，但當台灣正以減少財團稅收的方式作為經濟發展的思考，甚至藉以慰留資本留在台灣發展產業時，高稅收何以成為可能？而這恰好也是《崩世代》書中不斷提醒讀者的，在新自由主義發展下，資本為了逐利而全球跑的現況，進而思考如何面對台灣財團企業在資本全球化下可輕易流動的問題。

因此儘管《崩世代》一書中提到應該要「考慮國家財政、產業發展與社會政策的關連性與協調性，努力將社會福利與產業創新相結合」，²⁰⁶但這並非政府政策就能改變，因為財團資本的全球流動性正是造成台灣減少稅收的原因。

故而如果不面對企業資本說走就走的流動便利性，《崩世代》提出的「創新福利國家」真的就只是願景，而非具體的改革方針或政策，而原因也正是書中清楚描繪出台灣政府對資本、產業的無力與難有作為。但不論如何，《崩世代》作為一本面向社會大眾的專書，終究提供了完整的論述與對未來發展的想像。

與新自由主義所主張弱肉強食的市場競爭不同，中間偏左的價值觀念核心在於維護公平、社會分享與風險均攤，這不僅符合我們台灣一般民間互助與關懷弱勢的情感與生活常識，更是未來台灣政府與企業所應該遵循的價值理念。

²⁰⁷

我們認為，未來台灣福利國家的建構不應侷限在社會福利或是就業安全體系的改革，如此只是替資本主義「擦屁股」的效率提高罷了，面向未來的福利國家制度，應該考慮國家財政、產業發展與社會政策的關連性與協調性，努力將社會福利與產業創新相結合，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創新福利國家」。²⁰⁸

我認為《崩世代》所提出的想像或願景，依照《崩世代》書中的資本全球流動的邏輯，顯現出矛盾與難以實踐的面相，但終究提出了一個願景，給了讀者希望與期待。這點其實跟《遠見》雜誌很像。《遠見》雜誌在鼓勵年輕人刻苦耐勞、努力面對困境時，往往也都提供成功人士的經歷，似乎只要跟著成功人士的經驗，

²⁰⁵ 《崩世代》，頁 19。

²⁰⁶ 《崩世代》，頁 218。

²⁰⁷ 《崩世代》，頁 217。

²⁰⁸ 《崩世代》，頁 218。

或是跟這些成功人士一樣努力、堅持、維持熱情，就能走向成功。

然而努力不見得一定成功，就算複製成功人士的經驗，也不見得真能改善自身困境，這點在《崩世代》中提供了許多解釋。但終究《遠見》雜誌給了一個希望，面對困境的挑戰，也只能提供希望。因此，我認為《崩世代》最後提出的福利國家願景，在這道理上跟《遠見》雜誌很像，都提供了成功案例作為願景與希望的想像，但也同時具有難以實踐的問題。

在本章節中，我藉由梳理《崩世代》，體現出面向大眾傳播的書籍中，有另一套反駁主流經濟發展想像的論述，在這樣的論述中再現出青年貧窮的問題。下一節，我將以另一本書《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聚焦探討，另外一種再現青年貧窮，並成為另股風氣的論述。

第二節、《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中的青年貧窮再現

《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後稱《厭世代》）一書出版於 2017，以「厭世」加「世代」的組合，創造一個新的詞彙呈現青年貧窮的處境。《厭世代》由吳承紘企劃與主筆，除專題報導外，另有專題影片、專題動畫，《厭世代》一書中各章節先後發表在網路媒體《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上，從 2017 年 5 月 3 日發表第一篇：〈【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我們現在在哪裡？〉，陸續到 2017 年 8 月 11 日發表最後一篇：〈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外篇：奔向貧流層的失速列車——人生勝利組眼中的厭世代〉。並在同年 11 月 29 日集結成冊出版專書，且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於 12 月 18 日就又二刷，可見其暢銷程度。

《厭世代》可說是在《崩世代》於 2011 年發行之後，再次聚焦以「世代」為切入點探討貧困處境的書籍。然而兩本書之間相差六年，這之間經歷馬英九政府時期為促進經濟，與中國大陸簽訂 ECFA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經歷太陽花運動反對 ECFA 之中的服務貿易協定，在台北街頭興起一波年輕世代反抗的浪潮，更經歷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選出台灣首位女總統蔡英文。原本《崩世代》一書中所批判的藍綠政府，已從陳水扁政府與馬英九政府，轉變為《厭世代》中的馬英九政府與蔡英文政府。

本節將分析《厭世代》如何再現青年貧窮的問題，本文先試圖爬梳《厭世代》一書出版時的社會氛圍，進而爬梳《厭世代》書中的內容，進一步探討《厭世代》怎麼再現青年貧窮。

一、厭世的社會氛圍

《厭世代》中以「厭世」貫穿全書作為歸納世代貧困處境的名稱，而實際上厭世一詞並非作者原創，而是台灣社會中瀰漫在年輕人群體之間的一股風氣。從本論文前述第二章中，整理《遠見》雜誌從 2008 年到 2017 之間如何再現青年貧窮的問題，可以總結出以《遠見》作為例子，財經雜誌媒體在提供年輕世代如何面對經濟發展的困境，以及如何面對世代困境時，總以年輕人要努力、要有熱情、堅持、創新、肯吃苦耐勞來面對困境，更要積極樂觀接受挑戰，因而上一世代的打拚經驗或同一輩的成功事蹟，就成為如何面對世代困境的解方。

本論文藉由探討《遠見》雜誌，試圖探討主流論述如何再現青年貧窮，體現出這些充滿正能量的內容。這些充滿正能量的勵志內容，不僅只是出現在財經雜誌，也出現在其他媒體或書本上，例如誠品書店 2015 年公布的 10 大暢銷書中，就有 8 本書是以心理勵志為主，²⁰⁹而誠品書店 2016 年的 10 大暢銷書中，則有 2 本以心理勵志為主。²¹⁰可以說充滿正能量的心理勵志書籍曾經蔚為風行，這也是為何以出版商業利益為取向的財經雜誌，會有如此多鼓勵的勵志內容。

然而幾年下來，年輕世代遭遇的貧困問題沒有獲得太大改善，正能量思維不斷遭受挑戰。《厭世代》一書訪問《崩世代》的主筆林宗弘，就提到：「大多數的年輕人已經面對（低薪）這問題，而且已經面對至少十五年左右了，約二〇〇〇年之後開始。」²¹¹當台灣整體社會氛圍充斥正能量的聲音，而低薪問題又從未有顯著改善時，厭世的社會氛圍開始出現。

在臉書平台上，就有許多以負能量、厭世為主題的粉絲頁，陸續在 2013 年到 2016 年之間創立，創造出一波厭世氛圍，並在網路上獲得廣大迴響，例如臉書粉絲頁「垃圾文界的一位美少年」成立於 2013 年，以發表對工作、情感、生活不穩定等現實困境為主的厭世短文，獲得許多網友的共鳴，因而獲得廣大關注，竟累積 11 萬人按讚。²¹²他在粉絲頁的介紹中如此自我介紹：

現為默默無名的上班族，以普妹的態度，時尚的角度，負能量爆發的心情寫作，經營粉絲團「垃圾文界的一位美少年」，對時事的關注混合職場的抱怨配合大量的諷刺截圖表情包，為現代的怨男怨女找到一絲療癒。²¹³

此外也有在臉書平台發跡，累積一定的人氣與粉絲後進而出書，例如臉書粉絲頁「每天來點負能量」，於 2015 年 6 月 4 日成立，擅長將原本屬於正向思考的

²⁰⁹ 詳見〈誠品 10 大暢銷書 秘密花園榜首〉，《中時電子報》，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210000143-260204>，2019 年 3 月 16 日檢索。

²¹⁰ 〈2016 年誠品最暢銷是這 10 本！沒看過就遜了！〉，《TVBS 新聞網》，網址：<https://news.tvbs.com.tw/ttalk/detail/life/5533>，2019 年 3 月 16 日檢索。

²¹¹ 請見《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頁 20。

²¹² 最後查看時間為 2019 年 3 月 17 日。

²¹³ 請見臉書粉絲頁「垃圾文界的一位美少年」：<https://www.facebook.com/pg/garbagestoryboy/about>，2019 年 3 月 17 日檢索。

勵志語錄改成負面思維，藉由負負得正，來釋懷負面情緒，例如「其實世界就是我們的遊樂場，只是大部份的人是工作人員」或「俗話說萬事起頭難，過了之後就會變得更難」，在臉書平台上吸引近 75 萬人按讚。²¹⁴

2016 年時更將負能量語錄集結出版《每天來點負能量：失落的壞話經典，負負得正的人生奧義》一書，²¹⁵且榮獲金石堂 2016 十大影響力好書。連作者林育聖都自嘲「這麼非主流價值觀的書，賣到現在這樣，都快變成新的主流了。」儘管「每天來點負能量」粉絲頁已於 2017 年 10 月 8 日宣佈停止更新，但其在網路上造就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此外還有「厭世動物園」粉絲頁，成立於 2016 年 4 月 30 日，以擬人化的動物插畫嘲諷各種時事或年輕人的困境，累積 19 萬人按讚，²¹⁶爆紅後將其插畫結集出版《厭世動物園》一書；²¹⁷或「厭世哲學家」粉絲頁，成立於 2016 年 10 月 10 日，擅長以古諷今，將古人厭世的文言文字句翻譯成當前的白話語氣，也累積將近 17 萬人按讚，²¹⁸於 2019 年時出版《厭世講堂：顛覆人生的十堂莊子課》一書。

若只談社群網路臉書平台，還難以突顯此厭世的社會氛圍。獨立搖滾樂團「草東沒有派對」成軍於 2012 年，是由 4 人組成的樂團，以唱出「魯蛇世代」的虛無與憤怒而走紅，²¹⁹歌詞時常反映著輕世代厭世、虛無、憤怒的心境。2016 年 3 月發行首張專輯《醜奴兒》，分別獲得 2016 年第 7 屆金音獎、2017 年第 28 屆金曲獎多項獎項的肯定。

「草東沒有派對」的走紅與獲獎，引起輿論許多討論，尤其第 28 屆金曲獎上與知名老牌樂團「五月天」競爭多個獎項，更出現「魯蛇世代」與「正面夢想」對決，或搖滾樂團是否出現「世代交替」的討論。²²⁰在第二章中，曾介紹過《遠見》雜誌 2012 年 11 月第 317 期，就曾以五月天的勵志故事做封面故事，在 2012 年社會上瀰漫青年貧窮的討論時，以五月天的成功故事鼓勵年輕人努力追夢。從五月天到「草東沒有派對」，體現了整個社會的氛圍走向。

從這些主打厭世、負能量的臉書平台走紅，到將社群平台的內容加值出版，

²¹⁴ 請見臉書粉絲頁「每天來點負能量」：<https://www.facebook.com/NeEnergy/>，2019 年 3 月 17 日檢索。

²¹⁵ 鍵人（林育聖）（2016）。《每天來點負能量：失落的壞話經典，負負得正的人生奧義》。台北：時報出版。

²¹⁶ 請見臉書粉絲頁「厭世動物園」：<https://www.facebook.com/zooofdepression/>，2019 年 3 月 17 日檢索。

²¹⁷ 厭世姬（2017）。《厭世動物園》。台北：時報出版。

²¹⁸ 請見臉書粉絲頁「厭世哲學家」：<https://www.facebook.com/hateworldphilosopher/>，2019 年 3 月 17 日檢索。

²¹⁹ 請參考：馬世芳（2016）。「魯蛇世代」的虛無與憤怒——我聽「草東沒有派對」。小日子，49。

²²⁰ R 夫人（2017）。無關世代交替！這 2 點證明「五月天」與「草東沒有派對」的音樂根本沒得比！。網路溫度計：<https://dailyview.tw/popular/detail/1145>，2019 年 3 月 17 日檢索。

以及「魯蛇世代」的主打搖滾樂團奪獎獲得肯定，都無不突顯出社會上瀰漫一股厭世當道的氛圍，並且以文字、插畫、音樂等各種形式呈現。《每天來點負能量》的作者林育聖的那句自嘲「這麼非主流價值觀的書，賣到現在這樣，都快變成新的主流了。」點出原本迎戰以正能量、勵志、樂觀為主流論述的「厭世」非主流論調，竟也逐漸形成一波新的主流論述，並與正能量較勁。

《厭世代》一書的內容還是報導專題時，從 2017 年 5 月發表系列文章到同年 8 月，就是試圖呈現出這股年輕世代厭世的社會氛圍，因而以「厭世」為主題進行世代貧困的書寫。前述這些以厭世為主題進行各種諷刺、自我解嘲、反映時事或工作甘苦談的文本，雖然也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再現青年貧窮的處境，但《厭世代》一書可說是試圖釐清這股厭世氛圍為何而來，並呈現出世代貧困的處境。

在前一節中，本論文已探討《崩世代》一書如何提出有別於財經雜誌的論調，本論文將進一步探究反映厭世社會氛圍的《厭世代》一書，來探討歷經六年後，《厭世代》一書如何再現青年貧窮的問題。

二、厭世的根源：工作貧窮

他們是 1990 年代、民國 80 年前後，啣著滑鼠出生，素質最優秀的一代，卻也是在變化劇烈的年代中，徬徨、不安，疲憊地尋找光亮的「厭世代」。

這樣的厭世感，是對處於貧流層低薪生活的反諷，不悲觀，卻也無法樂觀。

221

「厭世」這兩個字不只是網路的流行詞彙，更是年輕人的生活態度，那是一種無可奈何，不知如何改變，走鋼索般的人生，彷彿只要一個斷裂，生活立刻會陷入困頓。²²²

《厭世代》將厭世代群體的年齡定調在 1990 年前後出生的七年級生、八年級生，在整個年輕世代充滿厭世的社會氛圍下，《厭世代》一書的作者吳承紘試圖系統的呈現年輕世代厭世的處境，希望藉由梳理年輕世代的困境，讓不同世代之間能互相理解，進而搭起溝通的橋樑。

《厭世代》一開始就提出年輕人的低薪問題，以及學歷貶值、學非所用的教育問題。在探討低薪問題時，吳承紘提出台灣並沒有制定貧窮線標準，以「每人每月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 60% 作為最低生活標準，但由於以家戶為單位，因而無法呈現出厭世代「低薪」的處境。這邊就限定了希望探討初入社會的年輕人，在沒有依賴原生家庭的情況下，只憑藉自身薪資獨立自主的低薪困境。因此，若以最低收入作為標準，則難以體現出年輕世代低薪的處境。²²³

²²¹ 《厭世代》，頁 3。

²²² 《厭世代》，書背。

²²³ 吳承紘訪問《崩世代》的主筆之一的林宗弘，提出低薪問題還是得用最低生活費來看。而台

尤其 2009 年政府推動「22K」政策，儘管解決了失業率問題，卻也因此壓低整體大學畢業生初入社會的平均薪資。加上學歷貶值又背負學貸，²²⁴大學畢業的新鮮人初入社會，即遭逢負債且低薪的處境。因此，吳承紘如此描繪生活在這些問題下的年輕世代：

原本應該是發光發熱的年輕一代，因為低薪而失去夢想的力量，對未來充滿徬徨，隱隱的不滿無從抒發，只能在不友善的環境裡想辦法找到出口，擺脫這一切。這樣的年輕人，我稱他們為「厭世代」。²²⁵

因此，我們可以在受訪者中看到各式各樣處境的年輕人。有資管系畢業後學非所用的麵包師傅王隆甫，在做麵包中找到人生方向，但因為學貸、租屋、孝親等費用，雖然出社會一段時間，從學徒升上師傅，月領四萬多，仍然每個月被錢追著跑。也有在台中出社會幾年領著三萬多薪水，願意每月省吃儉用繳學費學國標舞追求夢想的女孩林秋容（化名）。

陳芬君與雙胞胎妹妹到台北工作，居住在四坪雅房，省吃儉用還學貸外，還精打細算努力存錢，希望未來能在老家嘉義買房子，讓一家人能住在一起。黃瑋隆住在高雄領著比同儕相對較高的三萬多月薪，但對高攀不起的房價感到絕望，因而對結婚感到畏懼。也有住在台南新化，一個月只花一萬塊的接案設計女孩曾鈺苓，寧願錢少也要生活品質。

因此厭世的最主要原因來自工作貧窮的問題，因為生活只剩工作，而工作的薪水又只夠維持生活開支，面對這種困境又看不到未來有何改善的希望，因而感到厭世，然而厭世的面對生活困境，卻是為了認清現實，進而獲得能夠繼續走下去的力量。因此厭世並非消極，而是種低薪困境中持續生活的感受，實際上還是得靠樂觀或是「小確幸」來讓自己在厭世中持續討生活：

「當然所謂的厭世不是那種真的要怎樣的厭世，是一種疲憊、不安定的感覺。」王隆甫笑著解釋。「所以，不樂觀的話，要怎樣繼續走下去呢？」²²⁶

被錢追著跑的生活，讓他根本無法擁有良好生活品質，這樣的生活，對於衣食無虞的人而言是萬般不可思議。沒有額外動力，很容易無以為繼。

「小確幸」就是讓生活可以繼續走的動力之一。²²⁷

因此所謂厭世，反映的是對未來存有希望與夢想，因而當希望與夢想難以實

灣許多年輕人初入社會的薪水，就接近或低於最低生活費用，因此林宗弘認為「現在年輕人的收入就是中低收入戶，就是貧窮線底下的生活。」，且認為年輕人面對低薪問題，約從 2000 年就已經開始。

²²⁴ 書中根據教育部 2015 年統計，有近兩成大專學生近 30 萬名申請學貸，見《厭世代》頁 22。

²²⁵ 《厭世代》，頁 14。

²²⁶ 同上。

²²⁷ 《厭世代》，頁 38。

現，甚至生活只剩下工作，而只剩下工作又得在生活中精打細算時，這才對照出失望感與絕望感：

沒有未來，或即使看到未來也無法做些什麼，是厭世代的共同困境。由低薪所衍生的問題，除了最現實的生活開銷，失去對未來想像的能力，才是最大的問題。²²⁸

在收入與支出之間精打細算鎔銖必較，除了讓自己在這個嚴酷的人生戰場活下去，也不能失去作夢的權利。²²⁹

像她這樣的厭世代，正在台灣的各個角落，疲憊卻又努力地生活。²³⁰

厭世是因為對未來存有期望，而在現實中又因工作貧窮而帶來失望，面對失望又難以看到改善的可能，與其陷入悲觀，不如自我嘲諷，厭世取代了努力工作的打拚精神，成為一種生存方式：

相較於一九八〇到一九九〇年代「愛拚才會贏」的樂觀，「厭世」已經成為這一代年輕人的共同語言。而「厭世」一詞也從原本消極悲觀的語境，轉化成為一種無可奈何，卻又不得不面對的一種情緒，更多的時候，更像是一種自嘲。²³¹

在《厭世代》一書的受訪者中，也有非常注重生活品質、工作意義的年輕世代，因此吳承紘訪問了「Adecco 藝珂」台灣最大國際人力顧問公司的台灣暨南韓區總經理陳玉芬，指出：

年輕人追求的是生活與職場上的「意義」，但老一輩的人追求的卻是成功以及健康的生活。所謂的成功就是當上律師、醫師等師字輩的工作，或是爬到總經理以上的高階職位，而健康的生活則是五子登科；因此他們無法接受同性戀，以及種種不在它們世界裡的行為與觀念。²³²

因此厭世呈現的青年貧窮，突顯年輕世代成長環境與工作環境的落差，即當前年輕一代成長在生活條件、物質條件、教育條件都相對較好的環境，因而在出社會工作後對於工作的想像有所不同，然而產業條件與勞動條件，卻沒有等比例的變得相對較好，因而出社會投入職場時，出現巨大的落差。

例如《厭世代》書中，就有受訪者以自己的薪資與母親當年出社會的薪資做比較：

「薪水的確在倒退，最明顯的就是小時候我媽領的薪水。我媽說她一個月領

²²⁸ 《厭世代》，頁 44。

²²⁹ 《厭世代》，頁 48。

²³⁰ 《厭世代》，頁 50。

²³¹ 《厭世代》，頁 68。

²³² 《厭世代》，頁 154。

三萬，一天領一千塊，她還只是高職畢業而已。我爸就會笑說，你碩士畢業領的薪水跟你媽一樣，但是物價完全不一樣。」黃瑋隆哈哈大笑地說。台灣自一九九六年以來的薪資停滯現象，黃瑋隆的這番話恰好做了最佳證明。²³³

當主流充滿緬懷過往台灣努力工作拚經濟的論調時，這種生活條件的豐裕與勞動條件低落的差距也就越明顯。因此厭世所反映的青年貧窮，除了工作貧窮、窮忙的問題外，還有年輕世代追夢的一面，因而突顯學用落差，或工作跟興趣毫無相關的面向。

三、厭世的根源：世代衝突

在產業條件與勞動條件沒有變得相對較好的情況下，年輕世代越來越難想像自己能達到過往台灣社會對成功的定義，比如說買房，而長輩對年輕世代的期許，也跟著出現落差與衝突，因而體現世代衝突的一面。但其實如果回顧年長世代當年工作環境的狀況，又可以發現當年的勞動條件其實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我不禁想起嬰兒潮世代那一輩人辛勤工作，沒有假日的勞動生活，當年的努力付出獲得了回報，然而這一輩的厭世代呢？即使全年無休，恐怕也只是讓收入多了一些，但犧牲的卻是健康與生活，以及可能的未來。²³⁴

在生活、教育等條件都變得更好的年輕世代，一方面對於生活有更多追求生活品質與夢想的養成，但在出社會後遭遇越來越差的勞動條件，這樣的落差突顯的世代衝突，在全社會上是台灣經濟不同階段的對照，但在一個家庭中，卻是一個年輕人出社會前後的巨大差異，而這差異來自出社會前的生活條件與出社會後的處境，而這就與父母輩的經歷與成長環境有更多的衝突：

不再以工作為第一優先，是厭世代與上一個世代最大的差別。他們想要追夢，想要慢慢奠定自己生活的品質，不再以犧牲自己的時間與健康換來報酬，特別是在普遍低薪的環境。但這樣的心態往往會被上一代解讀為「不努力」、「不切實際」或「不求上進」等負面評價，然而上一代批判的同時，卻往往忽略每個世代之間成長環境與價值觀的轉變，因此流為世代之間的爭端。如近幾年來的流行用語「小確幸」，就傳神地表達了厭世代以小確幸堆積向前走的能量，或是在低薪與高房價的環境乾脆放棄儲蓄，以消費獲得片刻愉悅的心態。但上一代的長輩，卻往往把小確幸打為年輕人墮落或不求上進的象徵。

²³⁵

其中，吳承紘更點出高房價是世代衝突的一大問題。高不可攀的房價，更讓身處工作貧窮處境的年輕世代，對於買房充滿各種絕望感，而這種絕望感對照父

²³³ 《厭世代》，頁 69。

²³⁴ 《厭世代》，頁 49。

²³⁵ 《厭世代》，頁 80。

母輩，對照社會對於年輕人該如何努力與成功的想像，又更顯得蒼白無力：

……我不禁想起自己的父母當年是如何乘在經濟起飛的浪頭上，靠著勞力把三個小孩扶養長大，還買了房子，過著所謂「中產階級」的穩定生活。而黃瑋隆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不知道高出他們多少倍，年紀輕輕卻已經被房價所擊潰。²³⁶

在「台灣錢淹腳目」的八〇年代尚且如此，薪資停滯的厭世代要如何負擔堪稱史上最高的房價？²³⁷

為什麼一定要買房，租屋難道不行？如同黃瑋隆的遭遇，上一代「有土斯有財」、有房子才是穩定與成功人生的觀念，深深地烙印在厭世代的身上，也因此影響他們對於房子的觀念。²³⁸

但隨著房價高漲，房租也勢必節節高升，對處於低薪的厭世代更是不利。對照一九九〇年代還在「台灣錢淹腳目」的尾聲，當時的房價、起薪和現今相比，不難想像厭世代所面臨的困境有多麼艱難。²³⁹

承襲或承受上一代的居住觀念與現實政策的巨大落差，或許是厭世代們最深層的厭世來源。²⁴⁰

因此世代之間的衝突，體現對過往經濟發展的對比，進而影響到不同世代對工作、成功、薪資、買房等不同的想像，而不同世代之間所處的環境有所差異，也反映出台灣的經濟從過往的快速成長，到後來的發展停滯：

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九六年，台灣創下平均 GDP 超過 9% 的紀錄，被喻為「經濟危機」，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台灣與新加坡、南韓和香港被稱為「亞洲四小龍」，開創將近四十年的經濟榮景。²⁴¹

廿一世紀的台灣，可以說「黑手當頭家」「台灣錢淹腳目」的美好年代已經過去，一九九〇年代前後出生的厭世代一投入職場，面對的就是已然褪色的經濟，以及薪資停滯的困境。²⁴²

年輕世代與年長一輩在不同環境所體現的衝突，背後更深一層則是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想像，台灣曾經經濟起飛、被稱作亞洲四小龍，過往的榮景至今仍常拿來做對照，包括買房的父母與買不起房的年輕世代，努力工作就有希望（包含整個社會不斷前進的氛圍）跟努力工作也不知道未來會變怎樣（台灣未來何去何

²³⁶ 《厭世代》，頁 72。

²³⁷ 《厭世代》，頁 73。

²³⁸ 《厭世代》，頁 75。

²³⁹ 《厭世代》，頁 78。

²⁴⁰ 同上。

²⁴¹ 《厭世代》，頁 99。

²⁴² 《厭世代》，頁 100。

從)。

四、產業困境中的負負得正

年輕世代因為低薪、生活只剩工作，薪資只夠維持基本生活(或要省吃儉用)因此對未來沒有期望，跟父母輩相比，又感到世代之間的歧異與極大落差的衝突，進而感到厭世。吳承紘為了呈現整個厭世代的貧困問題，開始探討為何企業無法支付高薪，因而也訪問了中小企業主，並也看到中小企業主的困境：

在台灣邁入廿一世紀之前，白手起家、黑手當老闆是社會流動順暢的象徵，相對平等的所得分配，讓一九八〇年代經濟達到頂峰的台灣人，開始有了「台灣錢淹腳目」的自豪，以及「愛拚才會贏」的自信……²⁴³

從數據跟實際的觀察來看，二〇一五年對中小企業來說的確是不好過的一年。長期的不景氣在這年更為嚴峻，如白皮書所分析，²⁴⁴由於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以及大宗物資價格走緩，一五年全球貿易也因而走勢疲軟，全球出口年增率-12.8%，是二〇〇九年金融風暴以來的最低點，以出口導向為成長支撐的國家，經濟成長表現多走勢低迷，比如台灣。不但外銷差，內需也好不到哪，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成長率雙雙衰退，但大型企業的減幅更明顯。²⁴⁵

因此低薪問題來自產業發展問題的問題，不是中小企業主不給高薪，而是中小企業主自身都難保，因此問題開始轉向假如連中小企業都努力求生存，那政府所追求的經濟成長數據為何？因此問題進一步是台灣經濟政策的問題，以及產業發展的問題：

在政府追求經濟成長數據的背景，厭世代們面對低薪的困境，但中小企業卻同樣在全球化的競爭下掙扎求生，我們經濟成長的果實都到哪了？……如果連企業主和高階主管都看不到未來，這些攸關大多數勞工薪資的中小企業如果無法有好的發展，低薪的情況勢必會一直延續下去，厭世代們更是沒有未來。²⁴⁶

如果企業數量以及從業人數都是台灣最多的中小企業，它們所面對的是景氣下滑、轉型不利，以及利潤縮水甚至虧損的嚴峻寒冬，想提升員工薪資談何容易，更不用說幾乎位於企業中低階級的厭世代，要如何扭轉低薪困境。²⁴⁷

吳承紘提出了問題，也試圖尋找問題的解方，因而訪問了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並得出台灣沒有發展出新產業，以及「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三

²⁴³ 《厭世代》，頁 100。

²⁴⁴ 此處白皮書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16 年所發表《中小企業白皮書》。

²⁴⁵ 《厭世代》，頁 108。

²⁴⁶ 《厭世代》，頁 120。

²⁴⁷ 《厭世代》，頁 131。

角貿易」，使得台灣經濟在數據上有所成長，卻已與人民的生活處境毫無相關：

在產業升級不成功，以及之後三角貿易盛行的影響之下，台灣的 GDP 成長就像美國一樣，已經和現實的人民生活脫鉤，完全無法感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而中小企業就像是勝利印刷廠第二代張庭如所說的，完全不知道經濟成長到哪裡。²⁴⁸

王健全認為，服務業沒有轉型進行高階化，也沒有國際化，恐怕都還是在低薪中打轉。「因為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在服務業嘛，年輕人幾乎七八成都在服務業嘛，所以當然薪水都很低啊！」²⁴⁹

因此，台灣產業政策出問題下，問題其實出在政府的經濟政策：

很明顯，即使企業必須負擔一部分轉型升級的責任，但政府缺乏整體的經濟戰略，導致長達二十年的薪資停滯，這點仍是難辭其咎。²⁵⁰

吳承紘訪問了中小企業主與學者後，針對蔡英文總統在 2016 年就職典禮上將青年貧困的問題提高到國安問題，然而在 2017 年時卻不見任何政策，因此訪問關心青年貧窮問題的立法委員，得知民進黨立委吳思瑤和鍾佳濱舉辦了「青年貧窮與低薪對策公聽會」，希望公聽會能做出相關決議，並提供執政當局參考。吳承紘因此寫道：

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如果青年低薪議題能從朝野開始形成共識，並接著影響行政部門，那麼或許會有機會，至少行政機關不再迴避青年低薪議題，並開始蒐集相關的資訊進行研究，進一步影響社會正視厭世代低薪問題，而不是先入為主地扣上「草莓族」、「不爭氣」的大帽子。²⁵¹

除舉辦公聽會的立委，吳承紘也訪問關心青年創業的立委余宛如，在訪談中，藉由余宛如的回應說道：

「我們要為年輕人或下一個世代創造舞台，沒有舞台人才不會進來。很多人講低薪低薪，其實真的不是，很多是看不到未來的機會，重點是看不到未來。」余宛如認為，沒有舞台，不但本地的青年看不到未來而離開台灣，就連國外的人才，或在國外的台灣青年也無法進入台灣。²⁵²

吳承紘也訪問了在台灣與新加坡創辦協助高階人才轉職的陳治平，透過他的回應，提出

「一個社會你需要給年輕人希望，需要給年輕人舞台，你需要給他們說，只

²⁴⁸ 《厭世代》，頁 135。

²⁴⁹ 《厭世代》，頁 137。

²⁵⁰ 《厭世代》，頁 141。

²⁵¹ 《厭世代》，頁 144。

²⁵² 《厭世代》，頁 147。

要你努力，就是有。不一定是錢，但你可以做到不一樣的事，你可以過一個有價值，有貢獻的人生。」和余宛如的看法一致，陳治平認為，台灣目前最需要的就是給年輕人舞台。²⁵³

因此，《厭世代》一書從探討社會中普遍的厭世氛圍，從年輕世代低薪的工作貧窮，進而談到台灣的中小企業也深陷國際競爭的泥沼困境之中，因而反映出台灣政府在產業政策與經濟政策上的發展問題。回到年輕世代的處境，除了期待體制內立法委員的行動外，台灣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提供年輕人舞台與希望。

經歷這樣的論述發展後，回到年輕世代如何面對問題，吳承紘則提出期望世代之間能夠充分溝通，讓台灣社會能繼續前進：

誠如本書一再強調的，「厭世代」是台灣有史以來素質最好的一代，而暫時誤解他們的四五年級生，則是帶領台灣跳躍發展的一代，各有各的困境與需要面對的課題；藉由這本書、這個議題，我誠摯地希望能夠搭建起世代溝通的橋樑，讓台灣整體社會能往前進，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把青年貧窮議題，擴大為世代問題並且加以探討的原因。²⁵⁴

而面對個人，則透過訪問《厭世動物園》的作者厭世姬，提出：

對於想要和厭世姬一樣追求夢想，或是猶豫不知道該怎樣邁向下一步人生的厭世代，厭世姬建議，「去做一件薪水穩定，很無聊的工作，就把工作當工作，額外的時間再去發展你的興趣。」²⁵⁵

至於厭世是什麼？其實是一種在困境中繼續得以努力的心理建設或自我安慰：

就連社會學學者林宗弘也認為，應該要給這個世代的人一些厭世姬風格的反心靈雞湯，給厭世代們心理建設，因為未來不管是氣候變遷，還是再也無法達到6%以上的經濟成長率，甚至因為內耗而無法前進的國力，這未來的二十年絕對不好過。厭世姬說的更直接：「我覺得把話說清楚是好的，正視沒有出路這件事也許是一種出路。就是說不要一直覺得自己有出路然後就一直衝一直衝，然後到最後發現沒有，那不就很慘，倒不如一開始就講清楚，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這樣會比較好過點。」²⁵⁶

因此也點出，厭世是一種個人面對整體台灣社會發展的困境所自我保護，或是得以繼續前行的一種反心靈雞湯式的能量，取代了舊有主流論述中對於年輕人要努力、要樂觀、要創新、要勇於接受挑戰等勵志言論。

²⁵³ 《厭世代》，頁149。

²⁵⁴ 《厭世代》，頁164。

²⁵⁵ 《厭世代》，頁161。

²⁵⁶ 《厭世代》，頁163。

最後吳承紘也提出《厭世代》一書的侷限，指出《厭世代》一書並沒有辦法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只能先提出問題，但他相信唯有處理世代之間的衝突才能找到解答。²⁵⁷定調了《厭世代》一書的期望與侷限。而厭世其實也是一種讓人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得以繼續在社會困境中生存的「反勵志」的一種勵志方式、「反正能量」的一種「正向負能量」。

但是，我認為吳承紘這種「正向負能量」跟他所批評的「正能量」，其實都在提供個人如何在職場上、或困境中生存下去的鼓勵與支持，甚至由於更誠實面對社會環境的不友善，以及指出社會上的諸多問題，因此這股能支持在困境中生存下去的「正向負能量」比《遠見》那種「正能量」更有用。

這讓我不禁想到本研究緒論中參考的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提出無產階級遭遇的社會問題後，認為這些生活困境正是無產階級自身成為推動社會問題變革的主體。當然恩格斯的所處的環境與對社會變革的想像，與當代距離遙遠，但重點在於恩格斯認為人在困境中所能發展的改變社會的想像。而在吳承紘《厭世代》書中，則是其實還是得想辦法生存下去，因而擁抱接受「正向負能量」。

258

第三節、從《崩世代》到《厭世代》

《崩世代》出版於 2011 年，《厭世代》出版於 2017 年，從 2011 年到 2017 年，兩本書分別用「崩」與「厭」形容一個世代。然而兩本專書各自有其書寫的脈絡，與書寫呈現的方式，以及所欲呈現的內容。但就再現世代貧困問題而言，本論文認為兩本書之間具有延續關係，也可視為互相補充，形成一個完整的世代貧困論述。

但同時，由於兩書原本寫作的策略與取向各有不同，因此當兩本書有所延續又互相補充時，越也對照出差異之處。因此本節將藉由《崩世代》與《厭世代》兩本書，探討兩本書再現了什麼青年貧窮問題，有什麼異同之處可供參考？又這些異同背後具有什麼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內容。

一、《崩世代》到《厭世代》的書寫

《崩世代》一書出版於 2011 年年底，原先是針對 2012 年第十三任總統大選所寫的政策白皮書，但在後來的編輯會議中更改編輯方針，改為面向一般大眾，但其從政策面切入的視角仍然清楚可見。因此可從書中內容看出《崩世代》一書

²⁵⁷ 詳見《厭世代》第 16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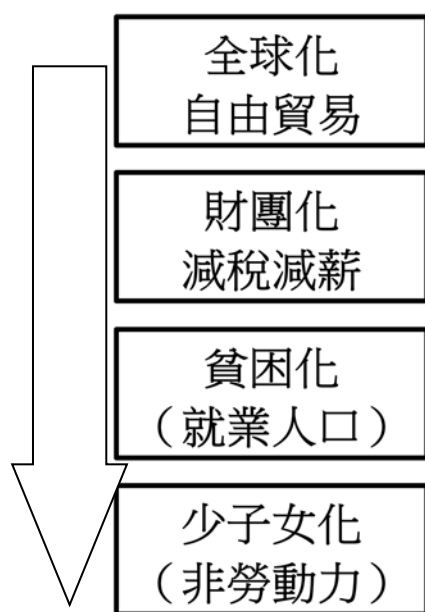
²⁵⁸ 有關恩格斯這部份的討論，請參考本論文第 19 頁。

從新自由主義在台灣發展的困境開始談起，而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的政策，造成失業率問題、貧富差距，甚至對財團減稅造持公債惡化的問題。

《崩世代》進一步以「財團化」提出不論藍綠政權都以新自由主義思維主導經濟發展，爬梳從 1990 年代以來至今的各種減稅政策優惠財團、吸引外資，相信經濟發展會帶來雨露均霑，促進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然而一系列的施政卻導致經濟在數字上成長，卻造成貧富差距與失業率問題。

而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問題，進而導致工作貧窮問題。在同樣以新自由主義主導下，不論是低薪政策、彈性勞動、非典型聘僱等，造就政府解決失業率問題，卻也同時造就工作貧窮問題。低薪、工作不穩定、經濟不景氣，嚴重影響台灣民眾的生計，也因此薪水不足，又欠缺公共照顧體系下，少子女化問題在台灣成為總統都提出視為國安層次的重要課題。

可以說《崩世代》一書，從宏觀層面逐漸由上而下談論，因此以圖像化來看的話，所呈現的內容如下：²⁵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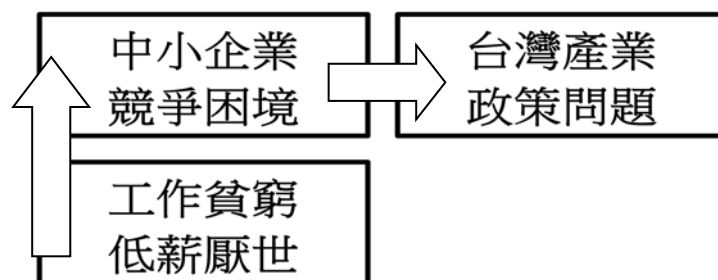


有別於《崩世代》從政策層面切入書寫，從台灣過去政治經濟發展的軌跡，提出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並提出福利國家變革的政策白皮書，《厭世代》則明確表明探討世代衝突，講述年輕世代因低薪而窮忙，而看不到希望的問題，以厭世作為自嘲或對抗的方式，雖是厭世卻有負負得正的效果，作者吳承紘並希望透過這樣的書寫，把年輕世代的處境呈現出來，促進不同世代之間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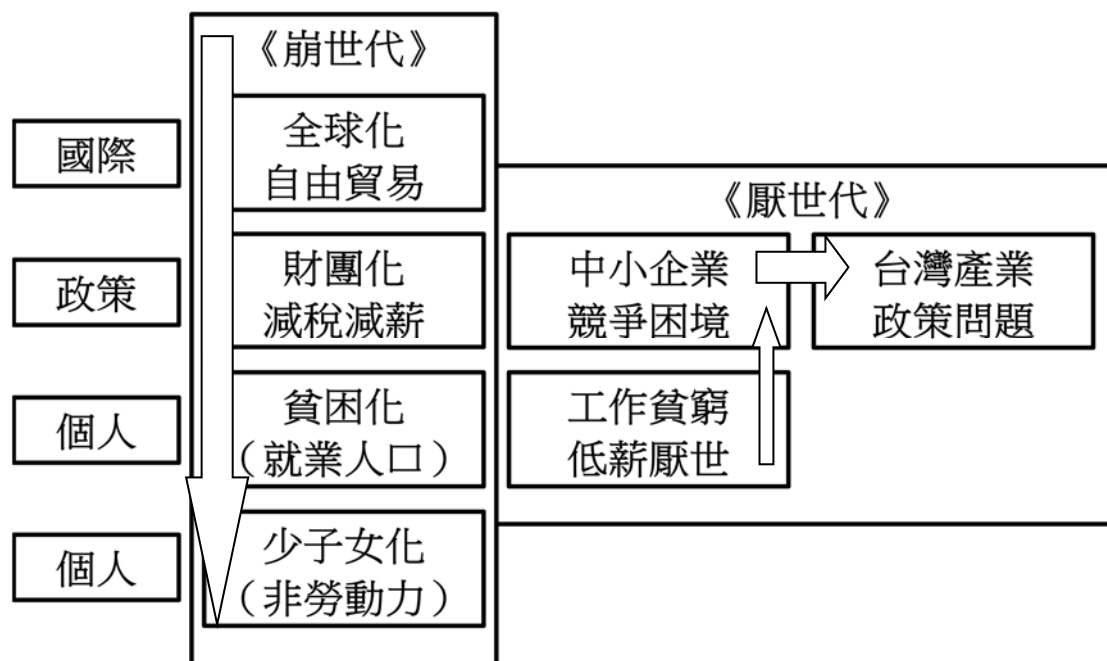
因此，《厭世代》切入的角度則從個人經驗出發，從工作貧窮的真實樣貌，進而談到學用落差、文憑貶值、窮忙、失去希望……等等，進一步台灣廣大中小

²⁵⁹ 請見《崩世代》頁 42。

企業為何給不了高薪，卻也發現中小企業面臨經營困難而自身難保，最後則發現台灣的產業政策有問題。可說《厭世代》是由下而上呈現整個問題，以圖像化來看的話，則如下：



若把《崩世代》到《厭世代》的內容整理成圖一起呈現，可見如下：



從上圖來看，《崩世代》從新自由主義下，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逐漸談到政策問題，並到與個人息息相關的低薪問題；《厭世代》則是從年輕人的厭世處境探討工作貧窮的問題，進而向上談到中小企業的困境，進而提到台灣產業的政策問題。可說《崩世代》由上而下將宏觀的問題談到個人，而《厭世代》則是由下而上，從個人的處境向上談到中小企業的發展，進而論及產業政策。

而在敘事上，《崩世代》在談論工作貧窮的問題時，比較著重據理分析，雖然「採訪了許多落入工作貧窮困境的年輕人」，²⁶⁰但在書中只呈現一個案作為開場。《厭世代》則採訪了五位，並且藉由訪談內容呈現生活上的低薪處境，鮮明且貼入生活感的内容，補足了《崩世代》較為生硬的分析内容。因此《崩世代》

²⁶⁰ 《崩世代》，頁 124。

由上而下系統的分析了政策問題，《厭世代》由個人遭遇的困境由下而上提出產業政策的問題。

而在內容方面，《崩世代》在 2011 年所提的諸多問題，包括從 1990 年起的工廠外移、工作變少、失業率提高，到 2000 年開始突出的新貧問題，到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22K 政策的工作貧窮問題，進而影響到少子女化的層面。到了 2017 年的《厭世代》，更加突顯年輕人的工作貧窮問題，青年貧窮更以厭世取代勵志論調，看清未來沒有展望後，厭世成為得以在社會困境中繼續努力的負負得正。

因此，若《崩世代》是提出各種政策問題，而這些政策問題會影響並造成低薪、工作貧窮，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進而造成世代問題。那《厭世代》一書則是以各種數據與訪談提出 80 後、90 後的處境與現象，透過這些個案訪談的內容，爬梳年輕世代看不到未來的原因，藉此搭起不同世代之間的橋樑，解決世代之間的衝突。因而《崩世代》到《厭世代》之間是延續關係，也是互相補充，共同完善青年貧窮的論述。

二、世代界定的轉變

在第二章探討《遠見》雜誌中的青年貧窮再現時，我曾提到《遠見》在 2008 年時主要聚焦六年級生後段班去探討，並逐漸往 80 後、90 後發展，但大抵以 35 歲作為界線。而《崩世代》到《厭世代》橫跨六年，兩書分別從不同角度切入完善世代貧困的論述，儘管突顯出差異之處，但也體現跟《遠見》類似之處。

在《崩世代》中所談論青年貧窮的工作貧窮處境時，所聚焦談論的年齡層還包含六年級生與七年級生，書中寫道：

在編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們採訪了許多落入工作貧窮困境的年輕人，以了解他們的生命歷程，我們發現所謂的「六年級生」薪資偏低無力創業，「七年級生」在就業市場上找不到穩定的工作，也看不到自己的未來。²⁶¹

而《厭世代》的作者吳承紘身為六年級生，所談論的世代對象卻已聚焦在 1990 年前後出生的年齡層，即七年級生與八年級生。從《崩世代》到《厭世代》兩書之間相隔六年，卻出現一個年級世代的轉變，並將年齡層往後推移。甚至吳承紘在書中自己說道：

在撰寫專題之前，「青年貧窮」、「青年低薪」對身為六年級前半段的我來說，只是幾個常常看到的字眼，就像我的四五年級前輩一樣，無法真實地感受到年輕人的困境，直到我開始進行採訪後。²⁶²

²⁶¹ 《崩世代》，頁 124。

²⁶² 《崩世代》，頁 164。

以《崩世代》一書出版的 2011 年來看，被界定為六年級生的人是從 1970 年到 1979 年出生的一代，2011 年時這一輩的年齡為 32 歲到 41 歲之間。而七年級生的人是從 1980 年到 1989 年出生，在 2011 年時這一輩為 22 歲到 31 歲之間。

若以《厭世代》一書出版的 2017 來看，則被界定為六年級生的人，在 2017 年時年齡為 38 歲到 47 歲之間；而七年級生的人，則為 28 歲到 37 歲之間；而厭世代中開始出現的八年級生，則年齡為 18 歲到 27 歲之間。

如果將年份與時間點整理成表，以及兩本書中提及的一些重要時間，呈現如下：

	出生 年份	大學畢業 出社會年份	重大事件	社會 困境
70 後 六年級生	1978	2000	第十任總統大選：扁政府首次政黨輪替、網路經濟泡沫化	新貧
	1979	2001	網路經濟泡沫化	
80 後 七年級生	1980	2002	兩兆雙星、加入 WTO	
	1981	2003		
	1982	2004	第十一任總統大選：扁政府連任	新貧 工作貧窮
	1983	2005	雙卡風暴、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成立	
	1984	2006	雙卡風暴、悶世代	
	1985	2007		工作貧窮 青年貧窮
	1986	2008	第十二任總統大選：馬政府二次政黨輪替、全球金融海嘯	
	1987	2009	全球金融海嘯、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成立〈面對青年貧窮化宣言〉	
90 後 八年級生	1988	2010	五都大選、簽訂 ECFA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1989	2011	佔領華爾街、《崩世代》出版	青年貧窮
	1990	2012	第十三任總統大選：馬英九連任	
	1991	2013		
	1992	2014	太陽花運動	
	1993	2015		
	1994	2016	第十四任總統大選：蔡政府三次政黨輪替	厭世代
	1995	2017	《厭世代》	
	1996	2018		

從上表的整理可以體現兩個切入點，第一個為從台灣經濟狀況與相對應的工作貧窮狀態發展，第二個則是從年齡層的區段來看。從台灣經濟發展狀況造成青年貧窮的發展脈絡來看，從 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化後，新貧的概念開始被提出，工作貧窮的問題開始被談論，到了 2009 年的「22K」政策，工作貧窮的問題更開始聚焦在青年貧窮。

因而以台灣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所謂青年貧窮的青年，正是成長在這一波局勢中的年輕人，而六年級生後段班就曾經歷 2000 年後的新貧困境，以 1978 年出生的大學畢業來說，初入社會的 2000 年往後十年，正是新貧、工作貧窮在社會上發展的階段。而 1990 年以後出生的八年級生，最早 1990 年出生的以大學畢業出社會來看，也是 2012 年時，因此這也是《崩世代》一書中所提為六年級和七年級生，而六年級生有著「薪資偏低無力創業」的問題。

以 2000 年以後，尤其 2008 年以降的台灣經濟發展狀況來看，青年貧窮從青年就業的狀態，以及對未來看不到希望，反映了台灣經濟的發展狀況，因而呈現出產業政策的問題，尤其《崩世代》中所提的更是宏觀的挑戰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問題。

而假若從年齡層來看，則隱隱呈現出貧窮動態研究中，所提出不同時期進入貧窮或脫離貧窮的動態過程，個人的貧窮地位流動有可能因個人能力來改變，並非完全被社會結構所限定，認為憑藉個人的機運與努力，還是有脫貧並向上流動的機會。²⁶³即當年《崩世代》書中所提的六年級世代，已不再屬於青年貧窮的範疇，隨著年齡的更迭，到了就業市場中的某一位置，則逐漸脫離所謂工作貧窮的處境。

假若如此，青年貧窮反映的將是初入社會年輕人的處境。《厭世代》更著重強調年輕世代因低薪、工作貧窮而對未來感到沒有希望，並以厭世作為一種應對的處境，書中雖然提到買房，但未提及有關少子化的課題。但同時也反映出若跟過往台灣大學畢業生社會後的行情相比，眼前不僅學歷貶值、學用落差，更是讓大學畢業生淪落低薪處境。

儘管從《崩世代》到《厭世代》之間，如前述所說，對照來看不僅延續更完善了青年貧窮的處境，但也確實體現出隨著時間發展，探討的年齡層有所變更，曾經也經歷工作貧窮困境的六年級生，已不再屬於青年貧窮討論的範圍內，青年貧窮也真只將問題限定在青年。進而反映出青年貧窮探討的是 2000 年以後台灣產業發展的挑戰，以及跟過去相比，現在出社會的大學新鮮人反映了就業市場的供需問題。

由於青年貧窮的課題是近十幾年來發展而成，從《崩世代》到《厭世代》之

²⁶³ 呂朝賢（2007）。貧窮動態及其成因－從生命週期到生命歷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14。167-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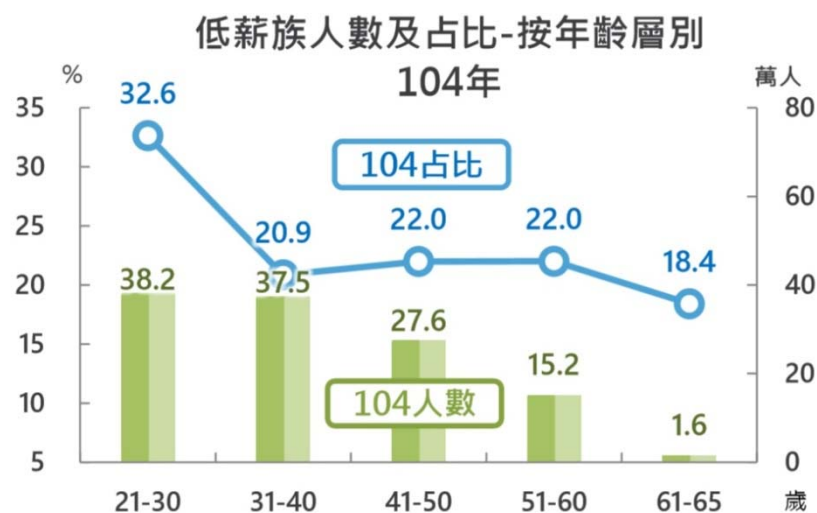
間，看到世代年齡的變化，不論是從台灣經濟狀況與相對應的工作貧窮問題的發展，或從年齡層的區段來看，最後都反映出青年貧窮體現許層面上的政策問題，舉凡高教、低薪、就業市場、產業發展……等等。

如果青年貧窮反映的是多重政策的問題，那這些繁複的政策問題難道只會影響到年輕一輩嗎？六年級生不論前段班、後段班，到了一定年齡後，就免除青年貧窮的處境？還是因為以非青年，而要被歸類為中年貧窮呢？

由財政部統計處於 2017 年 8 月發佈的〈由財稅大數據探討臺灣近年薪資樣貌〉報告中，以 2015 年的薪資統計數據，從各種不同角度談探討薪資問題，並根據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²⁶⁴提出以薪資低於中位數三分之二屬於低薪作為標準，提出台灣低薪族門檻約落在 2.2 到 2.3 萬元之間，若以年齡區段來看，報告如下：

而因薪資中位數隨年齡而逐步提高，故低薪族占比呈反向遞減，以 104 年為例，以 21 歲至 30 歲年齡組之低薪族占比達 3 成 3 最高，大致符合外界對青貧族之社會印象；而其他年齡層低薪族占比約在 2 成左右，且不因年齡增加而有大幅下降，61 歲至 65 歲年齡組當中仍有 1 成 8 屬於低薪族。整體而言，低薪族人數以 21-40 歲年齡組合計 76 萬人，占總人數之 6 成最多。²⁶⁵

圖表則呈現如下：



圖表引用自《由財稅大數據探討臺灣近年薪資樣貌》，頁 28

從其報告與圖表來看，可明顯看到 21 歲到 30 歲之間的低薪人數非常顯著，31 歲到 40 歲的低薪人數則明顯下降，但 21 歲到 40 歲兩個區間的低薪人數相加占總人數的 6 成。青年貧窮的處境確實明顯，低薪人數占比達三成之多，但後續

²⁶⁴ 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²⁶⁵ 財政部統計處（2017）。《由財稅大數據探討臺灣近年薪資樣貌》。頁 27。

的人物占比也達兩成。如果說青年貧窮的處境是特別突出的問題，那背後更反應台灣整體環境的氛圍。

尤其當 31 歲到 40 歲的區間多達 37.5 萬人，卻也有兩成的占比，更不用說 41 歲到 50 歲、51 歲到 60 歲的區間中，人數不僅減少，但占比卻仍然有兩成，甚至比 31 歲到 40 歲的區間多塊一成左右。這反映的是到了 41 歲以後，還需要工作且領低薪的人占其年齡區間人數比例的兩成，等於每五人就有一人處於低薪處境，這跟 21 歲到 30 歲初入社會領取低薪的處境相比，實在不惶多讓。

因此，從《崩世代》到《厭世代》，雖然共同體現整個台灣的困境，但也在對照下，突顯出年齡層的轉變，因而說是青年貧窮，更不如說青年貧窮的處境是反映台灣當前困境的最佳切入點。

三、不同世代之間是否衝突

《崩世代》一書的書名來自臉書上群眾投票，因而命名為《崩世代》，但林宗弘也在後來表示取名為《崩世代》所帶來的困擾：

比如說，許多讀者曾經問我們：《崩世代》究竟是哪個世代？由於本書一開始並不是一本討論世代衝突（比如四年級或七年級）的書，對哪個世代會最慘，我們並沒有完整的看法，倒是日本 NHK 所製作的紀錄片調查書籍《搶救 35 歲》引發世代焦慮的風潮。²⁶⁶

但在 2014 年爆發太陽花運動時，《財訊雙週刊》第 447 期裡〈崩世代大進擊——透視學運背後的青貧現象〉一文中，就提出《崩世代》對太陽花運動的影響，認為「這次學運的不少論述，看得出來部分受此書的影響，例如對自由化全球化的質疑。」²⁶⁷而文章訪問林宗弘時，他也補充說道「得到好處的是那些掌權的四年級生，但他們對經濟藍圖的想像，跟現在網路世代的七年級生並不一樣。」²⁶⁸

由上述可見儘管《崩世代》剛出來時，並非主打世代衝突，然而書中所提工作貧窮的問題，以及進一步所影響的少子女化問題，都是形成青年貧窮的重要部分，尤其許多年輕人投入太陽花運動，抒發年輕世代不滿的一面，引起社會全面的討論。《崩世代》可說原本無心，但書中內容成為青年貧窮與世代衝突的論述來源之一。

事實上從《崩世代》的序言安排，可明顯感受到「崩世代」所指的是一個崩壞的世代，影響的是這個世代中的每個年齡層，因此在序言中，就邀請七年級生、六年級生、四年級生，分別從各自的角度寫序來介紹與談論「崩世代」。這體現林宗弘作為主筆之一所說，《崩世代》原本並沒有要處理世代衝突。

²⁶⁶ 林宗弘（2012）。〈《崩世代》：一本意外暢銷的社會學書籍〉。臺灣社會學會通訊，76。頁 34。

²⁶⁷ 《財訊雙週刊》第 447 期，〈崩世代大進擊——透視學運背後的青貧現象〉。

²⁶⁸ 同上。

相較《崩世代》，《厭世代》所提的世代，就明顯指年輕世代，因此《厭世代》也強調探討書中就是要探討世代衝突，並希望搭起對話的橋樑，即七年級生、八年級生與四年級生、五年級生，甚至六年級生之間的世代衝突。因此《厭世代》所談的世代比較聚焦在七年級、八年級生的年輕世代，而非《崩世代》所謂的一個世代。

因此像《厭世代》中，就有不同世代（年齡層）之間差異的書寫，例如：

如果以五、六年級，甚至四年級的觀點來看，林秋容所面對的要求並算是嚴苛。但是，從高中到研究所靠著半工半讀，背負學貸才完成學業的她，並不是無法承受壓力的人，也就是所謂的「草莓族」。因此，林秋容對於職場的觀察與理解，可說是厭世代和上個世代最明顯的差別。²⁶⁹

或是在探討房價，以及買不起房所帶來世代之間的差異時：

……我不禁想起自己的父母當年是如何乘在經濟起飛的浪頭上，靠著勞力把三個小孩扶養長大，還買了房子，過著所謂「中產階級」的穩定生活。而黃瑋隆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不知道高出他們多少倍，年紀輕輕卻已經被房價所擊潰。²⁷⁰

或因為，成長與環境的差異，面對工作與生活的態度，也不一樣，因而出現世代之間價值觀上的差異，導致的爭端：

不再以工作為第一優先，是厭世代與上一個世代最大的差別。他們想要追夢，想要慢慢奠定自己生活的品質，不再以犧牲自己的時間與健康換來報酬，特別是在普遍低薪的環境。但這樣的心態往往會被上一代解讀為「不努力」、「不切實際」或「不求上進」等負面評價，然而上一代批判的同時，卻往往忽略每個世代之間成長環境與價值觀的轉變，因此流為世代之間的爭端。如近幾年來的流行用語「小確幸」，就傳神地表達了厭世代以小確幸堆積向前走的能量，或是在低薪與高房價的環境乾脆放棄儲蓄，以消費獲得片刻愉悅的心態。但上一代的長輩，卻往往把小確幸打為年輕人墮落或不求上進的象徵。

²⁷¹

然而《厭世代》一書的編輯安排，也試圖消解世代衝突。例如當《厭世代》探究為何中小企業只給低薪時，也就看出到中小企業主的處境。吳承紘先是書寫出世代衝突之間的張力：

企業不時出現「缺工」、「台灣無人才」等言論，往往激化厭世代與企業之間的對立，卻無助於解決低薪問題。……低薪已經成為厭世代日常，並且讓台

²⁶⁹ 《厭世代》，頁 47。

²⁷⁰ 《厭世代》，頁 72。

²⁷¹ 《厭世代》，頁 80。

灣脆弱的勞資關係益形緊繃，甚至造成世代對立。其中最常被提出來批判，且成為常用語的「慣老闆」……慣老闆一詞已經成為一種貶抑詞，一種社會現象。²⁷²

吳承紘緊接著舉了受訪者的例子，呈現慣老闆給低薪還理所當然的樣貌，但也接著丟出問題：「聘僱台灣多數勞工的一百三十八萬家中小企業，沒有理由全部都是慣老闆。」²⁷³並接著訪問中小企業主，從受訪者生意越來越難做的困境中，體現該章節標題所說的「中小企業經營者也厭世的事實」，進而帶出台灣產業發展的困境，過往的「亞洲四小龍」、「黑手變頭家」的榮景消逝，「一九九〇年代前後出生的厭世代一投入職場，面對的就是已然褪色的經濟，以及薪資停滯的困境」²⁷⁴

因此，給出低薪造成工作貧窮的中小企業主，其實也身陷產業發展的困境中。反映出台灣中小企業過往「二十年來仰賴廉價的勞力以換取代工與生存的結果，換來的是越來越低的純益，和不斷壓縮的經營空間」²⁷⁵的經營問題。面對製造業的處境，吳承紘也訪問了服務業中飯店業的高階主管，更是提到景氣反應在薪資，因此當前經濟不景氣，儘管「薪資沒有刻意降低，但幾乎不動的薪資等於是減薪。」²⁷⁶受訪者甚至認為低薪問題不只存在青年：

我覺得這個不能叫青年低薪，是整體薪資偏低。我所謂的整體薪資偏低，意思就是說，即使到了三十五到四十歲，你不算是青年了，你可能掛主任、副理或是經理這樣的職位，但是薪資也就這樣子而已。他的薪資都這樣子了，青年的薪水怎麼可能往上爬？所以這是整個薪資結構的問題。²⁷⁷

當因為低薪而工作貧窮的厭世代問題，藉由向上挖掘問題根源時，就越加體現整體環境與產業發展問題，世代之間的衝突，背後卻也是整個政策下的問題。因而世代之間的衝突也就消解了，而這也是吳承紘期望透過此書能做到世代溝通的地方。因此《厭世代》看似有世代衝突，世代之間又一同深受經濟發展的困境之中。

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崩世代》明明沒有要處理世代衝突，那為何又可以成為世代衝突的論述依據呢？最主要《崩世代》一書，從環環相扣的政策面切入，從新自由主義主導經濟政策發展的困境，進而在產業政策出現問題下，導致工作貧窮的問題，而工作貧窮的問題對年輕人的影響又尤其嚴重，進而不僅影響少子女化，也影響到方方面面，例如與少子女化同步發生的，即高齡化社會，因此原本能正常運作的退休金給付，也都將會出現問題：

²⁷² 《厭世代》，頁 96。

²⁷³ 《厭世代》，頁 98。

²⁷⁴ 《厭世代》，頁 100。

²⁷⁵ 《厭世代》，頁 110。

²⁷⁶ 《厭世代》，頁 114。

²⁷⁷ 《厭世代》，頁 115。

偏偏高齡化時代的政府，要支付一大群老人的退休金。行政院主計處二〇一〇年的資料顯示，台灣政府的潛藏負債約為十三兆八千億元，其中近十二兆的負債就是來自於軍公教的退休金與勞工保險。²⁷⁸

因此《崩世代》一書雖不強調世代衝突，但出問題的政策，影響的不會只是某一年齡層的群體，而會影響到不同年齡層的人，而當不同年齡層都遭受影響時，就可能出現世代之間的衝突：

少子女高齡化的「格局」一旦形成，就埋下了世代衝突的種子。老年人當然希望早點退休，年金「落袋為安」；但試想二〇六〇年青年人的經濟負擔吃力程度，他們會認定所有的社會保險都是不公平的遊戲，自己繳的保費，都變成老年人的給付，三、四十年後自己卻恐怕要血本無歸。然而，老年人人數眾多有選票，當然希望各種老年福利不斷加碼；於是青年人寧可移民、逃稅、逃避社會保險，想辦法自己救濟。這又更加速社會安全體系的崩壞……。

279

因此，在《崩世代》一書中，雖不突顯世代衝突，但在系統的探討政策問題所影響的方方面面時，卻也突顯出對不同世代之間造成的影響。我認為這邊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崩世代》在這裡所談的「世代」有雙重含義，一個是不同年齡層共處的世代，即這個即將「崩壞的世代」；另一個在同個時間裡不同年齡層的群體世代，即「年輕世代」或「老年世代」。

但不論是哪種涵義的世代，都共同組成世代問題，即世代問題本身具有重雙涵義的問題，因此：

……層出不窮的老年悲劇，也許要成為台灣社會的現實光景。而現在的六、七年級生，恐怕就是第一批要面對現實的悲劇世代。²⁸⁰

因此儘管《崩世代》一書不強調世代衝突，但有問題的政策影響了不同年齡群體，卻有可能激化不同年齡層的群體間的衝突。因此在呈現青年貧窮的問題時，《崩世代》並不專注探討世代衝突，卻無形提出更深刻的世代衝突的問題，《厭世代》有心談論世代衝突，最後卻也呈現是台灣整體的困境。實際上就反映出，有問題的政策影響到的不會只是某一年齡層的群體，而是互相影響。

²⁷⁸ 《崩世代》，頁 170。

²⁷⁹ 《崩世代》，頁 171。

²⁸⁰ 《崩世代》，頁 174。

第四節、世代貧困中的社會問題與個人問題

在前面章節中，本論文提出《崩世代》與《厭世代》從不同切入點、不同角度、不同論述方式，在橫跨六年後，呈現整體青年貧窮的處境與樣貌，更體現青年貧窮從工作貧窮到厭世的變化。但也透過對照，得出當前談論青年貧窮時，已出現年齡層的轉變，突顯出青年貧窮反映的不只是年輕世代的困境，而是台灣社會整體發展的困境。而在世代是否衝突中，更呈現不論是《厭世代》從年輕世代厭世的狀態出發、或《崩世代》從政策角度出發，最後都呈現出台灣產業與相關政策需要改革的問題，且影響到不同年齡群體，且各自有其要面對的困境。

下就進一步探討從《崩世代》到《厭世代》中所再現的青年貧窮論述有什麼侷限性，或反映出什麼問題？

一、青年貧窮其實是世代之間價值觀的對照與差異

從《崩世代》到《厭世代》，遭遇青年貧窮處境的世代逐漸向後推移，六年級生逐漸不再出現，而七年級生、八年級生逐漸成為青年貧窮的群體。假若脫離青年之後能擺脫工作貧窮處境，那也正好反映青年貧窮的情況，但實際上 31 歲以後的低薪人數，甚至 41 歲以後的低薪人數，也維持占該區間人數的兩成。青年貧窮的問題隨著時間發展，將發展成中年貧窮，不同年齡層面對共同的問題，已逐漸成為趨勢。

而在世代衝突的書寫與呈現部份，體現出不論是年輕一輩或老一輩，都一同遭遇經濟發展的困境之中，只是所屬年齡層不一樣，位置不一樣，遇到的問題就會有所不同，而有問題的政策也不會只影響到某一年齡層的群體，而是相互影響。既然如此，那為何還是存有還存有世代衝突，或還是要提青年貧窮呢？

從《崩世代》到《厭世代》這些談論青年貧窮的專書，都將各個現象指向台灣當前經濟發展或政策改革的困境，不論是產業問題、創業問題、低薪問題、學非所用問題、少子化問題……等等。過往台灣經濟奇蹟的經驗，給了當前世代一個對照與比較，然而這也不僅僅只是比較世代之間的生活、工作、薪資等差異，也是台灣正在現實面對經濟發展的比較問題。

過往在冷戰局勢，台灣納入美日反共第一島鏈下，早早加入全球化下，以美日主導的亞洲垂直分工經濟體系，透過以廉價勞動力與密集加工出口，成為世界加工廠，將台灣社會從農村轉型成工業化社會，這段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迎來台灣昔日經濟發展的輝煌，也帶來台灣社會的物質消費生活。

台灣自身經濟發展問題，早以與全球經濟鑲嵌，難以置身事外，尤其夾雜在大國博弈下的國際紛爭，讓台灣一面依附在過往美日經濟的經濟體系，另邊又得

以依靠將資本外移中國大陸，維持經濟發展，卻也因為自身產業發展問題，造成「台灣接單、大陸生產」，進而影響台灣服務業逐漸超越製造業，並引發後續產業政策、教育政策、薪資等連串問題。

當這些宏觀的政策面問題，具體反映在一般大眾的處境上時，深刻影響到的即是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即低薪問題影響著收入、生活費、買房、成家立業、生小孩等等，也因而造成世代之間的差異與比較，例如《厭世代》裡不時提出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條件與厭世代的條件之差異，突顯出世代衝突之間，其實隱含著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想像意涵，因為有對照因而有比較，有了比較因而突顯困境。

我在第二章分析《遠見》雜誌中的青年貧窮再現時，已深刻體現出，過往的經驗不斷被提出，往日輝煌不復存在，但過往累積下來的成功經驗、打拚經驗、勵志故事，以及各種對成功的定義與想像，都是至今仍然作為台灣經濟政策發展的方案。而《崩世代》、《厭世代》正是回應這種回首過往經濟榮景的思維，突顯面對當前台灣的困局，從前的成功經驗與思維難以再複製。因此，《厭世代》呈現出年輕世代以厭世作為反撲，《崩世代》則提出以福利國家作為新的思考與方案。

因而世代衝突其實不是不同年齡層之間的衝突，而是透過對照，反映出對過去的緬懷，以過往社會環境充滿希望、充滿舞台作為參照，體現今日的每況愈下，過去曾經有過的美好光景，突顯出當前的往日不在。世代衝突也體現對未來變革的方案差異，從《遠見》雜誌到專書，體現出《遠見》雜誌相信的還是發展經濟，不論是政策發展上，還是個人努力上，過去台灣有過的成功經驗，仍作為面對當前困境的思維。《厭世代》、《崩世代》則提出反駁，以及提出不同的看法與見解。

在《厭世代》中，就透過訪問年輕立委與人資專家，提出台灣沒有給年輕人希望，也沒有給年輕人舞台，提出跟《遠見》雜誌相似的內容。只是《厭世代》的提法與《遠見》雜誌不一樣的地方在於，《遠見》雜誌認為眼前就算遭遇這些發展困境，但還是有希望，面對這些充滿困境與挑戰的地方就是舞台，這時再搭配成功經驗，就變得更有說服力。而《厭世代》中則對政策充滿失望與不滿，因而認為沒有希望、也沒有舞台，有賴政策的變革以提供年輕人希望和舞台。

因此，青年貧窮中所再現的世代衝突，實際上不是衝突，而是對照，是過往台灣經濟的發展與當前經濟困境的對照；是過往台灣的成功經驗與當前成功經驗不具成效而讓人厭世的對照。就這點上，《厭世代》其實與《遠見》雜誌都再現出一樣的內容，即世代衝突其實衝突的不是世代本身，而是對過往經驗的看法，與對未來該怎麼辦的想像。

也因此，青年貧窮既不只談青年，也不只談貧窮，而更多的是參照過往後，對未來存有怎樣希望的問題。即是說青年貧窮體現了困境，但不存在世代衝突，青年貧窮是以青年作為主體呈現台灣發展的困境，體現過去台灣經濟發展經驗的

失敗，以及未來要另尋出路。

二、仰賴政策解決的青年貧窮問題

青年貧窮的問題之所以真切，原因在體現了普遍人有感的問題，但充滿虛幻的感觸也在於青年貧窮所提的問題不僅僅只在於青年，也不僅僅是談貧窮。因而導致青年貧窮的課題好像說出了問題，卻也僅僅只是說出問題。這邊並非意指提出問題後一定要提出解決方案，而是提出了怎麼樣的問題？

從前述論點可以看到從《崩世代》到《厭世代》之間，從不同角度與談法，都不約而同寫出整個青年貧窮的問題是世代貧困的問題，但世代貧困的問題其實是政策發展的問題，即是說青年貧窮談的並非是年輕人的問題，而更多的是政策問題。

因此不論是《崩世代》由上而下的論證，或《厭世代》從訪談中的個人處境由下而上的論說，最終都體現不良的政策對個人的影響。個人的問題在這些書寫中，最後都突出政策的問題，當政策問題被提出後，卻也開始與個人之間產生距離。一個政策的制定與變革，影響到個人的境遇與生活，但變革的希望越只能投向統治者或政治人物。個人在政策問題被提出後就開始消失了。

我並非要指出個人在政策問題中扮演什麼重要角色，而是要指出從《崩世代》到《厭世代》所呈現有關青年貧窮的論述中，青年貧窮問題不管從什麼角度切入，最後談出的都是政策問題，而當問題出在政策時，就開始非個人能所撼動或立即改變。但有問題的政策或社會制度仍然在每天以各種不同方式影響著個人，這種社會與個人脫鉤的狀況，正是青年貧窮課題在論述中最明顯的問題。

為什麼這是問題呢？因為當年輕的個人明明處在這種世代發展的困境之中，但透過層層分析與闡述後，最後青年貧窮的困境提出的都是政策問題，個人只能被動的等待執政黨來改善環境與政策，然而自身在困境中的處境如何被解決？就又回到了個人。

因此，當《遠見》雜誌仍然相信經濟發展下後的雨露均霑，以創業、逆境是年輕人的舞台，而面對這麼艱鉅的挑戰，要能勇於創新，且樂觀不畏困難的接受挑戰，更要找回上一代吃苦耐勞的台灣打拚精神。而這類勵志且鼓勵個人面對困境的論述多而造成疲乏，又因為難以真的改善現實困境而遭受質疑反撲時，並沒有出現我們應該更積極投入政策變革的論述。反而是厭世作為一種對抗的方式出現，並以負負得正取代過往的勵志論調，成為新的、負面的，卻反而是能繼續應對社會困境的正能量。然而，這些政策宏觀面的問題，仍然交付給統治者、政黨、政治人物來處境。

透過這些文本的分析與探討，當個人的問題談論的越抽象時，越提出需要從政策面來處理，然而個人面對宏觀的社會問題、政策問題，顯得蒼白無力，怎麼

想都只能自己想辦法自求多福。面對如何自求多福，以前社會上的論調給予的是正能量的勵志論述，當正能量的勵志論述失效時，厭世的負負得正能量馬上遞補上來，讓人得以繼續在難以撼動的政策中苟且過活。

從這邊就體現出不論正能量、厭世負能量，任何緩解讓個人能更面對困境的論述，都進入了市場成為商品，在政策與個人之間，提出一套個人得以面對社會困境的方案。不論是充滿正能量的樂觀以對，或負負得正的以厭世追求另外一種對「成功」的想像。而這些再現青年貧窮的論述，也進而成為市場中的商品，在呈現青年貧窮的處境時，也同時兜售了面對青年貧窮困境的方案。

這邊有趣的是，明明這些書籍已經藉由各種分析，試圖將個人的境遇與有問題的政策連結起來，最後卻產生政策歸政策、個人歸個人。但實際上我們可以從《崩世代》一書中的些許篇幅，看到一種可能性，即個人如何關心政策的行動方案。《崩世代》一書提出監督、發起討論，捲動更多人關注議題，進而產生影響力。

以現實來看，《崩世代》到後來太陽花運動的爆發，確實體現了這股力量的可能性。但從 2017 年的《厭世代》又體現出，一種更深的無力感，尤其在經歷由許多年輕人參與重大變革的太陽花運動後，政策與環境仍然深深難以撼動，也不難怪為何絕望帶來的厭世感會逐漸成為顯學。

我在緒論中，指出狄更斯與恩格斯之間書寫的差異，提出兩人最大的不同，在於個人跟社會這大環境如何產生連結，並讓社會變得更好的想像。狄更斯重視個人在社會中是否善盡其該負起的社會責任，並認為統治者該積極處理社會弊病、有錢人該負起改善社會問題的道德良知。恩格斯則認為受苦難而造成道德敗壞的無產階級是改變社會政治經濟困境的主體，透過生產中的關係，銜接政治經濟與個人之間的緊密連結。²⁸¹

因此，我認為以青年貧窮議題而言，從《遠見》雜誌為代表的主流財經雜誌到試圖提出另種論調的專書，都從個人處境到政策問題探討青年貧窮的問題，但在問題提出後，政策的問題就期望統治者來處理，個人層面則用勵志言論來鼓勵樂觀面對、或是厭世負負得正尋求意義。政策與個人之間在提出問題時，也失去了個人與政策之間的連結關係。

失去了個人與政策之間的連結關係，一來將政策變革的期望交付給某個政黨、政治人物，二來使得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可能性變低，更多討論在個人如何在這個充滿困境的社會中找到繼續生存的動力或方法。因此綜合上述，我認為從《遠見》雜誌到《崩世代》、《厭世代》的青年貧窮再現論述中，儘管點出了問題，卻也僅僅提出問題，並造成一種去政治的論述。

²⁸¹ 請參考本論文第 20 頁。

三、世代衝突遮掩掉的社會問題

在本章節中，可以看到從《崩世代》到《厭世代》之間存在著世代界定的轉變，以及《崩世代》原本不談世代衝突，卻在社會環境下，成為強調世代衝突的論述根據，而《厭世代》想化解世代衝突，最後卻體現在經濟發展上其實不存在衝突。

我在前一章節分析《遠見》雜誌的最後，我提出《遠見》雜誌聚焦探討青年處境的論述，實際上反而遮掩了貧富差距、階級流動等問題。但《遠見》雜誌作為一本反映主流價值觀論調的雜誌，這也不會是太意外的現象。然而從《崩世代》到《厭世代》的論述中，我也看到同樣因聚焦到世代衝突，而在論述過程中淡化了不同年齡層或世代之間，共同面對的貧富差距困境與階級問題。

實際上，在爬梳《崩世代》一書時，就可以明顯看到《崩世代》原本試圖呈現的是一整個世代中的各年齡層群體所遭遇的困境，因此不論是安排不同年齡層寫序，或是從宏觀的新自由主義開始講起，無不體現出一整個社會發展的困境，而在這困境下不分年齡層的各個群體，都得一起面對。

然而隨著社會氛圍，以及年輕世代對困境體現出的不滿，《崩世代》的論述也與世代衝突直接接合，原本呈現整體社會發展遭遇困境，並影響所有人的政策白皮書，遂也在強調世代衝突下，弱化了原本的論調。而這情況在《厭世代》中更為明顯。

在《厭世代》中，體現不同世代的價值觀造成衝突與影響，又在經濟發展的期待上其實沒任何衝突。然而《厭世代》強調了世代衝突，凸顯年輕人的困境，實際上等於將問題縮小，並只反映年輕群體的困境。當然透過反映年輕人的困境，可以反映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以及年輕人在這困境中的處境，與不同世代在價值觀上的衝突，但也因此將問題簡單化了。強調了世代衝突，卻弱化越演越烈的貧富差距問題。

尤其在《厭世代》一書中，儘管能看到各種省吃儉用的年輕人，如何在工作與理想之中拉扯糾結，以及如何以厭世抗拒《遠見》這類主流論述的虛幻正能量。但實際上這些年輕人並非真的遭遇嚴重的剝削問題，或是在生活條件上陷入一定程度上的困境，反而凸顯原本應該可以過得如何更好，但實際上現實卻並非如此的衝突。雖然貧富差距問題、階級問題在論述中不時可以看到，最後卻因為聚焦在世代衝突而淡化了。

因此，《崩世代》與《厭世代》雖然批判《遠見》這類主流論述，但聚焦青年處境或世代困境時，卻弱化了新自由主義發展下，越演越烈的貧富差距問題以及階級問題。《遠見》、《崩世代》與《厭世代》這三組論述的共通之處，在於強調世代差異的同時，卻也使得日益嚴重的階級差異，以及同世代「年輕人」命運的不同，淡出了讀者的視角。

第四章、討論與結論

第一節、2008 年以後的青年貧窮再現論述發展

我以《遠見》雜誌、《崩世代》、《厭世代》作為文本，探討從 2008 年以來，上述文本中對於青年貧窮的再現內容。雖是從 2008 年開始，但本論文也向前回顧了「青年貧窮」一詞的發展歷程。根據新聞媒體的歷史紀錄，「青年貧窮」一詞在台灣開始出現，是 2004 年泛紫聯盟召開「青年，你的名字叫貧窮！」記者會，訴求工讀時薪的調漲。

但詞彙終究是為了反映當時的社會環境，在 2000 年爆發網路泡沫經濟化危機後，造成新貧、工作貧窮、窮忙等問題成為社會廣泛討論的課題。資本主義社會中，擁有工作就能解決貧窮問題，老幼弱殘才是容易陷入貧窮困境的群體，這些維持社會運作的概念，在新自由主義發展下開始被推翻，經濟危機造成的低薪、長期失業等問題，是一波波的勞動彈性化及非典型聘僱的發展契機，造成人們擁有工作卻仍陷入貧窮困境的狀況成為社會常態，年輕的勞動者更是首當其衝，面對低薪衝擊。

我在分析《遠見》雜誌時，也看到對於青年處境的相關論述，從 2008 年開始關注 1970 年代以後出生的六年級生，成長於台灣經濟起飛的發展階段，當出社會就業時，卻開始遭逢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甚至遭遇經濟危機。面對新貧、高失業率、工作貧窮等問題，六年級生、尤其後段班（1975 年後出生的群體）遭遇極大挑戰。

當 2008 年爆發全球金融海嘯，當時政府為解決青年失業率問題，於 2009 年推出 22K 政策，原本用意良善的政策，卻使得平均薪資被定住，且影響大學畢業新鮮人的起薪，青年貧窮的問題逐漸成為社會上的顯學。在這之間《遠見》雜誌不時以特別企劃點出青年的困境，但也同時鼓勵年輕人要努力面對困境。

2011 年《崩世代》因應 2012 年的總統大選，原本要推出政策白皮書，最後轉型為朝向一般大眾介紹台灣處境的專書，書中雖不強調青年貧窮或世代衝突，卻也體現出工作貧窮造成年輕世代的許多困境與問題，例如低薪、買不起房、不敢生小孩等青年貧窮的困境。

而從《遠見》雜誌中，可看到從 2009 年算起，歷經約三年的累積，雖然政府的 22K 政策減緩了失業率，卻助長低薪問題與工作貧窮問題，尤其年輕世代成長於相對優渥的環境，出社會工作卻遭逢各種低薪、失業困境，台灣社會對於青年貧窮的處境展開許多討論。2012 年 8 月《遠見》第 314 期便以「年輕人憑什麼贏」作為封面主題，針對年輕世代的處境推出一系列企劃，而我認為從這一期開始，是個重要的分水嶺，《遠見》開始重視這社會現象，一邊點出年輕人遭遇

的困境，一邊勉勵年輕人振作起來改變困境，以各種成功的勵志事蹟給予鼓勵與希望。

《遠見》維持一貫以來的論調，雖然點出年輕世代遭遇的各種困境，卻也不斷以世代之間作文參照，藉以鼓勵年輕人要吃苦耐勞、努力堅持，在困境中努力不懈。成功案例與勵志故事更是給予年輕人鼓勵與希望，這種一面體現出青年困境又一邊鼓勵年輕人的論調，成為《遠見》再現青年貧窮的一大特色。

然而《遠見》對青年貧窮的處理方式，卻得面對台灣社會經濟發展遭遇的困境現實，以及台灣年輕人大量出走，到薪資更優渥的地方去工作的現實。尤其當 2014 年太陽花運動後，《遠見》逐漸不再有探討青年貧窮課題的企劃，我因此認為《遠見》失去了一套如何看待青年貧窮課題的論述。

而在 2013 年左右，台灣社會開始出現一股駁斥《遠見》這類要年輕人努力或充滿希望的聲音，並以負能量、厭世作為反撲。面對現實的困境，因為再怎麼努力也難以成為成功案例，再怎麼辛苦也無法扭轉低薪現實，對於《遠見》這類主流論述中的努力說詞，負能量以一種負負得正的方式，消解了努力不見得一定成功的失落感與絕望感。在《遠見》逐漸失去如何探討青年處境的論調時，厭世、負能量成為再現青年貧窮困境的鮮明論調，2017 年的《厭世代》就試圖整理這股厭世氛圍，再現青年貧窮的處境。

而在這過程中，六年級後段班逐漸消失在青年貧窮的論述中，取而代之的是七年級生和八年級生，即是所謂的 80 後、90 後（1980 年代、1990 年代後出生的群體）。青年的貧困處境以 35 歲為界線，從 2008 年以來，以新貧、工作貧窮、找回上一代的吃苦耐勞，到厭世、負能量…等論述成為再現青年貧窮的重要內容。

第二節、青年貧窮呈現緬懷台灣過往的榮景作為世代對照

青年貧窮以青年作為對象探討其貧窮的處境，在呈現的論述中，也不斷反映出世代之間的對照。我在《遠見》雜誌中，藉由探討青年貧窮再現，看到《遠見》雜誌再現青年貧窮的論述中，往往透過世代之間的對照，點出年輕人的困境，以及點出年輕世代的不足，也透過世代之間的參照，鼓勵年輕世代找回台灣上一代的打拚精神，不論是對工作刻苦耐勞、或是勇於創新挑戰的創業家精神。無不流露出以台灣過往的經濟榮景作為參照的意涵。

《遠見》在提出年輕世代的失業問題與低薪問題時，也一邊提出各種 3K（骯髒、危險、辛苦）傳統產業明明開出高薪條件，卻一直找不到人。因此一來鼓勵年輕人不要挑工作，二來也認為台灣現在的教育體制出現學用落差的問題，並時常倡議推動類似德國或瑞士的工匠技藝或師徒制。

然而也因此體現出《遠見》雜誌在探討青年貧窮時，體現出台灣當前的經濟發展困境，而這困境有兩個進一步的解決方向，一個是期待台灣再次出現下一個郭台銘、下一個王永慶，只要有少數的精英創業成功，就有機會透過新的產業改變台灣的未來。另一個解決方向則是期許台灣的就業市場能夠和諧，傳統產業、中小企業都能獲得充沛勞動力，讓台灣整體經濟活絡，因此《遠見》一直認為台灣到處是工作機會，青年貧窮的一大問題在於年輕人挑工作，或年輕人不願吃苦。

上述這些論調中，無不體現出《遠見》以台灣過往經濟繁榮的經驗作為對照，而也因為當台灣過往的成功經驗難以複製時，《遠見》對於青年貧窮的論述也出現難以提供希望與鼓勵的困境。我認為這也體現出《遠見》這類追求經濟發展的思維也遭遇到新自由主義發展的挑戰，而這部分恰好就是《崩世代》書中試圖反駁《遠見》雜誌，這類對新自由主義毫無反思下的經濟發展論述。而也因此進一步體現出世代有無衝突的問題。

對《遠見》雜誌來說，新的世代在困境與失落中，需要有一個成功的典範與希望的方向，因此上一世代的經驗恰好是成功案例與台灣再次重返榮景的路徑，因此在《遠見》雜誌再現青年貧窮的論述中，世代之間沒有呈現太多衝突，有的只有無意間流露出的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雖然《遠見》雜誌都用鼓勵性的論調給予年輕人希望，但還是不經意會流露出年輕人應該找回上一世代的吃苦打拚精神，例如《遠見》雜誌在 2012 年 8 月第 314 期的特別企劃中，就認為年輕人如果要撕下草莓族這類刻板印象標籤，就應該用行動去證明自己不是草莓族。

《崩世代》回顧台灣過往透過減稅吸引外資投資設廠，帶動台灣產業發展的歷史，提出台灣獨厚資本財團而造就過往的榮景，也因此當台灣失去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時，遂也難以留住資本，甚至也留不住台灣自身的中小企業，而在發展高科技產業下，卻只能造就少數的高薪職缺，而難以帶動台灣整體經濟發展。也因此，在《崩世代》的論述中，其實原本並沒有要處理世代衝突，因為整體政策環境出問題，影響的不會只是單一代，而是不同年齡群體。只是因為《崩世代》再現的青年貧窮處境，體現出大環境下造成的工作貧窮問題，進而連帶影響少子女化，以及體現出政府政策問題，因而當太陽花運動爆發時，《崩世代》書中的論述馬上成為世代衝突最佳的內容。

相較下，《厭世代》強調出世代之間的衝突，並希望可以搭起世代之間溝通的橋梁，可說是跟《遠見》一樣參照台灣過往發展的榮景，卻各自談論兩個不同的面相。《遠見》著重強調過往經濟發展的經濟，不論是吃苦耐勞的打拚精神或是創業家精神。《厭世代》則著重強調因為時空背景不同，不斷參照過去經驗，反而加深當前年輕世代的困境，買房房價如此高、看薪資卻十年沒有成長，世代參照下盡是不同世代間的衝突與無法互相理解。

然而當《厭世代》向上追溯問題到中小企業的困境，進一步也認為工作貧窮、

低薪等問題，來自台灣產業發展問題時，卻也呈現出跟《遠見》相似的論調，認為台灣還是需要透過產業轉型，以及提供年輕人更友善的舞台，來改善年輕人的困境。在這點上《厭世代》就跟《遠見》沒有太多差異，都認為台灣的產業與經濟需要轉型發展。

也因此，《厭世代》雖然一開始想要處理世代衝突，並期望搭起世代之間溝通的橋樑，但最後呈現起來，《厭世代》所處理的世代衝突，跟《崩世代》並沒有太大差別，即不好的政策影響的不會只是某個年齡層群體，而是都會影響到。而《厭世代》所提出世代衝突的根本問題，則在於《遠見》這類硬要拿上一世代成功經驗加在當前年輕人身上的論調。

《遠見》、《崩世代》都以過往台灣經濟的榮景作為台灣產業發展的參照，因此在這部分兩者都沒有呈現出世代衝突，而《崩世代》則因為對台灣歷史中減稅招商、發展加工出口、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有所批判，因此認為這樣的政策影響的是每個台灣民眾，因此也不存有世代衝突。

總而言之，對於台灣經濟、產業發展如何變更好的想像，並不存在世代衝突。真正的衝突在於不同世代之間的價值觀與成功經驗難以複製，硬要將過往的價值觀、成功經驗複製到當前的年輕世代身上。這些論述對於青年貧窮的處境不合時宜的對照，體現出青年貧窮呈現出的世代對照，是緬懷台灣過往的榮景，以過去經濟的發展作為想像，但也因為拿過去的成功來探討當前的失敗，以及過去的成功經驗難以複製，因而造成衝突與反彈。

上述對不同世代的經濟發展想像不存衝突，卻在價值觀上造成世代衝突的情況，可從馬克思主義中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的概念窺知一二。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確立並提出經濟基礎作為下層建築和影響上層建築的概念，認為市民社會是從生產和生產關係等經濟基礎中發展起來的社會型態，由經濟基礎所構成的社會型態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屬於上層建築的基礎，進而形成意識形態。²⁸²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更進一步說明下層建築屬於經濟基礎，以及下層建築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認為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會伴隨相應的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也就是上層建築中的法律、政治、意識形態、價值觀等社會意識。²⁸³

因此，世代衝突體現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中的上層建築，及在文化、價值觀上，甚至是政治上的世代之間差異。而在經濟範疇的下層建築中，世代之間並不存有任何衝突或差異，對於經濟的發展想像並沒有世代上的衝突。不論是《崩世代》

²⁸² 馬克思、恩格斯（1983）。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頁 56-78。北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²⁸³ 馬克思（1972）。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頁 81-125。北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跟《遠見》之間對於經濟發展的想像，只存有彼此的差異，但不存在不同世代之間對於經濟發展想像的衝突。

第三節、青年貧窮談的不只是青年、也不僅是貧窮

當我研究青年貧窮再現時，原本以為青年貧窮再現會看到青年貧窮悲慘的處境，但大多是圍繞在青年低薪、工作貧窮的困境，並延伸探討低薪問題、產業發展問題，以及年輕世代如何應對困境的方式。因此在《遠見》雜誌中，可以看到《遠見》對於青年貧窮的呈現，一邊點出青年困境，但同時也參照上一代的經驗，給予鼓勵、提供各種勵志故事、成功經歷。

而從《崩世代》的政策白皮書到《厭世代》對抗勵志的厭世浪潮，也從青年困境談論到低薪問題、產業發展問題。青年貧窮本身，其實不是聚焦在談論青年人遭遇的貧窮處境，這些青年貧窮的問題只是突顯低薪問題、產業問題，台灣的經濟發展問題。青年貧窮實際上既不只談青年，也不只談貧窮。

例如《遠見》一路以來都非常關心年輕人的發展與出路，一直以各種特別企劃、封面故事來鼓勵與勉勵年輕人，雖然這些成功經驗、勵志故事都可說是普遍低薪困境大環境中的特殊案例，但《遠見》提出了面對大環境下，個人如何以對的建言與鼓勵。這樣的鼓勵雖然後來得到厭世作為反撲的回應，但不論是勵志或厭世，也都是個人如何應對困頓大環境的方式，而那困頓的大環境由於已經是錯縱複雜的產業問題、經濟發展問題，因而不論是主流以《遠見》為代表的論述，或是《崩世代》、《厭世代》想反擊主流論述的論調，最後也都指向政策問題。

在前面的章節中，都體現青年貧窮反映宏觀政策的狀況，也因此青年貧窮的面相探討起來多且廣。我在分析《遠見》、《崩世代》、《厭世代》之後，這些文本的論調基本上都以年輕人遭遇高失業率、低就業率，以及就業卻領低薪等等問題為出發點，而當收入或生活都不穩定時，進一步討論買房、成家與少子女化的問題，因此房屋政策、少子女化的問題，都與年輕群體的狀態息息相關。

而若探討為什麼造成高失業率、低就業率與低薪問題時，討論的方向就會往台灣經濟發展問題，或產業發展問題來談。此外，有關學用落差也是青年貧窮的一大問題，因此就會朝台灣高等教育體制的面向來談，並進一步探討年輕人從大學畢業後的就業問題。上述課題都非常大，但又都能聚焦到青年貧窮，並帶出這個世代的青年遭遇上述這些問題的困境。

因此，青年貧窮最終指向整個台灣的發展問題，連最具創造力、活力，理應成為社會中進步動能的年輕人都對未來感到絕望。年輕人因為失業率與低薪問題，感到就業環境的不友善，或由於工作貧窮、窮忙，對生活只剩下工作的處境感到絕望，或對高房價買不起房而感到無比失落，因而現實問題並非是貧窮問題，而

是對未來沒有希望而感到貧困感。這些貧困感全都指向政府的政策問題。

但由於是政策問題，受影響的也不僅僅只是青年，青年貧窮呈現的整體社會困境影響到的是一整個世代中的不同年齡群體，只是以年輕人作為重要的論述對象。因此談的雖然是青年貧窮，但其實不只談青年、也並非談貧窮。而是一個社會整體發展遭遇的困境。貧窮也非社福領域定義下的貧窮問題，而是在物價上漲、薪資不高，而房價高升下，對未來感到絕望的「貧困」問題。青年貧窮，因此成為台灣發展困境的代名詞。

第四節、大環境問題與年輕人問題的脫鉤

上述對於《遠見》、《崩世代》、《厭世代》中青年貧窮再現的分析，最後回應了我在論文中最後關切的問題，即青年貧窮的再現是否產生了具政治意義的行動或啟發。藉由 2008 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發展，從中體現出世代之間的參照，既有世代之間對於經濟發展的一致，但也有世代之間價值觀上的衝突，但最後當青年貧窮所探討的課題包山包海，也逐漸形成個人難以面對與處理的社會大問題。

在《遠見》雜誌中，《遠見》的論調一向清楚明確，即台灣遭受經濟危機的打擊後，經濟環境確實遭遇大問題，在呈現青年貧窮的處境時，《遠見》也從許多面向探討年輕世代的困境。但《遠見》的論調也一向都是政策規政策、個人歸個人。因此，面對宏觀的政策問題、大環境問題，《遠見》時常有其他的特別企劃專門探討，或訪問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的意見，甚至從官方的角度去看待這些問題如何解決。

也因此《遠見》往往在提出年輕世代的困境時，總會話鋒一轉，開始點出困境中也有成功的案例，或是藉由世代之間的對照，來勉勵年輕世代。《遠見》很明確的表現出政策問題是政府的事，至於在大環境的困境中，個人就是要靠各種方式來面對困難與挑戰，但只要能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努力的方向，就能為台灣社會盡一份力。

《遠見》雜誌在這裡的論調跟我在挖掘問題意識時，所參考的狄更斯的論調很像。我認為狄更斯當年也是在作品中寫實的描繪出英國社會的問題，但同時當描寫個人如何在這充滿問題的社會中生存時，狄更斯的故事卻呈現出追求個人的道德良善，便能促進社會的進步與和諧。我並不是說《遠見》也鼓勵人追求道德良善，而是面對龐大的社會問題時，個人置身於這社會之中，透過個人貢獻一己之力，便能促進社會變得更好。因此，貢獻一己之力在狄更斯的論點中是追求道德良善，在《遠見》雜誌則是吃苦耐勞、找到對工作的熱情，正向面對困境的挑戰。

而從《崩世代》到《厭世代》中，從前述的分析中，我點出《崩世代》從宏

觀的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逐漸講到台灣重視財團的經濟與產業發展問題，進而逐漸往下發展談到工作貧窮，以及進入到家戶的少子女化問題。《厭世代》則從訪問個案，從個人的經歷與處境逐漸向上挖掘到中小企業的困境，進而提出台灣產業發展帶動經濟的期待，並藉此搭起世代之間對話的橋樑。

在《崩世代》與《厭世代》的論述中，體現兩個面向，第一個是批判政府，但也相信政府，因為依然將期待放在造成問題的政府身上。第二個面向是雖然強調不應該將問題視為個人問題，但在如何解決個人遭遇的困境發展時，都是從結構面、政策面去談及，個人遭遇的困境因而只能被動等待政策的調整。而人的主體性在此論述安排下，便逐漸消失了。儘管《崩世代》在書中也提出關心政策、關心議題的參與方式，試圖建立起個人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連結，但這種連結對於參與社會改變的想像還是有所侷限與不足。

當《遠見》雜誌的對於青年貧窮的論述，呈現出政策規政策，個人歸個人時，《崩世代》、《厭世代》一邊認為不該將整體工作貧窮問題限定於個人問題，卻也期待政府一定要改革施政方針，我認為這也加強了政策規政策、個人歸個人的論調。假若政府的政策一直不改善，個人就得一直面對工作貧窮嗎？當政策發展與個人問題之間的關係，開始拉開距離、失去連結，就變成大眾一邊期待政府改善，另一邊面對生活中的各種現實困境，又只能想辦法各自努力。

因此，《遠見》所提出的個人如何面對現實生活中各種困境的心法或建議，成為可以在主流市場中銷售的心靈雞湯，也從這裡可以理解厭世為何能成為一種面對大環境的方式，成為負負得正，讓人得以在困境中繼續度過的方式，看似抵抗，實質是當正能量、努力打拚都令人絕望時的生存手段。但也因而體現，當青年貧窮的再現呈現出大環境問題與個人問題的脫鉤時，個人還是得尋求一種得以繼續面對生活困境的方式，不論是正能量或厭世。

貧窮問題如何被揭露並讓大眾正視，一直是貧窮書寫作為文化行動的政治目的。然而過往貧窮的不被看見，比較集中於聚焦在特定對象的書寫（貧民窟、底層弱勢群體）。但我透過研究與分析《遠見》雜誌、《崩世代》、《厭世代》這些文本如何再現青年貧窮，我認為當書寫的群體由個人的處境逐漸發展到宏觀的政策問題時，在這過程中也抽象化了貧困的群體，也因為群體的抽象化，提出的解決方案或建議，也會比較聚焦於從政策面著手。因此我認為再現手法與指出問題之間，具有當再現的群體趨於抽象，而提出的反應就越趨向於政策的情形。

我認為在這過程中，由於個人與政策之間的距離，以及問題越來越趨抽象，導致個人面對龐大問題時，只能處理個人問題，而對社會問題、政策問題產生無力感並因而失去連結。也因而將政策變革的期望，交付給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對象，可能是某個政黨、政治人物、或是某個團體領袖。而這樣的狀態使得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可能性變低，也失去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想像。

因此，為何當青年貧窮的問題連主流媒體、報章雜誌都在熱烈討論，也都提出各種問題時，卻也僅僅只是提出問題而已，而沒有產生更具政治意義的行動。而個人如何面對青年貧窮這包山包海的龐大社會問題，最終只能討論個人如何在充滿困境的社會中找到繼續生存的動力或方法。因此我認為從《遠見》雜誌、《崩世代》到《厭世代》再現青年貧窮的論述中，體現出為何青年貧窮已經是台灣社會、甚至全球熱烈討論的話題時，青年貧窮雖然點出了問題，卻也僅僅點出問題。

我也進一步認為，這能解釋為何當蔡英文總統在 2016 年就職時，會在就職演說中將青年的困境上綱到是國家發展的困境，以及在近幾年的選舉中，為何青年的處境總能成為賣點，成為各候選人提出的選舉政策。也正因為如此，當青年貧窮的論述都導向大環境的政策問題時，所產生的政治行動意義在台灣只是化成選舉的選票、候選人的政見，並失去了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想像，以及其他參與政治方式的想像，例如參加工會、監督政府的政策或對這社會體制有不同的期待或想像等等。我認為這樣的青年貧窮論調反而造成一種去政治的情況。

第五節、結論：青年貧窮一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我以《遠見》雜誌、《崩世代》、《厭世代》作為文本，探討 2008 年以後面向社會大眾的論述中，青年貧窮是如何再現，並認為青年貧窮反映出不同世代間的對照，因此呈現出論述裡緬懷台灣過往的榮景，作為台灣經濟、產業發展如何變更好的想像。因此經濟發展、產業發展並不存在世代之間的衝突，真正的衝突在把過去台灣欣欣向榮時的社會價值觀與成功經驗，硬要加諸在當前的年輕世代身上。

因為青年貧窮呈現出的各個面向，無不指向台灣遭遇的發展困境，因此青年貧窮談的不只是青年、也不僅是貧窮，更是錯綜複雜的政策問題，因而當青年貧窮探討的問題成為個人難以撼動的大環境問題時，便也只能期待某個政黨、政治人物提出政策上的變革，並成為政黨政治下的選票競爭內容。而個人面對現實的生活困境，只能靠正能量或厭世負能量，失去對社會政策變革的其他參與想像，因而體現出主流論述中再現的青年貧窮，是一種去政治的談法，並且遮掩了其它更多社會問題。

青年貧窮所框定的範圍當然是年輕群體，但也因為只聚焦年輕世代的處境來談，就輕忽了其他群體的處境。可說青年貧窮的論調，凸顯了年輕世代的處境，進一步體現台灣整體政策發展的困局，然而因此遮掩住了貧富差距、階級分化等更普遍的社會問題。

例如步入中年的群體需要養育小孩、又有照顧長輩，等夾在中間的處境，同樣的不景氣，所導致的低薪或失業率，更是衝擊極大。而老年人的長照問題，或

假如也陷入貧困處境，其處境與年輕人相比，又更是容易跌入社會的最底層。當經濟危機導致社會遭遇困境時，年輕人的低薪處境能壓低人事成本，但年長一輩或資歷較深者，就很容易成為被裁員的對象。即透過年輕人低薪與裁員資深工作者，進而縮減人事成本。

因此，主流論述聚焦強調青年貧窮的處境，卻也因此忽略其他年齡層遭遇不同的困境，尤其社會更弱勢群體的處境就更難被看到，²⁸⁴貧富差距、階級問題也在世代衝突下被轉移。即是說，青年貧窮論述凸顯世代之間的衝突，卻也因此淡化相同世代之中的貧富差距，以及世代之間階級複製的問題。

這並非說年輕人的困境不存在，而是強調出不論是否年輕人，遭遇低薪問題、失業問題，都會陷入貧窮或失去希望的困境中。強調青年的處境與貧窮，容易導向經濟產業如何發展的政策問題，並轉移貧富差距造成的階級流動問題，與階級複製的問題。

我認為，從《遠見》、《崩世代》到《厭世代》等文本中，對照而出的青年貧窮論述，有效的將社會困境轉為世代之間的衝突，但世代之間的衝突其實只有價值觀上的衝突，然而在經濟發展上，其實並沒不衝突，因此有效轉移貧富差距，以及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階級複製問題。

主流青年貧窮論述，真正關心的是如何找回台灣過往的經濟榮景，因此在呈現上不僅拉開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距離，造成去政治化的效果，更遮掩貧富差距、階級複製與階級流動停滯的等等社會問題。

對此，我認為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或許可視為一個方向，恩格斯透過生產與生產關係，將個人的問題與社會問題連結起來，因此提出受苦受難的人們是社會變革的主體，無產階級是變革的根源，是改變的可能。

即是說，在提出問題的同時，所關心的是經濟發展中人的問題，在面對經濟危機自身的矛盾時，同時提出弱勢群體如何自立自強，形成社會變革的主體，而在此情況下，所要解決的不僅是經濟發展的經濟危機困境，更是直面貧富差距所造成的受壓迫者，以及將受壓迫的勞動者、弱勢群體視為充滿政治性參與進社會變革的主體。

但這並不表示我認為恩格斯在 19 世紀初談論階級的論述，可以直接照搬到當前社會，作為解決當前社會困境的方式。也並不表示我認為恩格斯當時的分析方式可套進台灣當前處境，建立起個人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連結。我認為恩格斯在資本主義社會初發展的維多利亞時代，便以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式，得出許多精闢的論點，恩格斯的方法或許會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²⁸⁴ 例如林立青（2017）的《做工的人》，就描寫社會弱勢群體難以被看到的處境。而這難以被看到，在於主流論述將這些弱勢群體化作可憐底層的樣貌，而當談論整體社會氛圍時，將底層弱勢與普遍大眾的困境分開來談。因此在青年貧窮的群體中，很難看到這樣的底層弱勢群體。

即是說在剖析社會問題時，除建立起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係與社會連結，更思考個人與經濟危機之間的關係，思考自身與社會變革的關聯。不因陷入世代之爭，而無視貧富差距的問題；不因追求經濟的發展，而將希望寄託在投給某個政黨或政治強人，進而消除自身參與社會的其他政治性。

因此，我在本研究點出青年貧窮論述再現了什麼，具有什麼侷限，又遮掩什麼問題，看似回應緒論中提出的問題意識，實際上卻只是個起點。我點出青年貧窮再現上的初步問題，開啟後續可以更深入探究的一步。

第六節、研究限制

我在本研究中將青年貧窮再現的研究範圍定在 2008 年以後，並只到 2017 年，在文本上則挑選《遠見》雜誌共 120 期，以及兩本專書《崩世代》與《厭世代》，透過論述分析對上述文本進行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文本中經常談論到世界各國青年貧窮的處境，尤其是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我在挖掘青年貧窮有哪些文本時，也確實參考許多日本翻譯書籍，例如《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最貧困女子》、《貧困世代》…等等。

日本青年貧窮的問題比台灣早被提出討論許多年，社會上的各種貧困處境的現象也比台灣描寫更多。而有關韓國的部份，雖然網路上有許多媒體報導「全拋世代」，介紹韓國的高壓，²⁸⁵但在台灣翻譯有關韓國青年貧窮處境的書其實不多，至少我只找到《憤怒的數字：韓國隱藏的不平等報告書》，另本則是在韓台灣人陳慶德寫的《再寫韓國：臺灣青年的第一手觀察》。而中國大陸有關青年的處境，也有例如「喪文化」²⁸⁶、「佛系」²⁸⁷等青年流行用語，或像呂途《中國新工人》三部曲探討中國大陸新工人處境的專書等。²⁸⁸

由於青年貧窮是在全球範圍發生的現象，假如能更進一步跟別國經驗比較，或探討各國如何再現青年貧窮課題，一定有更多能夠互相參照的現象與內容，以及能更深入挖掘與探究的現象。尤其日本擅以世代命名，並呈現許多青年貧窮現象，而日本也確實有許多青年貧窮的處境被各種類型的文本以不同方式再現。這是本研究原本期待進行但卻沒有做到的，實為遺憾。

此外我在本論文進行青年貧窮再現的時間範圍定在 2008 年到 2017 年，這之

²⁸⁵ 可參考關鍵評論網的線上專題：地獄朝鮮「全拋世代」。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3 日，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3203>

²⁸⁶ 喪文化，主要形容 90 後的年輕人，在生活中沒有目標也沒有希望，如喪屍般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跟台灣的厭世有許多相似之處。

²⁸⁷ 大約 2018 年左右在中國大陸網路上出現並走紅，大意是看淡一切、無欲無求，對於獲得或失去都超然看待的生活態度。反映出在生活中無欲無求反而比較好過的狀態。

²⁸⁸ 《中國新工人》三部曲分別為：《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

間青年貧窮的論述年齡層從曾經的六年級生，逐漸往之後的七年級生，甚至八年級生邁進，且大抵以三十五歲左右為界線。但是否脫離青年的年齡範疇，也就同時脫離了青年貧窮的困境？還是其實往後延伸變成中年貧窮的問題？例如聯合新聞網在 2016 年就曾經以「流沙中年」為企劃主題，²⁸⁹報導 40 多歲的中年世代面臨低薪、窮忙，卻得同時遭遇長照問題或子女養育的問題。

由於我在本論文中認為大環境問題影響的不會只是單一代，因此若能延伸就中年世代的處境如何被論述，也能進一步對照青年貧窮的論述。這也是本論文無法進一步處理，但很值得繼續發展的內容。

而由於本研究提出青年貧窮體現世代對照，然而根據研究中所提，台灣當年的競爭力來自低廉的勞動力，而當時的台灣處在低廉勞動力下，當時的青年勞動者同樣得吃苦耐勞、努力打拚，當時的年輕人是否就真的比較好？還是當時的台灣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成長景況，只是對照出當前的發展停滯？也是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例如以描寫台灣經濟發展時，加工廠女工的故事；或從鄉村來到城市的庶民經驗，都可以是探究當時勞動者處境的文本。我在本論文中提出世代之間不存在經濟發展的衝突、而存在價值觀不合適宜的衝突，假若能以當前的青年貧窮論述對照當時代的論述，更能深切的體現出世代之間的差異問題。

雖然本論文討論並指出青年貧窮論述的問題在哪，卻沒有進一步解釋或分析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存在，以及這些問題背後更深刻的形成因素，例如為什麼《遠見》雜誌中呈現的論述與觀點，儘管在本研究中提出有不足之處，但仍然在台灣社會中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且能持續有效的說服至少一部份人。

或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是「貧窮書寫」的商品化。早從狄更斯開始，貧民窟中的貧窮弱勢處境，便成為書寫的對象，並進一步成為商品銷售，成為可以賺錢的內容，至少這樣的銷售讓狄更斯在當時的英國社會中，成為擠身上流社會的名作家。來到當代，在新自由主義發展遭遇困境下，對於貧窮困境的書寫也越來越多，甚至成為出版商認為在市場有賣點的出版品，青年貧窮的主流論述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上述這些提問，原本理應是本論文在點出青年貧窮的問題後，可進一步深入分析的內容，但礙於本研究的侷限，我並沒有處理到。我認為未來或許可以從幾個方向進一步來談，例如當代社會的媒體產制出版貧窮書寫內容的動力為何？或媒體與閱聽眾是否共享並建構主流意識型態？

最後，我在研究中點出青年貧窮再現的問題，並在論文最後提出借鏡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可能會是一個可以更深入探究青年貧窮問題的方法，以及在檢視

²⁸⁹ 聯合新聞網「流沙中年」專題企劃，2016 年 10 月 3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網址：https://udn.com/upf/newmedia/2016_data/20161003_quicksand_middle_age/index.html

青年貧窮的處境時，或許能同時面對經濟危機發展的經濟矛盾。然而這是我在完成本論文後的體悟，期望未來有興趣的研究者也可從這角度進一步深入探討。

上述都是本研究的侷限與不足之處，以及我認為有些是本論文該發展，或進一步探究，但我在本研究中沒有處理到的部份。希望本研究體現出的這些不足與侷限，可作為未來研究者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附件

《遠見》雜誌 2008 年到 2017 年之間共計 120 期（第 259 期到第 378 期），本研究篩選與青年貧窮再現相關之期別，共計 27 期，列表如下：

期數	出版日期	封面主題	企劃主題
262	2008.04	勇敢投資印度	2008 兩岸工作潮 系列報導(中) 發現台灣「薪」藍海
266	2008.08	企業·全民修煉通膨 3 關鍵 超·集·省	全球新挑戰 台灣新課題 集體創意 終結貧窮
267	2008.09	小學生大未來 檢回來的校長獎	小學生大未來 檢回來的校長獎
267	2008.09	小學生大未來 檢回來的校長獎	台灣有 50 萬個弱勢家庭 25 縣市弱勢指標大調查
270	2008.12	A+俱樂部 最會幫股東賺錢的台灣 73 強	流浪畢業生
273	2009.03	一兆台幣的一堂課	評論
274	2009.04	50 萬白領大轉型	50 萬白領大轉型
274	2009.04	50 萬白領大轉型	三個世代 白領新機會
286	2010.04	上海世博搶先看	六年級生前途閃亮學 職場進化論：35 而立
287	2010.05	最佳董事長 50 強 暨 最佳總經理 100 強	10 年一遇的職場榮景再現 工作回來了
307	2012.01	翻身吧！hTC	時事熱線
310	2012.04	遠見民調 台灣第一份幸福成績單 64.2 分的幸福	《遠見》× 東方快線·五六七年級生網路調查 女比男幸福，年輕世代卻失落幸福感
314	2012.08	年輕人憑什麼贏	我是小薪青年
314	2012.08	年輕人憑什麼贏	愛拚卻不定贏
314	2012.08	年輕人憑什麼贏	別再貼我標籤
314	2012.08	年輕人憑什麼贏	我們這一代
314	2012.08	年輕人憑什麼贏	他們也曾年輕
314	2012.08	年輕人憑什麼贏	你也可以成功
314	2012.08	年輕人憑什麼贏	工作，其實就在這裡
316	2012.10	當日本買釣魚台 台灣正在買日本	總編輯的話
317	2012.11	創造自己的阿信	創造自己的阿信／五月天告訴你 年輕人憑什麼贏
319	2013.01	小螢幕玩出大勢力	五月天 Google 開唱！直擊最神祕部門

			Android 小螢幕玩出大勢力
321	2013.03	瑞士是故意的 工匠精神打造最低失業率	第三波台灣人闖大陸
322	2013.04	全球飆大學，台灣怎麼追	全球飆大學，台灣怎麼追
324	2013.06	台灣經濟奇蹟不是靠福氣，是靠百萬技職生 他們打敗失業率	台灣經濟奇蹟不是靠福氣，是靠百萬技職生／他們打敗失業率
324	2013.06	台灣經濟奇蹟不是靠福氣，是靠百萬技職生 他們打敗失業率	技職生憑什麼打敗失業率
324	2013.06	台灣經濟奇蹟不是靠福氣，是靠百萬技職生 他們打敗失業率	當年沒有讀高中，依舊好前途／我以技職為榮
324	2013.06	台灣經濟奇蹟不是靠福氣，是靠百萬技職生 他們打敗失業率	你會讓孩子讀技職？／技職教育的挑戰
326	2013.08	你，悶壞了？讓我們一起來反彈 台灣憑什麼再贏	你，悶壞了？讓我們一起來反彈 台灣憑什麼再贏
329	2013.11	出國拚第一桶金	出國拚第一桶金 7000 個年輕人前進星、澳工作，還有 7 萬人想去
334	2014.04	企業有獲利 但錢都到哪去了？加薪，老闆沒說的祕密	企業有獲利 但錢都到哪去了？加薪，老闆沒說的祕密
335	2014.05	台灣未來必修學分 90 後，你在想什麼？	台灣未來必修學分 90 後，你在想什麼？
337	2014.07	短短 4 年快速崛起，牢牢勾住 5000 萬粉絲 小米，社群之王	打破 22K 魔咒 青年創業潮再起
345	2015.03	首度醫界萬人大調查 92% 醫護對未來悲觀 台灣醫療關鍵報告	貧富不均 重擊台灣！
349	2015.07	勞檢好忙・企業好怕・員工好累 一部勞基法 搞慘 360 行？	勞檢好忙・企業好怕・員工好累 一部勞基法 搞慘 360 行？
351	2015.09	外有全球股災；內有出口、投資、消費緊縮 景氣急凍 猛藥在哪裡？	知識經濟論壇
352	2015.10	20 年後，台灣職場會有 885 萬人退場！消失中的上班族	20 年後，台灣職場會有 885 萬人退場！消失中的上班族

		族	
376	2017.10	FinTech 爭霸戰 新加坡 能，台灣為何不能？	關鍵調查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 王永慈 (2005)。台灣的貧窮問題：相關研究的檢視。臺大社工學刊，10。1-54。
- 王德睦、何華欽、劉一龍 (2008)。所得成長、所得不均與家戶變遷對貧窮率之影響：以台灣地區 1990 年至 2004 年為例。臺灣社會福利學刊，7(1)。29-63。
- 王德睦、呂朝賢、何華欽 (2003)。台灣貧窮門檻與測量的建立：FCSU 的應用。臺大社會工作學刊，8。1-46。
- 包淳亮 (2006)。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當代危險。歷史月刊，218。69-73。
- 呂朝賢 (2007)。「新貧」的意義、政策及其限制。社區發展季刊，119。20-39。
- 呂朝賢 (2007)。貧窮動態及其成因－從生命週期到生命歷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14。167-210。
- 呂朝賢 (2010)。臺灣貧窮近似決定因素：成長、再分配與人口效果。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2。109-151。
- 呂朝賢、陳柯玫、陳琇惠 (2016)。主觀貧窮輪廓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8(3)。341-376。
- 呂雅雯、盧鴻毅、侯心雅 (2010)。再現貧窮：以電視新聞為例。新聞學研究，102。73-111。
- 李安妮 (1994)。對傳統貧窮研究方法的省思：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婦女與兩性學刊，5。166-183。
- 李淑容 (2007)。台灣新貧現象及其因應對策。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7。193-219。
- 卓雅苹 (2015)。貧窮、犯罪與社會排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臺灣少年犯罪治理之研究。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23。106-145。
- 林育陞 (2017)。新貧階級就業危機之探討－社會支持網絡觀點。危機管理學刊，14(2)。1-10。
- 林宗弘 (2012)。〈《崩世代》：一本意外暢銷的社會學書籍〉。臺灣社會學會通訊，76。頁 32。
- 林柏儀 (2014)。邁向「資崩世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4。199-211。
- 林美伶、王德睦 (2000)。貧窮門檻對貧窮率與貧窮人口組成之影響。台灣社會福利學刊，1。116-156。
- 林徐達 (2012)。貧窮的文化反思：三位原住民的生命話語與意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6。133-177。
- 邱瑜瑾、姜義雯 (2010)。貧窮家庭研究－經濟、社會與心理面向之敘述分析。

-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4(1)。107-131。
- 洪明皇（2018）。世代所得變化與老人所得不均：芬蘭、德國、美國與台灣。國家與社會，20。97-164。
- 洪惠芬、李淑容、林宏陽（2014）。我工作，但我還是被排除！？—低度就業者的工作貧窮困境。當代社會工作學刊，6。124-181。
- 唐永亮（2007）。論日本法西斯統治下日本的國民倫理觀念及其特徵。日本研究，3。61-66。
- 唐永亮（2007）。論日本法西斯統治下日本的國民倫理觀念及其特徵。日本研究，3。61-66。
- 夏曉鵬（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頁153-196。
- 孫健忠（1999）。社會價值與社會控制：以社會救助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1。77-109。
- 徐文路（2014）。馬克思或馬爾薩斯主義？再論馬寅初的人口理論。成大歷史學報，47。71-112。
- 財政部統計處（2017）。《由財稅大數據探討臺灣近年薪資樣貌》。頁27。
- 馬世芳（2016）。「魯蛇世代」的虛無與憤怒——我聽「草東沒有派對」。小日子，49。
- 張嘉玲、黃素滿（2016）。確認貧窮的類別：台灣低收入家戶的特性。社會科學論叢，7(1)。1-46。
- 郭俊巖（2010）。美國工作福利政策的形成與轉化：以 AFDC 改革為例。臺灣社會福利學刊，8(2)。329-371。
- 陳光興（1992）。在「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之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86-115。
- 陳柯玫、呂朝賢、王德睦（2016）。臺灣多面向貧窮測量與分析。人口學刊，53。1-59。
- 黃世鑫、林志鴻、林昭吟（2003）。新貧問題與社會福利政策—科學 vs. 價值 & 菁英 vs. 普羅。國家政策季刊，2(4)。83-124。
- 葉崇揚、蔡明璋、呂建德（2017）。台灣民眾對社會福利的態度—體制評價、道德經濟、階級與世代的影響。臺灣民主季刊，14(2)。1-48。
- 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9。1-58。
- 戴翠莪（2017）。解構青年貧窮：檢視家戶組成、社會福利與市場等對 22 國青年貧窮的影響。歐美研究，47(3)。299-343。

薛承泰 (2016)。台灣地區兒少貧窮：1991-2005 年的趨勢研究。臺灣社會學刊，40。89-130。

簡錫堦 (2012)。反貧困運動－扭轉崩世代的危機。台灣人權學刊，1(3)。171-186。

【專書】

列寧 (197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寧全集，2，頁 38-39。北京：人民出版社。

吳承紘 (2017)。厭世代。台北：月熊出版。

呂新雨 (2008)。書寫與遮蔽。廣西：師大出版社。

希特勒 (1972)。我的奮鬥：希特勒自傳。翻譯：方白。台北：大明王氏出版有限公司。

林立青 (2017)。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 (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台灣勞工陣線。

芭芭拉·艾倫瑞克 (Barbara Ehrenreich) (2001)。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 (林家瑄譯)。台北：左岸文化。

芭芭拉·艾倫瑞克 (Barbara Ehrenreich) (2005)。M 型社會：白領的新試煉 (林淑媛譯)。台北：時報出版。

查爾斯·狄更斯 (2016)。孤雛淚。翻譯：方淑惠、李延輝。台北：商周出版。

珍·斯邁利 (Jane Smiley) (2005)。狄更斯：尋找救贖與幸福的小說家 (鄭惠芬譯)。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約翰·朱迪斯 (2017)。民粹大爆炸。翻譯：李隆生、張逸安。台北：聯經出版。

約翰·達爾文 (John Darwin) (2015)。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 (黃中憲譯)。台北：麥田出版。

倪炎元 (2018)。論述研究與傳播議題分析。台北：五南出版社。

恩格斯 (1983)。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頁 269-564。北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2000)。恩格斯傳 (易廷鎮、侯煥良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 (1972)。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頁 81-125。北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馬克思、恩格斯 (1983)。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頁 56-78。北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 高希均（2017）。翻轉白吃的午餐：台灣從小龍年代到溫水青蛙的警示。台北：天下文化出版。
- 常艷（2010）。恩格斯晚年社會發展理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郭力昕（2014）。再寫攝影。台北：田園城市。
- 郭力昕（2014）。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台北：麥田出版。
- 郭力昕（2018）。製造意義：現實主義攝影的話語、權力與文化政治。台北：影言社有限公司。
- 陳慶德（2017）。再寫韓國：臺灣青年的第一手觀察。台北：月熊出版。
- 奧古斯特·科爾紐（1980）。馬克思恩格斯傳Ⅲ：1845-1846（管士濱譯），頁124-12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新社會研究院（2016）。憤怒的數字：韓國隱藏的不平等報告書。翻譯：宋佩芬。台北：高寶出版。
- 鈴木大介（2014）。最貧困女子（陳令嫻譯）。台北：光現出版。
- 厭世姬（2017）。厭世動物園。台北：時報出版。
- 蔡明燁（2012）。狄更斯誕辰兩百年。全國新書月刊（161），頁68-72。
- 謝天振（1994）。狄更斯傳。台北：業強出版社。
-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2009）。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回顧德意志國（周全譯），194-195。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 鍵人（林育聖）（2016）。每天來點負能量：失落的壞話經典，負負得正的人生奧義。台北：時報出版。
- 藤田孝典（2016）。貧困世代（賴芯葳譯）。台北：高寶出版。
-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2010a）。旁觀他人之痛苦（陳耀成譯）。台北：麥田出版。
-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2010b）。論攝影（黃燦然譯）。台北：麥田出版。

【學位論文】

- 王英倩。《製造貧窮：台灣媒體對貧窮的社會建構——以2000年後的媒體文本為例》。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吳佩瑩。《新貧問題與社會救助政策的改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吳德偉。《臺灣工作貧窮者的生活幸福之研究》。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碩士論文，2011。

周佩潔。《新貧冰風暴：家中主要生計者失業對青少年子女影響之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2003。

林怡君。《媒體吹起貧窮風：貧窮新聞的初探，兼及「新貧」議題之考據--以《聯合報》1999-2003 年 6 月為例》。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邱楷恩。《「草莓世代」的建構與想像》。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張芳寧。《政府促進就業政策之檢討兼談新貧問題》。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2009。

張家榮。《被出租的年輕人：高學歷青年派遣勞工的勞動》。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2011。

趙秋雲。《台灣青年工作貧窮現象》。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013。

賴郁如。《探討台灣勞動市場中「全時」工作者的工作貧窮現象》。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2015。

羅婉云。《台灣工作貧窮現象之實證分析》。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2007。

【其他】

《Career 職場情報誌》第 330 期，2003 年 10 月發行。

《Career 職場情報誌》第 350 期，2005 年 6 月發行。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第 68 期，2006 年 5 月發行。

《中央日報》。2004 年 11 月 4 日。〈泛紫聯盟：青年貧窮化 扁政抽手〉。

《今周刊》第 821 期，2012 年 9 月 17 日發行。

《聯合報》。2004 年 11 月 11 日。〈泛紫：重視青年貧窮問題〉。

鄭亘良（2004）。論「年級論」——年級現象的初步探討。網址：

<http://sex.ncu.edu.tw/reset/?p=606>，檢閱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

本論文寫作獲贈
2030 台灣無貧困推進協會
獎助碩士論文計劃補助